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洛林 厉以宁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克崱 朱 民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周文重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楼继伟 聂振邦 樊 纲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高层论坛 •

创新方式内涵 深化经济合作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曾培炎 (004)

• 宏观经济 •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战略问题研究

课题组 (007)

逐步开放外汇市场 助推人民币跨境使用

周先平 邓 伟 (021)

• 区域经济 •

将舟山建设成为我国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桥头堡

郑新立 (030)

以开放促进蓝色经济区建设

刘德军 (039)

• 理论前沿 •

创新城市发展方式 推进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

陈文玲 (045)

• 世界经济 •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评析与启示

何德旭 史晓琳 (056)

• 国际贸易 •

中国外贸发展的几个认识问题

沈丹阳 (067)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创新与体制机制改革

陈 昭 于立新 (075)

• 产业发展 •

鼓励流通创新 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产业政策

盛朝迅 (084)

• 企业发展 •

金融集团监管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

杨琳 (093)

• 案例研究 •

坚持文化融合 创海尔全球化品牌

王安喜 (109)

• 全球化人物 •

世界经济已发生结构性转移
——专访摩根大通国际主席弗兰克尔

本刊记者 牛铁航 (115)

• 智库言论 •

抓住新一轮经济改革机遇
全球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亨利·保尔森 (119)
郑永年 (120)

• 新书推介 •

如何保持和用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简介

张永军 (122)

一部具有国际新视野的力作：《全球要事报告》

张焕波 (123)

• 英文提要 (ABSTRACTS) •

(125)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运营单位：国经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出版：《全球化》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2号楼503室，邮编：100017；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甲31号1号楼506室，邮编：100034）

投稿邮箱：qg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66169330

· 高层论坛 ·

创新方式内涵 深化经济合作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曾培炎

过去三十多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共同经历了风雨，也一道成长前进。展望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基本趋势具有三个“不变”。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变。两岸社会各界大交流、大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经过五年来双方的共同努力，支持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中共十八大再次强调将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我们将一如既往，深化互利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拓展合作空间，分享发展成果。二是两岸经济合作共赢的格局不变。事实表明，两岸经贸往来从无到有，长足发展，既促进了大陆经济繁荣，也给台湾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未来国际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大陆和台湾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理应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携手努力，摒除障碍，和衷共济，共克时艰，共同成长，共同繁荣。三是两岸制度化协商方向不变。近年来，两岸经济合作突飞猛进。两会签署的18项协议，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两岸经贸交流中的政策障碍；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为两岸人员往来和贸易投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两岸经济深化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使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不断推进。随着ECFA后续政策的到位和实施，两岸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格局将深入发展。

对深化发展两岸经济合作，我想再讲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两岸政策协调与商情沟通。两岸经济合作不断深化，需要进一步相互开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与台湾工商界交流会上所作演讲的部分内容。

放，增进双方沟通了解，消除信息不对称。双方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协调，在重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台以及汇率、利率、税收等重要政策工具的调整上，考虑相互关切，协调政策安排。大陆正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台湾也启动了“黄金十年”蓝图愿景。两岸应做好重大项目与规划的衔接，在产业政策、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合理对接。加强双方企业供求信息、项目招投标、海外投资机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开放和共享。两岸各类行业协会、中介、智库等社会组织，可以在联络推介、信息提供、咨询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二，创新务实合作的内涵与方式。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两岸推动结构转型，双方合作也需要升级。当前大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台资企业应发挥科技基础好的优势，在大陆寻求新的商机。大陆企业应积极行动起来，加大向台湾投资力度，改变长期以来台湾单向投资的状况，繁荣当地经济，促进就业和民生改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具有巨大的经济活力，应当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他们充当合作的主力军。两岸企业还可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实现产业链对接与融合，通过相互参股、结成战略联盟、合作研发设计等形式，抱团进军国际市场。

第三，发挥企业家增进和平发展红利的作用。两岸企业家既是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受益者，也是创造者。两岸经贸关系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正是两岸企业家努力合作的结果。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企业家最能感受“和平红利”带给两岸民众实实在在的利益。我相信，各位依托敏锐的经济直觉、聪慧的经济头脑、灵活的经济手段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一定能够在两岸经济合作的舞台上“唱主角”，肩负起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主力军作用。两岸的交流与合作，不但是利益通，更重要的是感情通、心灵通，两岸将不仅是“利益共同体”，而且是“命运共同体”。

为推动两岸经济界的深入合作，两岸共同发起了“海峡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峰会经过几年摸索实践，已经成为两岸企业家务实互动的高端盛会。去年的南京峰会上，两岸企业家首次汇聚了重要共识，规划了两岸经济合作的蓝图，并提出了建立理事会等长效机制。推动峰会不断发展并切实发挥作用，也是我此次台湾之行的目的之一。

紫金山峰会及理事会将发挥“交流、谋划和助推”的功能，为两岸企业家增进了解、发现机会、扩大获益做好服务。峰会将按产业界别设立电子信息、石化、金融、物流、生物医药等工作小组，使两岸同行之间了解更透彻、合作更顺畅。希望大家积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建言献策，为加深两岸经济合作出谋划策。峰会将把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努力把大家的智慧转化成具体政策并跟踪推动落实。两岸已就加强产业合作达成共同意见，明确双方合作愿景。峰会将从两岸企业家的角度，协同两岸经合会，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作出贡献。

唐代诗人王湾写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是说潮水上涨而风推船行，两岸宽阔，扬帆待航。这正是两岸企业家共同努力前行的生动写照。在座企业家都是经济领域的翘楚，我相信，通过大家的热情参与和共同努力，紫金山峰会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大陆台湾企业家的合作共赢将更加紧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念将更加坚定，中华民族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20页）碳建筑，利用财税政策鼓励开发商和消费者投资、购买节能低碳建筑，对于购买节能低碳建筑的消费者给予减税优惠；开展节能低碳建筑示范，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家用电器，鼓励使用高效节能厨房系统。改善城市能源供给方式，扩大新能源的利用。提高电气化率和城市用气普及率，增加优质清洁能源的适用比例。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征税方式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即在消费时对商品进行征税，消费越多付税越多。

3. 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在城市化过程中，面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局面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所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明显提高。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碳税政策，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按行业有区别地进行按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进行碳税的征收，一方面可以让企业去发展高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向低碳经济方向进行升级转型；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改变目前广大民众的生活消费模式，使之变得更加节能环保，也使社会能够持续科学地发展。

4. 坚持可持续消费理念。可持续消费是一种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是与环境相协调的、低消耗的、高质量的适度消费模式，既发挥消费对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又可避免过分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可持续消费要坚持“6R”原则，即Reduce—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evaluate—绿色消费，环保选购；Reus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cycle—垃圾分类，循环回收；Rescue—救助物种，保护自然；Recalculate—再计算，即消费者在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计算其消费行为的直接经济成本（商品市场上的标签价格），还要计算生产该产品或提供该服务的全过程碳排放量。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宏观经济 ·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战略 问题研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课题组*

摘要：本文从国际视角综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原因和基本特征等，认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于缺乏制度和科技创新，经济结构多重失衡等内在原因。本文认为，我国面临人口红利减弱和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等挑战，但是也同时具备了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推进潜力大、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逐步显现等有利条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时间和目标，认为只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至2020年前后即可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最后，本文认为，我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实行新型城市化等战略。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红利 城镇化 收入分配差距

目前，按照名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中国已经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内外学者开始讨论中国是否会落入如一些拉美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力求从梳理理论和借鉴国际经验入手，探讨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问题和战略选择。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辨析

（一）概念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中首次对“中等收入陷阱”

* 课题指导：王春正；课题组长：戴桂英；课题组成员：黄志龙、刘浩、张瑾、徐占忱、王福强、徐长春、马庆斌。

(Middle Income Trap) 概念进行诠释这就是指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在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10000美元之间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2010年,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数十年来,拉美和中东很多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经济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处于大规模、低成本的生产竞争之中,又不能提升和拓宽价值链,发展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

(二) 基本特征

同样采用名义汇率计算法人均GDP标准,世界银行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经济体、中下等收入经济体、中上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该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中下等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合称为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2010年8月发布的最新标准是,人均GDP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996-384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46-121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19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以此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4682美元,刚刚跨入中上等收入经济体行列。

表1 一些国家(地区)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所经历的时间

国家 和地区	跨越不同收入阶段			停留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所用时间			2010年人均GDP (现价美元)
	时间点（年份）			（年，截至2010年）			
	低收入进入 中下等收入	中下等收入进 入中上等收入	中上等收入 进入高收入	中下等收 入阶段	中上等收 入阶段	中等收入	
日本	1966	1973	1985	7	12	19	43161
中国香港	1971	1978	1989	7	11	18	31877
新加坡	1971	1979	1990	8	11	19	43324
韩国	1977	1988	1995	11	7	18	20757
阿根廷	1962	1988		26	22+	48+	9067
墨西哥	1974	1992		18	18+	36+	9580
巴西	1975	1995		20	15+	35+	10710
马来西亚	1977	1995		18	15+	33+	8519
泰国	1988	（2008）					4679
越南							
中国	2001	2010					468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停留时间x+表示至少停留时间为x年以上。

根据国际经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通常具有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和社会不稳定等六大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韩国等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不超过20

年，而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停留的时间较长，超过30年，按照本课题分析的数据和状况，仍未走出中等收入阶段。由于长时间不能跨越这一阶段，经济和社会积累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得不到有效释放。我们将具备这些基本特征的经济体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原因探析

对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与政治、社会稳定。东亚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尽管它们的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但都能通过制度设计约束政府行为，惩治腐败，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无疑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相反，拉美和中东一些国家，政治动荡不安，腐败问题严重，政府对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漠视，社会难以和谐，经济也就无法实现稳定增长。

2.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由于要素禀赋优势不足，政府、家庭通过不断加大教育投入规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劳动者素质。相反，拉美和中东一些国家，长期依赖于资源开发、原材料出口，却始终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就必须依靠不断的技术进步，通过持续不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3. 经济结构出现多重失衡。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起飞阶段，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经济发展将要求形成新的平衡，城乡差距、各社会阶层差距、区域差距都有必要逐步缓解。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十分注重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然而，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4. 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经济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很多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都对外部资源存在较大依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不能对自身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加以调整，国际环境的动荡直接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一直面临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困扰，与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脆弱性以及出口主要集中于资源类等大宗商品，易受价格激烈波动影响，对其国际收支平衡形成直接的冲击等因素有关。

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一）“人口红利”减弱

“人口红利”是支撑我国前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流动迁移人口高峰时期即将到来。老龄化问题、劳动参与率降低是影响人口红利减弱的重要原因。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15 年前后停止增长，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预计在2015 年达到9.6%。有学者预计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将在未来5-10年后消失。

（二）经济增长动力不协调

我国经济增长不协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不协调，体现在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失衡，消费特别是最终消费占比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二是外部不协调，经济增长内需不足，严重依赖出口，外贸顺差过大。

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近年由于消费增长速度落后于投资扩张，导致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投资率不断上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总体偏低，从2000年的46.2%持续下降到2009年的35.6%，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远低于世界平均60%以上的水平。尽管计算口径同国外不完全可比，但也说明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对出口严重依赖，经济增长受出口状况影响较大。上述原因，增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风险，导致与一些国家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加剧了经济增长中的不稳定因素。

表2 2000年以来中国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年份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贡献率 (%)	拉动 (百分点)	贡献率 (%)	拉动 (百分点)	贡献率 (%)	拉动 (百分点)
2000	65.1	5.5	22.4	1.9	12.5	1.0
2001	50.2	4.2	49.9	4.1	-0.1	——
2002	43.9	4.0	48.5	4.4	7.6	0.7
2003	35.8	3.6	63.2	6.3	1.0	0.1
2004	39.5	4.0	54.5	5.5	6.0	0.6
2005	37.9	4.3	39.0	4.4	23.1	2.6
2006	40.0	5.1	43.9	5.6	16.1	2.0
2007	39.2	5.6	42.7	6.1	18.1	2.5
2008	43.5	4.2	47.5	4.6	9.0	0.8
2009	47.6	4.4	91.3	8.4	-38.9	-3.6
2010	36.8	3.8	54.0	5.6	9.2	0.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三）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持续不断扩大。这一趋势可从两个方面得到佐证。一是用于衡量居民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低于此值表明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均衡，而高于此值则社会财富分配开始扩大。根据世界银行

的数据，欧洲、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0.36之间，而中国这一指标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激增至现在的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33（如果加上隐性收入，实际比例可能更高），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相差15倍。二是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减小。近年来，我国市场机制在总体强化的同时，要素回报却出现向政府和资本集中的情况。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从1983年56.5%的峰值下降至2007年39.74%的最低点，24年内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现行分配制度对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约束不力，对弱质产业和弱势群体保护不力，对高收入调节不力，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过大财产差别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调节，由分配差距过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凸显，收入分配改革日益紧迫。

（四）体制机制创新相对滞后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有持续的制度建设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作为保障。近年我国的改革步入攻坚阶段，难度加大，改革步伐相对较慢，改革形成共识难、阻力大。目前，我国在体制机制创新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1）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问题。（2）财税体制有待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不匹配、税种体系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3）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小型金融机构匮乏，金融创新不足，创业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以及科技金融工具不足等。（4）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初次收入分配调控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5）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普遍存在，政府在提供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职能有待强化。

（五）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增加

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为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

（1）土地愈加稀缺。我国可利用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3，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不断扩大，加上生态退耕和灾害损毁，耕地资源压力增大。到2010年末，我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已逼近“18亿亩红线”。（2）能源消耗严重。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9.5%。我国主要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25%-95%。目前，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耗国。2011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并且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汽车消费增加和工业化进程继续，石油消费还将快速增加。（3）矿产资源约束加大。我国属于矿产资源大国，但从人均矿产资源来看，又是一个矿产资源贫国，尤其是一些战略性矿产资源和支柱性重要矿产国内供给难以满足需求。（4）环境污染严重。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大气污染严重，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二是城市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处理率偏低；三是

固体废弃物处理利用率不高。此外，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危险物污染等问题在很多地方也日渐突出，甚至有些污染已由城市蔓延至城镇乡村。

三、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尽管近年来我国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种种迹象，但是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增长潜力依然较大，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快速发展期

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从国际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通常是高速增长期，如韩国1962-2000年平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长达38年；新加坡1960-2000年平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达40年；台湾地区1951-2000年平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达49年。按照我们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30年实现更高水平工业化、城市化一系列目标，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未来的10-20年里，在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二）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城镇化是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3%，仅为美国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韩国1970年的水平。就全球范围内而言，我国人均GDP比中等收入国家仅低4.4%，但城镇化相对滞后率却达到10.4%，相差6个百分点。世界城镇化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70%的水平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才稳定下来，如果我国的城市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近20年才能达到70%左右。根据有关方面估算，目前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至少需要10万元，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再加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投资以及个人消费增长，潜力都十分巨大。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将成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三）区域经济结构差异是我国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存在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推动力呈现出梯度状态，从而持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如果说以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推动力，那么伴随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中部崛起的加速，即使东部发达地区增长速度逐渐放慢，西部和中部也有可能进入高速增长期。此外，各地根据当地优

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 济结构性效益，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经济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事实上，中西部的发展潜力近年来已经逐步显现，2012年上半年，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明显，与上年同期相比，几乎下降了2/3。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西部省区市的经济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而且中西部地区有很强后发优势，市场广阔，资源、劳动力比较丰富，又有效承接了东部地区产业的转移。

（四）发挥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1978年以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并有继续走低的态势，2001-2010年，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8.6%，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4%下降到33.8%。与此同时，美国居民消费率是70%，是我国的两倍，这表明我国居民消费提升空间巨大。人口规模是市场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我国人口规模全球最大，是美国人口的4.3倍，欧元区人口的4.1倍。收入层次多样化构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目前，我国处于国际公认的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时期，扩大内需和新一轮消费潮将带动我国更长久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沪、京、粤、浙等地区，消费结构升级表现尤为明显，汽车、住房等更高档次的消费品已率先进入富裕家庭。“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随着国家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力度，居民收入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的占比将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持续扩大，从而显著增强居民消费的可持续性，使居民消费数量和品质进一步提升。启动国内居民消费，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五）人力资本红利正在形成

当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消失，但是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延长受教育年限等办法，提高劳动者素质，将会获得新的人力资本红利。一般而言，劳动人口是通过构造不同年龄—性别组的劳动参与率，然后加总获得的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可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量增加。另外，从人力资本上看，由于教育的大发展，我国正在大规模获得人力资本红利，从而抵消人口红利衰减产生的负面作用。自2000年开始，我国开始出现净人力资本红利，到2030年，人力资本红利不断提高，其中，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和提高教育质量，将是获得人力资本红利的主要途径。

表3 中国净人力资本红利（单位：%）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比重	21.7	23.3	22.2	21.4	19.7	17.7
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比重	17.6	20.0	24.1	24.1	26.8	27.2
中国净人力资本红利	-4.1	-3.3	1.9	2.7	7.1	9.5

注：总人力资本=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数；净人力资本为总人力资本占世界的比重减去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比重，以反映在世界范围内一国或地区通过教育红利所表现的净人力资本红利，负号表示的是人力资本负债。

资料来源：胡鞍钢，《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年8月。

（六）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将逐步显现

近年来，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政府、企业的研发投入大幅度增加，技术成果开始涌现。2011年我国研发总经费为8610亿元，是2000年的9.6倍，远高于经济增速，2011年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3%，比2000年提高0.93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是8000项，美国申请了50000项，美国是中国的6倍，但是2010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略有下降，我国申请国际专利增长了30%多，美国与我国的比例下降到3.6：1，按照这个速度，到2015年左右，我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与此同时，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每年还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科技人员加入到研发队伍之中。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较低，在研发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有低成本优势。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突破一批核心和关键技术，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储蓄率降低和资本投入增长放缓的影响减弱，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七）政府战略和政策的主动调整是制度保障

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我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并做出了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面的调整。在整个“十二五”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将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加强调环境、创新、制度建设，更加关注公平和机遇等等。这些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将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质量以及包容性出现重大转变，对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当然，要成功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全球经济不发生类似“大萧条”那样的严重衰退；二是国内社会持续保持基本稳定；三是发展战略及时做出调整，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强调包容性增长和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四是加大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协调和合作，构建和谐世界，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与目标预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从十七大“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到十八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要求。

（一）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测算，2020年我国大致可以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我国200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858元。2020年要比这一水平翻两番，即提高400%。分解到20年中，平均每年的实际增长率约为7.2%。而截至到2010年的前十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比2000年平均增长了8.3%，以后十年，只要年均实际再增长4.6%，就可以实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由于价格因素，前十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平均为4%。后十年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考虑到未来价格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有所回落，因此设后十年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平均为3.5%。则后十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实际增4.6%，相应的名义增长是每年8.3%。由此以2011年实际数推算后十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情况如下：

表4 按2011年人均GDP推算中国未来十年的增长情况

年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年均实际增长（%）	年均名义增长（%）
2011	3.50	4.6	8.3
2012	3.79	4.6	8.3
2013	4.10	4.6	8.3
2014	4.45	4.6	8.3
2015	4.81	4.6	8.3
2016	5.21	4.6	8.3
2017	5.65	4.6	8.3
2018	6.12	4.6	8.3
2019	6.62	4.6	8.3
2020	7.17	4.6	8.3

以上推算，2020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人民币7万多元，大约相当于1.1万美元以上。如果从现实情况估计，这种推算还是比较保守的。在正常情况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几乎不可能低于5%，最大可能应在5%至7%之间。如果增速在这样一个区间，2020年前后，我国就可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二）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来测算，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7万元(约合1.2万美元)以上的水平

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71564万元。未来十年按前高后低，前五个按年均实际递增7%，后五年按年均实际递增5%，缩减指数仍按3.5%，则未来十年的年均名义增长为10.7%—

8.7%。人口按年均增长5%考虑。则2011-20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推算如下：

此种推算考虑了我国未来十年前高后低的增速, 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7万元, 约合1.2万美元以上。该推算考虑了国际经济发展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转型与结构调整, 为更稳妥的发展预留了一定空间。尽管如此, 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可超过1.2万美元。相比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近年仍在人均5000到1万美元之间徘徊的国家, 如果我们能在经济体制等相关方面取得新突破, 则对于我国加快发展, 跨跃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新的、更大的推动, 未来的发展将会超出此前的惯性预测,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万两千美元提高到1.5万美元也是可能的。按照预测, 仅从人均总量指标来说, 再用10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 我国将可以成功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表5 按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推算中国未来十年的增长情况

年度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名义增速 (%)	平均人口 (万人)	增长率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2011	471564		134258		3.5
2012	522021	10.7	134929	0.5	3.9
2013	577877	10.7	135604	0.5	4.3
2014	639710	10.7	136282	0.5	4.7
2015	708159	10.7	136963	0.5	5.2
2016	769768	8.7	137648	0.5	5.6
2017	836738	8.7	138336	0.5	6.0
2018	909535	8.7	139028	0.5	6.5
2019	988664	8.7	139723	0.5	7.1
2020	1074678	8.7	140422	0.5	7.7

(三) 基尼系数显著降低, 国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在保持总量指标持续发展的同时, 必须保持相对公平的结构性指标。虽然世界银行是按人均GDP, 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 但是高收入国家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生产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在人均水平达到高收入标准之下, 还应包含社会公平性的结构特征。据世界银行和国内研究机构的推算, 近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左右。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遇到障碍的国家多数收入差距过大, 如阿根廷0.46(2009年)、墨西哥0.48(2008年)、巴西0.55(2009年)。从这个意义上说, 如果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上不能做出明显的改善, 不仅损害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 也会使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实际意义大打折扣。从东亚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跃中等收入阶段的实例看, 在这一阶段并不存在一个先扩大、再缩小差距的过程, 而墨西哥在收入差距过大之下, 人均GDP从1990-2005年的年均增加速度只有0.5%, 这应当引到我们的高度警惕。我国应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调节收入差距的成功经验, 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初次分配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入手, 再分配从收

入、消费、财产的税收调节入手，在社会保障方面提低限高，尽快出台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决心将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到2020年控制在0.4或以下。

综上所述，我们仍可将2020年作为我国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时间目标，而基本条件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克服体制性障碍，有效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优化国民收入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调动国内劳动创造的积极性，才能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未来经济社会的跨跃式发展。从世界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看，东南亚有关国家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拉美国家现在已经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我国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至2020年前后如果能在优化内部结构的条件下接近或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则可用18年时间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跃。

五、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回顾过去30年，我国顺利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下等收入”国家，成功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即“低收入陷阱”），接着从“中下等收入”国家跨越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称道。然而，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应从以下几方面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

（一）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实现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最新变化，对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做出及时的调整。

1.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平衡市场与政府的力量。伴随着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改革也进入了纵深阶段。与以往相比，完善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明确的，但面临的困难也更大，许多领域的改革都进入深水区。我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全面推进改革，打破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理顺各经济主体利益关系，激励和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从改革中获取更大红利。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真正发挥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基础作用。

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兴主导产业。经济和人口大国要求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全球化分工则要求在产业发展上有所侧重。优化产业结构首先是保证已经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继续发展，加强这些产业在增加就业、吸纳投资、引进技术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还要发现和培植一些对就业、收入、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有积极正向作用的新兴优势产业，推动增长的可持续性；此外还要特别注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以及统筹考虑能源的消耗和环境问题。

3.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努力挖掘产业区域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前十年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和社保等

方面都极大改善。为产业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未来一段时期，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步伐，运用经济而非行政手段，鼓励、引导和支持产业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建立良性的区域竞争和产业转移秩序。一方面防止相似环境区域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恶性竞争，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上过于让渡和缺乏应有的原则；另一方面是承认相关产业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的现状，但同时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保护和跟踪，防止落后产能向经济落后和环境脆弱地区转移。

4. 协调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的经济总量、产业、人口和环境承载力要求未来的发展必须考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资源节约要求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要以集约发展为导向，节约有限的土地、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则强调产业发展不能以环境严重破坏和污染为前提，特别是在产业转移、落后地区 and 资源聚集地区的发展和开发，必须严格考量对环境的负面作用。

（二）推动经济增长由生产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1.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一是，在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已达到4%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二是，强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欠发达地区的责任和投入义务，这不仅符合公平原则，这些领域的投入回报率也更高；三是，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把发展重点从前些年的规模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在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的基础上，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四是，健全医疗保险制度，提升全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五是，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在某些行业稍延长退休年龄，尤其是女职工的退休年龄。

2. 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型经济”，关键是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全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和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和创新团队。围绕区域发展布局，深化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推动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

3.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引领作用。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是企业创新和应用，以及相配套的财税支持措施。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和方式，完善并落实财税金融等各类激励措施，进一步增加全社会科技投入，制定促进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企业把技术创新作为内在需求，不断改进产品，满足社会需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

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工作，促进技术交流和交易，支持海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推动科研机构和企业“走出去”。加强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重点产业振兴。加快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批产业特色鲜明、技术水平较高、规模优势明显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优化战略必须使收入分配制度真正起到调动广大群众劳动创造积极性，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持久、有效的推动力。同时，通过维护市场平等竞争的秩序，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使社会收入分配结果更加和谐，体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宗旨。

1. 工资收入增长战略。工资作为劳动报酬是广大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收入分配优化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广大职工逐步提高工资收入。近10年我国工资分配的基本态势是：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下降，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持续下降。为此，要在未来5-10年间，把工资增长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重点调控目标。从一般水平看，应当考虑我国不断进步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参照中高收入国家的工资率建立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和调控目标。从正常增长机制看，应当使工资总额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步，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以此制定工资指导线来引导企业和社会提高广大职工的工资水平。从实现方式上看，尽快建立有效的企业工资内部协商机制，为提高职工工资收入提供机制上的保证。这一战略对于提高我国劳动力质量，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收入差距缩小战略。在提高社会整体工资水平的前提下，优化人群内部分配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市场经济应容许收入差距，但这种差距应是因公平竞争而来，不能靠垄断和破坏市场秩序而来。考虑到我国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是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且市场垄断是其中最主要的诱发因素，所以我国应加快建立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实施有效的反垄断政策，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使资源分配、占有和使用摆脱权力的干扰。在维护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基础上，以税收和保障制度对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特别是建立体现公平税赋的综合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制度体系，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扶持政策，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改善广大群众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为国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利益引导和社会和谐氛围。

3. 收入结构优化战略。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结构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模式与质量，决定着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体现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目的。我国政府要实现职能转变，对市场失灵的地方进行干预，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在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打造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要着眼于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特别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同时提高中小企业在企业部门的分配份额，应成为有关规制的常态。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追求三者分配格局的优化，着眼于在经济增长与分配政策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防止行政过度干预市场，避免政策的随意性，伤害劳动就业、合理消费、民间财富积累和投资积极性，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坚持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政策。

4. 收入机会公平战略。为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必须维护社会主体之间在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基础上的市场竞争。首先，要打破所有制、区域、身份等界限，使各竞争主体能基本享有均等的市场机会，从而有参与市场分配的资格条件。其次，对市场主体除个人能力以外的非主观条件加以限制，对食利行为进行有效调控，尽快开征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遗产和赠与税，引导收入机会主要靠个人努力而非寄生性手段。最后，要实行更加包容和均等化的公共健康战略和教育发展战略，保障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障广大新成长劳动力不受地区、城乡、贫富和民族的影响，都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实用的知识技能，防止贫困人群的代际传递。收入机会公平政策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广泛共识，也是市场机制下通行的收入分配基本政策，对我国理顺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保证经济增长具有内在活力并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具有长远意义。

（四）可持续、低碳的城市化战略

可持续、低碳的城市化，是用系统、综合、辩证的观点正确处理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相互关系，通过城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环境生态建设相统一的途径，既满足于当代城市现实需要，又满足城市未来长远需要的发展方式。

1. 城市化布局战略。当前，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与国家主体功能区紧密结合，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布局。二是，力行节约和低成本，建设集约型城市。三是，限制特大城市过度扩张，以中等城市为城镇化的重点。四是，城镇化要以保证耕地和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为先决条件。五是，促进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完美结合。

2. 城市绿色交通战略。优化城市交通模式，提高公共交通的分担率；通过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发展城市低（下转第6页）

逐步开放外汇市场 助推人民币跨境使用*

周先平 邓 伟

摘要：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中国一项中长期发展战略。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性加强，单纯开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已经无法为RQFII、“三类机构”等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提供对冲汇率风险的渠道和手段。有必要按照按需原则对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逐步开放外汇市场，允许他们进入外汇市场直接进行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助推人民币跨境使用。

关键词：人民币跨境使用 汇率风险 外汇市场开放

作者简介：周先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邓 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受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发展非常迅速。离岸人民币市场无法完全满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融资、投资和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为了满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投资需求，中国推出了RQFII制度，允许“三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和酝酿之中的资本市场“国际板”，能够部分满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融资需求。但是，目前缺乏对冲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汇率风险的渠道和手段。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性加强，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大。有必要按照按需原则，对RQFII、“三类机构”等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逐步开放外汇市场，允许它们进入外汇市场直接进行交易，为其提供对冲汇率风险的

* 本文为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1YJC790309）和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JY110）研究成果。

渠道和手段，降低持有人民币头寸的风险，助推人民币跨境使用。

一、受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迅猛发展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中国一项中长期发展战略，2012年9月正式公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目标之一是“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扩大”。自2009年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以来，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从最初的贸易结算扩大到资本项下结算，业务量迅速增加。

（一）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受到政策强有力的推动

从业务开展的地域看，跨境人民币结算由最初的五个试点城市逐步扩展至全国。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4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7月1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公布。2010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境内试点地区由5个城市扩大至全国20个省市，境外地域不再受到限制。201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试点区域扩展至全国。

从业务开展的领域看，跨境人民币结算从最初的货物贸易扩展至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性项目，并逐步向资本项目扩展。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明确了货物贸易中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操作模式、结算流程，以及企业进出口报关政策和出口退（免）税等。2010年6月颁布的《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人民币结算范围扩展到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为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还组织开展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结算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其他机构发布了《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关于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按照规定，境外央行、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境外参加行等“三类机构”可以将人民币资金投资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内企业可使用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境外企业和经济组织在遵守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法律法规的条件下，也可使用人民币来华开展直接投资，符合一定条件的境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可使用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证券市场，银行和境内机构可向境外机构和境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

（二）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迅猛发展

受政策强有力的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迅猛发展。截至2011年底，同境内发生

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的境外国家和地区已达181个，覆盖全球近80%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支付手段。据SWIFT统计，2011年人民币支付总规模排名全球第17位左右，菲律宾、尼日利亚等国家已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

截至2011年底，全国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2.6万亿元，至2012年7月累计实现4万亿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收付比大幅上升，由2010年的1:5.5升至2011年的1:2.9，2012年第三季度进一步上升至1:1.2，进出口人民币结算收付比逐渐均衡，人民币“跛脚”国际化担忧变得多余。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量稳步上升，2011年全年累计办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结算金额201.5亿元，外商直接投资结算金额907.2亿元。2012年前三个季度，对外直接投资结算金额221亿元，同比增长50.9%，外商直接投资结算金额也达到1545.1亿元，超过上年全年累计金额。截至2011年底，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合同金额约532亿元，贷款余额319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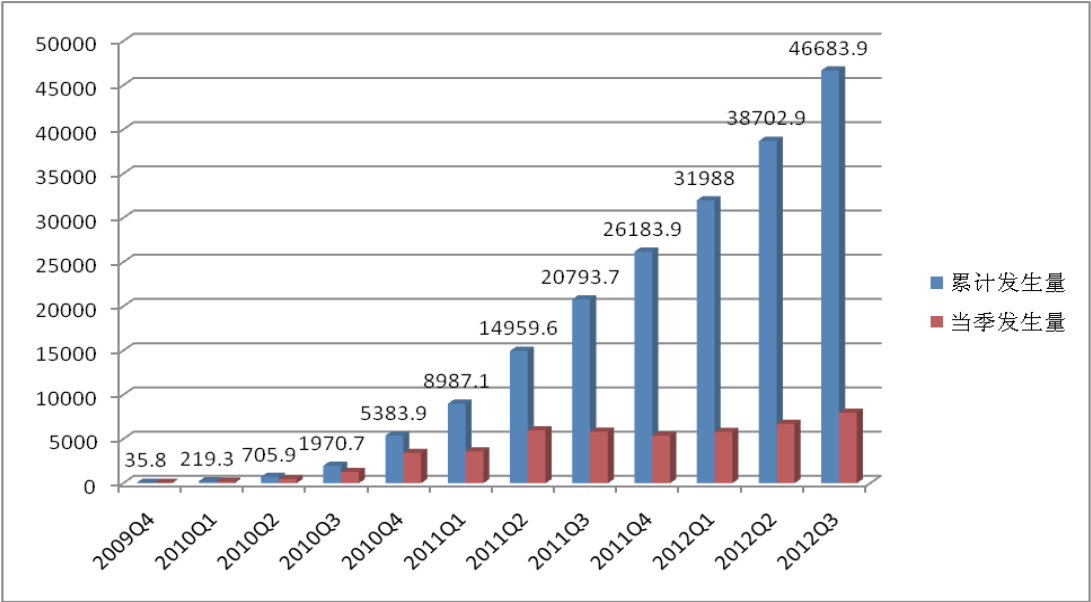


图1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人民币跨境结算背景下需要提供投资、融资和规避汇率风险的渠道

随着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迅猛发展，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会产生人民币投资、融资和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都无法与在岸人民币市场相匹敌，离岸人民币市场无法完全满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投资、融资和规避汇率风险的

需求，开放在岸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了满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投资需求，中国推出了RQFII制度，允许“三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和酝酿之中的资本市场“国际板”，能够部分满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融资需求。但是，目前缺乏对冲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汇率风险的渠道和手段。

（一）人民币跨境使用催生境外人民币投资、融资和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

人民币跨境使用以后，越来越多的境外银行会与境内结算银行进行人民币购售和拆借交易，很多境外银行会在境内结算银行开设人民币账户。这些境外银行希望境内结算银行对其人民币账户提供管理服务，境内银行需要为其量身定做人民币现金管理和投资理财方案，包括在货币市场的拆借和融资。对中国拥有顺差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实行人民币结算以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会拥有人民币净资产，必须为这些人民币资产提供投资和对冲汇率风险的渠道和手段；对中国拥有逆差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实行人民币结算以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会拥有人民币净负债，必须为这些人民币负债提供融资和对冲汇率风险的渠道和手段。境外人民币的投资渠道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回流中国，投资中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境外人民币的融资渠道包括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融资，这些都涉及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

（二）离岸人民币市场无法与在岸人民币市场相匹敌

从理论上讲，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可以在离岸人民币市场进行投资和融资，也可以在离岸市场对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但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非常不完善。香港地区是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截至2011年底，香港与内地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金额占同期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总额的64%，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机构数超过130家，发放人民币贷款仅256亿元，人民币存款为5885.29亿元。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也比较小，自2007年以来累计发行人民币债券1800亿元。离岸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起步较晚，且均属于无本金交割的产品（NDF），交易品种少，无法满足多样化的人民币投资需求。

就市场体系、市场规模和交易品种而言，离岸人民币市场根本无法与在岸人民币市场相匹敌。2011年，人民币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33.4万亿元，同比增加20%，日均成交1338亿元；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累计成交99.5万亿元，同比增长13.5%，日均成交3978亿元；截至2011年底，货币市场基金资产净值达到2948.95亿元，同比增长92.39%；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15.1万亿元，同比增长23.8%，期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6.7万亿元，同比增长18.7%；2011年，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35538亿美元，同比增长16.7%；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金额17710亿美元，同比增长38.0%，其中隔夜美元掉期成交10220亿美元，占掉期总成交额的57.7%；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2146亿美元，同比增长556.8%；“外币对”累计成交金额折合946.7亿美元，同比增长42.1%。

（三）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投资需求能够部分满足

为了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部分满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投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发布了一系列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政策。2010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境外央行）、香港和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港澳人民币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境外参加行）等三类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运用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境外机构依法持有的人民币提供了合理的保值渠道，能够有效增强非居民对人民币的持有意愿，增大人民币的对外流动性。

2011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以其合法持有的人民币在中国内地开展直接投资活动并办理相关人民币结算业务，但对投资范围进行了相应限制。

2011年12月16日，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业务正式启动。该办法允许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运用在香港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开展境内证券投资业务，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一种安全高效的投资通道。2012年11月13日，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增加2000亿元RQFII投资额度，试点总额度达到2700亿元人民币。

（四）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融资需求能够部分满足

为了部分满足境外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允许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2011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机构经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使用人民币资金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所有权、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等权益。

2012年3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允许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境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包括但不限于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以及出口买方信贷等。

三、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面临的汇率风险加大

（一）人民币汇率波幅放大成为常态

2008年年中至2010年6月约两年时间，人民币实际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政策，双边汇率一直保持在6.83上下。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形成机

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性加强，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面临的汇率风险加大。2011年，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日间最大波动（最高价-最低价）平均为96个基点，2010年为70个基点；交易价相对中间价的日间最大波幅平均为0.18%，2010年为0.10%。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最高为6.6349元，最低为6.3009元，全年244个交易日中，交易价在71个交易日处于中间价升值区间波动，58个交易日处于中间价贬值区间波动，115个交易日围绕中间价上下波动。2011年最大单日升值幅度为0.30%（187点），最大单日贬值幅度为0.22%（139点）。

2012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波幅区间从0.5%扩大至1%，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1%扩大至2%，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将会形成更具弹性的走势，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将成为常态。

（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

除了汇率的双向波动加强外，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2011年初至9月中旬前，境内外均维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预期。但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等外部、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人民币升值预期震荡减弱，境外和境内人民币汇率预期相继在2011年9月下旬和12月上旬由升转贬。2011年，境内外远期市场1年期报价隐含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幅度最高分别为1.9%和3.0%，人民币贬值预期幅度最高分别为0.6%和1.8%。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加大，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人民币汇率不确定性增大，境外企业和个人持有人民币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更大。

四、目前外汇市场不能很好地为境外居民提供汇率风险规避服务

在境外持有人民币的主要风险是汇率风险，随着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加大，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必然会产生规避汇率风险的现实需求。但目前外汇市场存在市场准入门槛高，交易品种少，市场规模小等问题，不能很好的为境外居民提供汇率风险规避服务。

（一）外汇市场准入门槛高，交易主体单一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会员制，交易对象限定为交易所会员。截至2011年底，外汇市场上共有318家外汇指定银行为企业、个人提供本外币兑换业务，其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银行间外汇市场总交易量的大部分，人民币外汇远期、掉期和期权市场会员分别有73家、71家和27家。外汇指定机构数量少、结构简单，市场竞争程度和流动性不强，限制了外汇市场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的选择。“三类机构”、RQFII等境

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不能进入外汇市场直接进行交易，而只能通过交易中心会员代理进行，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和资金周转环节。

（二）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有待进一步丰富

人民币外汇衍生品是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工具。由于中国外汇衍生产品市场起步晚，衍生产品种类较少，交易并不发达。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汇市场交易品种，至此，外汇市场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基础类汇率衍生产品体系。但总体而言，中国外汇市场还处于即期外汇为主、衍生品市场为辅的阶段，与国际外汇市场上即期交易居次要地位的状况有根本差异。2011年，人民币外汇市场累计成交8.64万亿美元（日均成交354亿美元），即期外汇交易累计6.25万亿，占比72%，远高于国际水平。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匮乏，导致可供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选择的汇率避险工具较少，无法满足其汇率避险要求。

（三）外汇市场交易规模相对较小

外汇交易量的扩大是外汇市场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相对于经济规模，中国外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市场成交量的份额很小，2004年仅占0.1%，2007年占0.5%，2010年约占0.6%，排名全球第21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数据，2010年国际外汇市场上每天交易量接近4万亿美元；美国、日本每天交易量分别是9600多亿和3300多亿美元；香港每天大约是2570多亿，韩国超过670亿；印度每天的外汇交易量也将近390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2位，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外汇交易规模每天还不到280亿美元。当然，相比2005年上半年的12亿美元，其交易规模已经增长了23倍，但与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还较小，外汇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五、人民币跨境使用背景下外汇市场的开放策略

离岸人民币市场无法完全满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投资、融资和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开放在岸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RQFII制度、对“三类机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只能解决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的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持有人民币头寸的汇率风险无法很好的得到对冲。我们需要按照按需原则，逐步对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开放外汇市场，允许它们进入外汇市场直接进行交易，丰富外汇交易品种，为其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渠道和工具，助推人民币跨境使用，同时需要加强对跨境资金的监测，防范外汇市场风险。

（一）外汇市场开放遵循实需原则

外汇市场开放需要谨慎进行，对交易主体和交易资金性质应该实行实需原则，即只对与人民币跨境结算有关的机构开放，而且只允许与人民币跨境结算有关的资金进场交易。采取实需原则能够保证外汇交易与采用人民币结算的跨境实体经济活动有关，减少外汇投机，保持外汇市场稳定。

（二）逐步向RQFII、“三类机构”等开放外汇市场

按照上述实需原则，首先应该对RQFII和“三类机构”开放外汇市场，然后再对其他机构开放。对已经获得RQFII资格认证的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开放外汇市场比较简单，RQFII在获得认证时，都有相应的投资额度，在外汇市场交易规模不得超过其投资额度。对于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香港和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等三类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开放外汇市场相对要复杂一些，这些主体很容易确定，关键是要严格控制这些机构在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

开放外汇市场也不能操之过急。要进一步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构建简明清晰的法规框架和管理信息系统，加强跨境资金流出的动态监测。同时，还应该对境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行管理，保持境内对人民币汇率及其衍生产品的全球定价权和影响力。

（三）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币种

未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将不断增大，双向大幅波动将成为常态。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背景之下，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亟需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来对冲和管理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因此，未来中国外汇市场要发挥本币市场优势，加快推进人民币衍生产品的创新，扩大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更好地满足境外投资者的不同投资和避险需求，提高人民币资产组合管理绩效，实现人民币跨境储值保值，增加人民币的国际流动性和吸引力，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同时，应继续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人民币对新兴市场货币的交易，放宽人民币对非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兑换业务管制，加快特许兑换点的审批进度，探索建立人民币与周边国家非自由兑换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便利境外投资者管理风险，降低跨境贸易和投资的汇兑成本。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继续改进央行外汇操作方式，降低干预频率，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综合考虑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外资流入、国际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一是应更多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逐步引导市场更多地关注有效汇率变化；二是考虑进一步扩大波动幅度，增强汇率弹性；三是建

立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汇率干预机制，熨平由于投机行为和短期资金集中流动造成的汇率波动幅度，确保人民币汇率以长期均衡汇率为中心，在合理区间内上下波动。

（五）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防范外汇市场风险

开放外汇市场，允许RQFII、“三类机构”等境外人民币头寸持有者进入外汇市场直接交易，必须加强对跨境资金的有效监管，维持金融经济体系稳定。首先，要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预警，及时分析和研判外汇收支形势，全面梳理和查找异常跨境资金流动渠道，构建预警的核心指标，提高对跨境资金流动预判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要积极探索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新思路、新工具和新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压缩投机套利空间。第三，要用好检查手段，保持对“热钱”等违法违规资金的高压打击态势，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监管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信息的披露力度，提高对违法违规跨境资金流动的震慑力，切实防范外汇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 1.车德宇，2012，《推进人民币跨境循环》，《中国金融》第7期。
- 2.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
- 3.刘桂平，2012，《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现状与建议》，《上海金融》第8期。
- 4.李华青，2011，《人民币回流问题研究》，《区域金融研究》第5期。
- 5.林铁刚，2010，《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加快发展》，《中国外汇》第12期。
- 6.孙晶、李涵硕，2011，《推进及战略安排—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视角》，《国际金融》第11期。
- 7.王世光、王大贤，2012，《对当前境外人民币回流问题的研究》，《财务会计》第5期。
- 8.王小奕，2011，《中国外汇市场建设大有可为》，《中国外汇》第4期。
- 9.张大龙，2011，《多措并举推进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中国货币市场》第1期。
- 10.张中华、朱新蓉、陈红，2012，《2012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
- 11.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年报》。
- 12.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 13.周先平，2012，《2012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第5期。
- 14.周先平、张一明，2010，《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投资研究》第2期。

责任编辑：晨乔

· 区域经济 ·

将舟山建设成为 我国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桥头堡

郑新立

摘要： 本文对《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做了重点介绍与深入剖析。文章论述了建设舟山群岛新区的战略意义，介绍了《规划》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基本原则和空间布局，着重剖析了建设舟山自由贸易园区等规划亮点以及要赋予新区的一系列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

关键词： 舟山群岛新区 海洋经济 自由贸易园区 国际物流枢纽岛

作者简介：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国务院于2011年6月批准设立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新区。今年1月，国务院又批准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推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对我国探索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新路径、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务院国函〔2011〕77号文件（《关于同意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批复》）精神，《规划》全面阐述了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基础和战略意义，明确了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从建设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现代海洋产业基地、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海洋科教文化基地和富裕文明的和谐海岛等方面，提出了舟山群岛新区发展的重点任务，提出要在用地用海、财税金融、城乡统筹、管理体制等方面大胆创新，为新区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规划》的制定和批准，是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有了新突破。落实好这个《规划》，加快推进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对探索海洋经济科学发展路径将具有示范意义，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

一、建设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战略意义

舟山群岛新区发展基础良好、战略地位突出，加快开发开放，不断创新实践，努力打造面向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桥头堡，对深入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打造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充分借鉴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地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着力构筑现代产业体系，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使舟山群岛新区打造成为拉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二是有利于构筑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区位和港航条件，加快建设国际物流枢纽，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全力打造更富效率的交流平台和开放高地，有利于迅速提高舟山群岛新区的国际合作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有利于为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提供示范。按照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的理念，在海洋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海洋海岛综合开发、涉海事务综合管理等方面深入实践，更加突出科技创新，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积极探索舟山群岛新区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路径，将为我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创造经验。

四是有利于提高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港航物流服务能力，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铁矿砂中转贸易、煤炭中转加工配送、油品中转贸易储存、粮食中转加工配送、化工品中转储运加工、集装箱中转运输等一批基地，将舟山群岛新区逐步建成我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将大幅提高我国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基本原则

根据国务院批复精神，《规划》提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三大战略定位：即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

五大发展目标：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我们将其概括为“四岛一城”即“国际物流枢纽岛、对外开放门户岛、海洋产业集聚岛、国际生态休闲岛和海上花园城”。

基本原则：《规划》提出，要“尊重规律，科学发展；先行先试，开放发展；转型

升级，高效发展；陆海统筹，联动发展；生态优先，和谐发展”。即要在大开发、大发展的过程中同步推进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实现人海和谐。

三、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空间布局

《规划》明确“一体一圈五岛群”的总体开发格局，“一体”是把舟山岛作为开发开放主体区域，重点打造南部花园城市带、中部重点生态带、北部海洋新兴产业带，构筑“南生活、中生态、北生产”的发展格局；“一圈”指港航物流核心圈，包括岱山岛、衢山岛、大小洋山岛、大小鱼山岛和大长涂岛等。其中，岱山岛近期积极发展临港制造业，远期规划建设大宗商品加工和区域性国际港航服务平台。衢山岛及周边的鼠浪湖、黄泽山等岛，规划建设国际燃油供应中心和矿砂、煤炭等大宗商品深水中转中心。大小洋山岛以集装箱运输、保税物流及相配套的加工增值综合服务功能为重点，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港航配套服务中心。大小鱼山岛主要发展临港工业和大宗商品加工。大长涂岛主要发展原油储运。“五岛群”指普陀国际旅游岛群、六横临港产业岛群、金塘港航物流岛群、嵎泗渔业和旅游岛群、重点海洋生态岛群。

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规划》的突出亮点

《规划》中创新点、亮点很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其中最为突出的亮点是在规划中明确提出，条件成熟时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贸易园区，逐步研究建设舟山自由港区，打造国际物流枢纽岛和构建陆海统筹的基础设施体系。

（一）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贸易园区

在舟山建设自由贸易园区，是规划的最大亮点，也是规划报批过程中争取难度最大、突破程度最深的重大事项。

1. 自由贸易园区与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与自由贸易园区类似的六类特殊经济功能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尽管这些海关特殊监管区都具有“自由贸易园区”的某些特征，但目前我国尚无与“自由贸易园区”完全对应的区域。

自由贸易园区与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相比，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最显著特征是，实行“境内关外”的管理制度。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关税、增值税，流通可减免流通税，通关速度和便利程度将大大提高。自由贸易园区将赋予区内对外贸易更广、更深层次的自由度，进一步扩大区内开放程度，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在物流仓储、贸易服务、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多方

面开辟新的增长点，拓宽业务领域，以改变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过于依赖货物贸易的局面。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境内关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境内关内”到“境内关外”的转变还将使自由贸易园区内的人员流动更加便捷，简化手续，提高效率，这也是自由贸易园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

2. 设立舟山自由贸易园区时机已经成熟

从国外经验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来看，我国要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应当将建设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新的对外开放举措。建设舟山自由贸易园区，一是建设我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保障国家战略物资供应安全的需要。二是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配置全球资源的需要。三是创新我国海关监管模式、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四是实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

3. 建设舟山自由贸易园区的有利条件

目前，国内要求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并进行试验探索的地区很多，尤其以上海和天津的呼声最高。《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08〕26号文件中提出“加快建设东疆保税港区，条件成熟时，进行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的改革探索”。上海已正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并将试点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列为2013年上海市政府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认为，从各地的进展来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在舟山建设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港区，并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在国务院批复的相关规划文件中尚属首次，表明舟山在建设自由贸易园区的目标和探索上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舟山建设自由贸易园区也有着其他地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一是监管方便，舟山四面环海，又建成跨海大桥，这种既自然封隔、又交通快捷、体量适中的独特优势，十分有利于先行先试自由贸易园区，具有其他沿海城市所没有的对外开放条件。二是辐射很广，舟山位处我国海岸线和黄金水道的T字型交汇处，能够辐射到全国整个南北海岸带和长江流域，具有十分明显的区位优势。三是功能特殊，舟山主要以大宗散货自由贸易为主，不会对周边城市的发展产生挤压效应。四是风险最低，舟山经济规模较小、人口较少，不会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4. 自由贸易园区的实施步骤

《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舟山推进自由贸易园区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第一步，加快建设舟山港综合保税区。根据国务院批复精神，舟山综合保税区建设要充分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现行政策，充分吸纳国内其它地区综合保税区建设的做法与经

验,将其整合与提高。围绕舟山群岛新区的重点产业优势,试点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税收、离岸金融业务和租赁业务等。利用综合保税区的特殊功能和政策优势,为出口加工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第二步,选择合适区域建设舟山自由贸易园区,实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政策。不仅要借鉴和遵循国际惯例,还要兼顾国情和舟山群岛新区实际,形成与国际接轨、同时具有中国和新区特色的舟山自由贸易园区制度设计,其基本内容是实行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和运输自由,打造我国经济活动自由度最高、最活跃的地区。一是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管理制度。自由贸易园区的核心功能是贸易自由化,取消贸易保护政策和限制措施,放开各类经济主体的贸易经营限制,允许经济主体按照国际公约自由开展贸易活动。二是建立开放型的投资经营体制。允许投资者自由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建立较区外更加开放的投资经营体制。促进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升级,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鼓励跨国公司在贸易园区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由加工装配环节向上下游延伸。三是大力开展金融制度与产品创新。允许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或全能型银行机构开展混业经营,提供授信、结算、证券、保险、租赁、衍生品交易等金融服务,形成多元化、立体式、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循序渐进推进离岸金融制度改革,先实施内外分离型(即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要专门开设离岸业务账户,将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严格分离);再逐步过渡到内外渗透型(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资金可以在一定限额内相互渗透)。同时,逐步放开外汇管制,自由贸易园区内离岸市场无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区内非离岸市场允许人民币和自由兑换的外币同时流通,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出口和投资允许人民币计价结算;取消个人结汇、购汇额度等。四是人员和运输自由。市民可以在自由贸易园区内居住,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可以自由买卖区内的外来商品;对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实施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

第三步,在中远期争取将舟山全境建立类似新加坡、香港的自由港区。在建设舟山自由贸易园区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借鉴新加坡、香港自由港经验,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最终在舟山群岛新区全境实施自由港政策,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我国长三角地区和长江流域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

(二) 建设国际物流枢纽岛

《规划》提出要将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舟山国际物流枢纽岛的建设正是顺应了国家这一迫切要求。同时,从自身条件来看,舟山群岛真正能体现全球一流水平、最具国家战略意义、最具稀缺价值的,就是舟山优越的

战略区位、丰富的港口资源和以岛屿为基地的战略资源储备条件。舟山国际物流枢纽岛的建设有利于集中建立大宗物资国家战略储备基地，方便地向长三角以及更广阔的腹地进行中转，保障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供应安全。

1. 舟山国际物流枢纽岛的内涵

舟山国际物流枢纽岛在港口物流模式、辐射区域和海洋经济等方面将形成独特的内涵。

以“大进大出”为特征的港口物流模式。舟山港物流目前仍处于简单的中转储运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向以“大进大出”为特征的综合商贸型港口物流转型。要在装卸仓储、中转换装、运输组织等传统港口功能的基础上，深化加工、配送、贸易等功能，拓展金融、信息、保税等功能，延伸物流产业链，构建港口综合服务体系。

面向东南亚、辐射太平洋的国际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基地。舟山与釜山、高雄、香港、新加坡等西太平洋主力港口构成近乎等距离的扇形海运网络，是江海联运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主要海上门户。舟山要成为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大宗商品的储运中转加工中心，以进口战略性大宗商品为主。从区位条件和地理特征来看，舟山具备打造面向东南亚、辐射太平洋的国际大宗商品物流圈的基础和条件。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进口量将持续上升。目前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掌握在国外寡头企业手中，中国缺少“定价话语权”。舟山要以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为支撑，推进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建设，积极开展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探索大宗商品中远期和期货交易，充分发挥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把舟山打造成全球大宗物资定价中心。

开发海洋经济、保障海洋权益的重要载体。结合港口物流、大宗散货与战略物资储运、船舶工业、清洁能源开发等，增强我国海上能源、海洋矿产、船舶工业、海洋装备工业等实力。积极向西太平洋拓展战略空间，开发、拓展和保护我国海洋空间和油气、海底多金属结核等海洋战略资源。建设国家战略物资枢纽港，增强舟山为国家能源安全服务的战略物资储备中转能力，确保我国南北连通、江海直达、东出太平洋、南下台湾海峡的贸易通道安全。

2. 舟山建设国际物流枢纽岛的空间布局

在前期开发岙山、册子、马迹山、小洋山、凉潭、老塘山等港区的基础上，利用优越的深水岸线资源，集中建设岱山岛、衢山岛、大小洋山岛、大小鱼山岛和大长涂岛等港区，形成舟山国际物流枢纽岛的核心区域。

3. 舟山建设国际物流枢纽岛的主要工作

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

支撑系统“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要求舟山建设国际物流枢纽岛应做好以下工作。

要加快深水泊位码头开发建设。以第四代港口为目标，加快功能明确的岛链式国际深水生态港群开发。积极推进外钓、鼠浪湖、黄泽山、双子山、东白莲、湖泥等国际性岛屿深水港口集群建设。重点开发衢山、大长涂、六横、金塘、大洋山和舟山岛北部等岸线，建设面向全球的深水化、专业化、高能级生态港群。

提升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能力。依托深水泊位，建设大长涂港区油品储备贸易园区、衢山港区大宗散货储备交易园区、六横港区综合物流园区、舟山岛西北部石油天然气化工交易物流园区、老塘山国际粮油储运加工物流园区、金塘综合物流园区、洋山港区综合物流园区，打造全国重要的油品、LNG、铁矿砂、煤炭、粮食和化工品等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基地。规划建设金塘、六横和洋山等集装箱码头，打造以“水水中转”为特色的集装箱转运基地。有序布局岛屿型、现代化、规模化的原油、煤炭、木材、粮油、矿砂等大宗商品加工项目，促进大宗商品加工业的发展。

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推进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形成煤炭、矿砂、石油化工品、LNG、船舶、钢材、粮食等品类齐全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体系，推进交易中心核心功能创新、交易和结算模式创新、上市交易品种创新，逐步形成“舟山价格”、“舟山指数”，建成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辐射世界的国际性大宗商品综合交易、结算和定价中心，增强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发展大宗商品航运服务业。优化组建大型运输船队，积极参与国家战略物资一程运输，拓展国际一程运输市场。打造我国“海进江”二程运输船队，成为国家江海联运枢纽。推进中国（舟山）海洋科学城港航综合商务区和小干海上金融商务区建设，吸引船舶融资、航运租赁、金融仓储、航运结算、航运保险等涉港涉海现代服务业集聚。

（三）陆海统筹基础设施

国务院“3+5”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要将新区建设成为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要推进陆海联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陆海污染同防同治，加强国内区域合作，促进产业对接和优势互补，探索海陆统筹发展新模式。

新区规划尤其对建设陆海联动的基础设施体系进行了重点布局，要求统筹交通、水利、能源、信息、防灾减灾等重大基础设施，为新区发展提供保障。其中重中之重的工作是要完善综合交通网，进一步加强连岛通道建设，形成连接上海、宁波快速便捷的陆岛交通联系。也就是要建设环杭州湾东方大通道，形成舟山—岱山—大洋山—上海奉贤海上陆路大通道。

1. 环杭州湾东方大通道主要建设内容

根据交通部规划研究院《环杭州湾东方大通道战略研究》，其主要建设内容可分为二段：一是上海奉贤至嵊泗大洋山岛的公铁两用大桥。目前，上海方面已将此工程列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并在奉贤预留至大洋山的铁路接口（由上海方负责实施）。二是舟山本岛-岱山本岛-大洋山岛的跨海大桥。交通运输部在国家公路网布局研究中指出，要在原有国高联络线甬舟高速（宁波-金塘-舟山）的基础上，将舟山-岱山-嵊泗公路通道纳入国道调整方案。铁道部提出，要规划研究舟山岛-岱山岛-大洋山岛-上海的铁路及甬舟铁路。这表明环杭州湾东方大通道在规划层面已获得国家和上海市的支持。

2. 建设环杭州湾东方大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构筑陆海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有利于以陆带海、以海促陆、陆海联动、统筹发展，形成抢滩登陆上海、北接江苏山东、南连福建的海陆交通大通道。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沿海交通网络，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两翼齐飞”，完善国家区域开发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有利于扩大舟山港对长三角、长江流域、全国沿海和东北亚地区的辐射能力。舟山港口功能局限于水水中转，无法发挥最大效益和辐射功能。建设东方大通道可实现水路、公路、铁路直接对接，扩大舟山港口后方辐射陆域。三是有利于扩展浙江发展空间，加快建设“两富浙江”。浙江土地资源有限，充分利用海洋空间，建设环杭州湾东方大通道，形成继绍嘉大桥、杭州湾大桥之后，浙江对接上海的第三条跨江跨海大通道，可节约土地资源，做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区域，形成以港口为枢纽，公路、铁路、民航和内河航道一体化的陆上集疏运网络和江海联运的水上集疏运网络，促进浙江全面融入长三角，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四是有利于将舟山群岛新区打造为东部沿海和沿长江的港航物流核心圈。特别是“大小鱼山岛主要发展临港工业和大宗商品加工”，需要以东方大通道为支撑。建设环杭州湾东方大通道对于拉动浙江、上海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重要政策保障

《规划》提出，要赋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从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推进舟山群岛新区体制机制创新，营造有利于改革发展的良好体制政策环境。主要从扩大开放、用地用海、金融投资、财税支持、城乡统筹、管理体制创新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给予新区特殊的政策。

开放方面，提出要“研究简化口岸开放程序，探索扩大新区政府口岸管理事权。完善口岸管理机制，加强跨区域口岸合作，深入推进舟山群岛新区与内陆省份区域通关改革。探索建立适应舟山群岛新区特点的口岸监管模式，科学规划口岸查验机构的布局和设置，合理配置查验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电子口岸建

设,提升口岸监管、查验效能,提高通关效率。

用地用海方面,提出“对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行差别化管理,首期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80平方公里以内,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建设,确需增加建设用地规模的,依法定程序报国务院批准。国家、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及本规划确定的建设项目,经评估省域内确实不能平衡的,可以开展国家统筹补充耕地试点”。“开展凭海域使用权证书按程序办理项目基本建设手续的试点,根据舟山群岛新区开发实际,合理安排围填海年度计划指标,优先保障舟山群岛新区项目建设用海,对列入国家和省重点的建设项目,开辟用海审批绿色通道,简化用海用岛审批程序”。

财税方面,提出“探索通过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措施,支持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国家在港口建设费政策上给予倾斜,支持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和航运支持保障系统建设与维护。贯彻落实支持远洋渔业发展的有关税收政策,实行现行中资“方便旗”船税收优惠政策”。

环保政策方面,提出“支持舟山群岛新区加快发展,对单位GDP能耗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指标实行差别化政策,涉及国家重点布局的火电、石化行业重大项目的排污总量指标采取一事一议原则,支持在企业集团内统筹解决,其他重大项目排污总量指标,由省内统筹解决”。

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提出“赋予舟山群岛新区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管委会,探索建立与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发展相适应,与行政区划相协调的机构精简、职能综合、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程序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研究提出支持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具体措施,定期召开会议,帮助解决新区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新区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党和国家对新区发展寄予厚望,我相信在国家各相关部委的支持下,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前景必定无比灿烂辉煌。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55页)

4. 牛文元,2009,《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设计要点》,《战略与决策研究》第2期。
5. 高佩义,2004,《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6. 吴江、王斌、申丽娟,2009,《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3期。
7.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英奎

以开放促进蓝色经济区建设

刘德军

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海洋经济更以开放性为其重要特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是开放环境下和开放合作中的建设，必须把开发与开放相结合，以园区合作共建、国际平台打造、区域合作试验区建设、外资吸引、人才引进等开放模式与措施，引进来，走出去，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市场空间，促进区域发展。

关键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开放 国际合作 保障措施

作者简介：刘德军，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研究员。

“海洋是潜力巨大的资源宝库，也是支撑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海洋经济又称蓝色经济，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各类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海洋资源与空间之开发、利用、保护服务的相关产业的总和。它以海洋经济为主体，以海陆统筹发展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具有开放、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21世纪，海洋经济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与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11年1月4日，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获得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级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

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规划》实施以来，经过两年的努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呈现出投入力度大、增长速度快、质量效益好、发展后劲足的良好态势。

（一）区域总体实力显著增强

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生产总值达到21395.1亿元，同比增长11.7%，高于

全省增幅0.8个百分点，占全省的47.1%；地方财政收入1480亿元，增长25%，占全省的43%；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3090.3亿元，增长22.6%，占全省的50.5%。2012年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295.2亿元，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327.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4%、18.9%，比全省平均增幅分别高0.7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同时，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人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新的改善。

（二）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基本建立

海洋渔业、海洋化工、海洋油气、海洋盐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平稳较快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装备工程、海洋化工、海水养殖及水产品加工等产业规模居全国首位，海水利用、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海洋药物的种类和市场占有率列全国第一，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主导产业优势突出、新兴产业发展迅猛的海洋产业体系。

（三）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2011年，蓝色经济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800.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69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76.3%和61.8%。2012年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到账外资分别完成1718.2亿美元和74.1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77.6%和66.7%。积极推进口岸大通关建设和通关便利化，开通了中韩陆海联运汽车货物运输，对外开放环境明显优化。目前，区内拥有省级以上各类园区已达68家，其中国家级园区16家，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四）重大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烟台港西港区等3条疏港公路建成通车，日照港岚山港区、滨州港2×3万吨级码头、青岛港董家口港区30万吨矿石码头等一批港航项目相继建成投产，2012年前三季度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8亿吨，同比增长10.3%。东营机场完成4D级改造工程，青岛新机场、烟台潮水国际机场加快建设。华能威海、华电莱州2×100万千瓦机组、宁东-青岛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产，青岛500千瓦海洋能独立电力系统示范工程开工建设，国电蓬莱风电实现并网发电，海阳核电一期、烟台西港区至淄博重质液体化工原料输送管道、青岛—威海天然气管道工程一期、青岛LNG等重点工程加快建设。烟台—海阳、滨州—德州高速公路竣工通车，青荣城际铁路、滨海高等级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胶东调水108个单项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山东段干线工程年底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五）发展机制更加完善

编制完成了24个专项规划，印发了7市规划，形成了以国家规划为纲领、专项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研究制定了《蓝色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支撑计划实施办法》、《“两区”重大课题研究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出台了《“两

区”建设年度绩效评价考核暂行办法》。总规模300亿元的蓝色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获批设立，首期已落实认缴出资48.4亿元。威海国家海产品质检中心和日照“中国蓝色经济引智实验区”启动建设。“四区三园”顺利推进，烟台东部新区快速启动，青岛西海岸完成了行政体制一体化改革。

（六）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目前，区内海洋领域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达5家，居全国第1位。规划确定的18家国家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有15家取得较大进展。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威海国家海产品质检中心和日照“中国蓝色经济引智实验区”启动建设。青岛蓝色硅谷建设列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建成我国首个海洋科技自主创新示范区。潍坊滨海科教创新园区成为全国第一个在地级市开展的“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重点科研基地和国家学术交流合作项目，积极实施国家“千人计划”、省“万人计划”，引进了一批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

蓝色经济区建设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难点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海洋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海洋产业整体素质不高，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和提升。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和交通运输物流业仍居主导地位，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近70%；海洋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不够高，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海洋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整体规模偏小。二是，区域经济发展趋同现象较明显。区域发展缺乏鲜明的地方特色，沿海各市海洋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在船舶修造、风电等产业上表现尤为明显。沿海港口布局不够合理，功能定位趋同，整合难度大。三是，园区和企业的发展空间不足。部分省级以上园区在空间上已不能满足快速发展需要，一些大项目在园区内难以落户。企业发展受国家用地、用海政策制约严重，一些发展较快的县市区，建设用地指标尤其紧张，部分重点项目难以落地。四是，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不足。海洋科技资源缺乏有效整合，集成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形成。据测算，我省海洋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不足30%，对海洋产业发展的贡献不高。五是，政策落实还不够到位。部分重大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实，需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给予进一步支持，同时政策的协调性和整体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以开放促发展，加快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

开放性是现代海洋经济的重要特征，海洋经济的开发必然是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开发，必然是开放合作中的开发。因此，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必须是开发与开放相结

合,以开放促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蓝色经济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与转移的背景下,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可以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发挥比较优势,获得稀缺资源,开拓市场空间。2013年,蓝色经济区建设将进入加快推进、集中突破、形成优势、引领示范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加强海洋经济科技国际合作、加大招商选资力度,全面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努力推动蓝色经济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 推动中外合作海洋产业园区建设

总结青岛中德生态园、日照国际海洋城、潍坊滨海产业园等中外合作园区建设的经验与做法。建立多种合作交流机制,创新利用外资建设园区新模式,支持以多种形式合作新建一批海洋产业园区,构建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新平台。抓住国家支持蓝色经济区与日韩在海洋产业合作、投资贸易便利化、跨国交通物流、电子口岸互联互通等方面先行先试的大好机遇,积极借鉴横琴新区类自贸区政策,以建设海洋产业园区为切入点,按照突出重点、各个击破的原则,制定行动计划,加快推动与日韩在海洋经济技术合作、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 打造国际一流展会平台和大宗商品国际交易平台

整合资源,丰富内涵,扩大规模,同期举办中国国际海洋节和蓝色经济论坛,把“中国国际海洋节(青岛)”办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蓝色经济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继续办好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烟台)APEC电子商务博览会、(东营)国际石油石化装备及技术展览会、潍坊寿光蔬菜博览会、烟台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威海)国际渔具展览会,提高展会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建设橡胶、棉花、矿产、塑料、建材、油品等10大商品保税交易市场,构建国际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体系。

(三) 构建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先行试验区

借鉴北欧厄勒海峡地区跨境区域、日本福冈-韩国釜山跨区域经济合作区、珠澳跨境工业园区和广西与东盟跨境合作等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实验区经验,依托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等中心城市,建立与日韩城市合作新机制,探索跨海域边境经济合作模式。进一步加强与日韩的产业互动,大力承接日韩高端产业、现代服务业转移和高科技输出,积极承接日韩软件外包和流程外包业务。加强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建立“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实现中日韩三国产业链的深度对接,充分发挥日韩资金、技术优势和中国的劳动、市场优势,达到双赢。

（四）吸引外资助力蓝色经济区建设

外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包括技术和人才。要突出产业链招商、定向招商、专业招商，加快引进一批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海洋产业项目，推动蓝色经济区加快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借助海洋经济文化（技术）国际博览会、蓝色经济高峰论坛、广交会、西洽会等平台，加强区内园区的选出推介，搭建园区招商引资平台。深入研究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央企的投资动向，支持跨国公司、央企在蓝色经济区设立地区总部、生产基地、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等各类功能性机构。组织区内一批基础好、潜力大的产业园区到海洋经济发达、园区建设先进的国家展开招商引资活动，扩大影响，吸引战略投资者，积极引进国外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培植海洋优势产业等方面的高端技术和特色园区建设管理的先进经验，提升园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五）构建人才交流和引进机制，为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构建人才交流机制，鼓励人才走出去，为专业技术人才在次区域内的流动提供包括签证、居住等各方面的便利，加强次区域内的双边或多边形式的合作办学，加强培养适合次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实施积极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建立规范健全的人才引进机制，打通国内、国外专业人才引进的两条渠道，对专业人才予以物质激励，对人才合理流动实行宽松政策。依托区域优势和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先行试验区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吸引日韩专业人才到山东工作。形成统一、长效的人才引进服务体系，实行全方位“绿色通道”服务，简化外智引进手续，大力引进带资金、带项目、带技术的高层次、创业型海外留学人才，形成人才集聚效应。

三、以开放促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保障措施

广范围、大规模、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为蓝色经济区建设注入资金、技术、人才和活力，能够有效地提升和改善产业结构层次低的问题，有效地提升区内技术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带动科研成果转化，能够引进更多、更好的项目，并以此为契机，整合老园区，创建新园区，开拓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and 方向，合理化园区规划与布局，可谓益处良多。但保证对外开放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

（一）先行先试

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先行试验区是区域合作由松散向紧密过渡的一个良好开端，有助于摸索新型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首先，建立具有权威性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试验区理事会，成员来自相关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理事会下设立若干行业、专

业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下设若干项目推进组，对区域内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进行推动和监督。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借鉴国际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制定统一管理条例，成立经济合作仲裁中心，依法探索解决在试验区产生的各种商事争议。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发展相关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区域经济合作可以次区域经济合作试验区为范。

（二）支撑条件

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重要载体，强化重大项目对经济区对外开放的带动作用 and 纽带作用。以青岛港为核心，烟台港、威海港、日照港为骨干，整合资源，完善功能，吸引和培育航运物流市场主体，集国内外知名航运企业，开辟远洋国际航线，拓展航运物流业务，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物流枢纽。以中韩铁路轮渡项目，中韩陆海联运汽车货物运输项目，日本的集装箱班轮运输项目等为中日韩区域合作先行试验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三）调查研究

总结经济区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园区建设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抓好典型带动。针对经济区对外开放的重点、热点和难点，组织专门力量深入开展专题调研，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围绕产业升级，资金、技术和人才引进，合作机制等开展课题研究，形成一批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为经济区对外开放，参与区域合作与竞争提供科学指导。

（四）政策支持

加大财税、投融资、人才等方面对经济区对外开放的政策支持力度。财税方面，支持符合条件的领域和项目争取国家相关专项资金和税收优惠政策，如中央和山东省每年安排一定规模资金支持中日韩试验区建设。设立中日韩试验区建设财政专项资金，省财政资金进行配套，采取贴息、补助、奖励等形式，支持建设重点项目，优先给予政策支持。投资方面，下放投资审批权，除少数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重要敏感行业的准入仍由国家级管理机构、部门审批外，其他领域、部门及行业的审批权可逐渐下放省里。在中日韩试验区内，探索简化外资审批手续和部分领域投资享受内资待遇的做法和细节。在烟台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建设中适当放宽船舶等相关行业利用外资政策。金融方面，建立相对宽松的金融监管模式，改进外汇服务方式，加大对涉外主体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简化行政审核。允许青岛和烟台保税港区金融机构开展综合经营试点，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试点。积极引进全国性证券公司，鼓励境外银行、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境内关外”的期货交易市场，发展大

宗商品的仓储物流。加强山东与国外金融管理部门、反洗钱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领域的政策协调与资讯沟通。加强跨境外汇和人民币资金流动监测。

（五）政策落实

按照国务院关于蓝色经济区规划的批复精神和国家发改委要求，推动重大政策事项的贯彻落实。按照蓝色经济区《试点方案》要求，进一步抓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争取在机制创新、实践成果、理论研究上取得重点突破，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提供示范。按照省政府印发的《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框架协议》，加快推进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积极开展中韩陆海联运汽车货物运输。加快推进董家口、丁字湾、龙口湾、潍坊滨海等集中集约用海片区建设。推进长岛休闲度假岛和荣成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一批旅游项目。争取基本建成青岛海洋设备检测中心、烟台海洋产权交易中心、威海海洋商品国际交易中心等7个公共服务平台。同时，要加强考核和督促检查，积极配合政策落实。

责任编辑：李文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2年度优秀研究成果奖评选结果揭晓

2013年3月27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评审产生了9项国经中心2012年度优秀研究成果奖。其中，一等奖2项，分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我国重要战略性资源海外获取战略研究》；二等奖4项，分别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研究》、《小企业发展政策国际比较》、《资产价格波动预警研究》和《关于增加商业银行外汇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建议》；三等奖3项，分别是《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系列研究》、《2011年度亚洲竞争力研究》、《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制度创新——基于政府行为的视角》。（李蕊）

· 理论前沿 ·

创新城市发展方式 推进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

陈文玲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成就斐然，但其发展方式总体上仍是粗放的、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难以适应我国持续健康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新要求，也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方式直接影响到城市发展质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因此，应当将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创新城市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

关键词：城市化 城市发展方式 创新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载体，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未来人类发展的两件大事。我国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美国、日本分别用200年、100年、50年走完的城市化历程，创造了城市化的世界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979年不到19%，提高到2011年底的51.27%，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宏伟的城市化篇章。

一、我国城市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化中后期，城市化作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更广泛、深远的影响力。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仍未摆脱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土地高扩张为特征的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方式结果是不断做大城市规模、拉大城市框架，土地铺张浪费，城市功能不

全，大城市病久治不愈。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对资源能源粗放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对城市发展的硬约束越来越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土地高扩张、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使得城市资源能源紧缺状况日趋明显，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健康发展的“硬伤”。目前，我国城市的快速扩张和空间的无序开发，导致城市土地资源消耗过快，闲置、低效率利用等浪费现象严重。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高达133m²，远超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明显，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20多座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10座严重缺水。城市能源消耗急剧上升，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到2015年我国城市能耗占全国能耗总量的比重将达到79%，到2030年将提高到83%。更令人担忧的是，城市环境的持续恶化，尤其是城市空气、水质堪忧。全国有2/3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全球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在中国。城市水质监测点中为较差级和极较差级的占57.2%。另外，城市固体废物排放量剧增，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较低，造成严重二次污染，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危险废物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对城市及其周边环境造成危害。这些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往往存在不可逆性，危及人类健康、危害生态系统和生命资源，长此以往，人们的生命将受到威胁，城市发展将无以为继。

（二）城市规模急速膨胀，城市病日益明显化、固态化和复杂化，形成阻碍城市发展的城市化痼疾

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城市病日趋明显，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引起的城市化症候。在“机动化快于城市化”的背景下，困扰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仍将继续恶化。据统计，我国城市上班族平均通勤时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1.7%，比加拿大和美国高出近一倍。全国有将近2/3的城市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其中部分大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堵城”，平均通勤（往返）时间超过1小时。同时，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增大，供给严重不足，尤其是住房、教育、医疗普遍存在价格较高、区域分布不均、总体覆盖有限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更是不容乐观，2011年卫生部的调查显示，我国10城市上班族亚健康状态占比达48%，其中北京高达75.3%，城市人群的疾病体质令人堪忧。另外，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公共设施安全事故频发，如2012年在各大城市发生的电梯设备故障，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故，城市居民的安全居住、安全饮食、安全出行等均面临挑战。在这一系列的城市化“病症”中，不仅有西方

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类似“症状”，也有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特有问题，进一步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三）城市建设方式粗放，城市整体形态、建筑质量和组成结构等城市“骨架”问题堪忧

城市的外观形态由城市整体规划、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等要素组成，是城市发展的有形载体，更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无形资产的积淀。目前，我国粗放的城市建设方式，为城市发展百年大计埋下严重隐患。

一是重速度、轻质量。作为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多的国家，我国每年新建面积高达20亿 m^2 ，但城市建筑（住宅）普遍存在使用寿命短、使用能耗高、改造难度大等问题。城市建筑平均使用寿命仅为25-30年，而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城市建筑的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80年、85年、125年。城市的大拆大建，导致资源能源消耗和建筑垃圾大量增加，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已经占到城市垃圾的30%-40%。城市建筑仍以传统建筑为主，绿色建筑、低碳建筑、生态建筑等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具备普及的条件。高耗能传统建筑所产生的碳排放，占到碳排放总量的30%—40%，成为城市发展转型的重大障碍。

二是重外在、轻内在。我国城市上市销售的住房大部分都是毛坯房，土建装修一体化的建筑比例不到10%，二次装修产生建筑垃圾、噪音，劣质建材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随意更改房屋结构和管线造成新的安全隐患。

三是重地上、轻地下。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地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地下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许多城市地下管道丛生、杂乱无章，制约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中，地下管网建设是最重要基础建设，代表了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伦敦、巴黎等世界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如同一个地下城市，人、车畅行，有的甚至成为城市的旅游景点；曾饱受城市内涝之苦的日本东京，借鉴西方先进的城市治理理念，建立了被称为“地下神殿”的巨型的地下分洪工程。而我国城市地下设施建设质量低劣，地下管网敷设缺乏系统规划和管理，排水、电力、热力和电信管道互相交错，如同城市“毛细血管”的地下管网，难以负荷城市建设的提速，导致城市建设周期缩短，城市内涝、建筑和道路坍塌等城市安全问题频发，城市经营成本增加。

四是重单体、轻整体。没有一座城市的外观形态从整体看是和谐的、美观的，既没有体现每个城市整体形象的城市天际线，也缺乏动静相间、城乡相间和建筑群落相间的整体美。从城市规划来看，我国缺少整体协调的建筑群体设计和建设，一些历史建筑被现代建筑遮挡，自然风景被人造景观掩盖，城市公共建筑参差不齐，城市建筑风格缺乏历史文化含量和连贯性。

（四）单体城市一般功能和城市群组合功能缺失，尚未形成以满足人对现代城市多种需求为本的生活载体，容易引发城市危机

目前，我国城市功能存在系统性缺失，造成城市功能结构失调，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城市危机。一方面，单体城市的一般功能不完善。受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城市发展多以经济功能作为城市的主导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城市的服务、管理、协调、集散、创新等其他功能。城市功能供给和需求不匹配，集中体现在：城市载体功能不完善，在自然灾害面前，本该成为人们“避风港”的城市显得不堪一击，一场大雨、一场薄雪就可使一座城市陷入瘫痪。2008年南方冰雪天气，造成铁路运输大面积停摆，南方多座城市电力系统瘫痪。2012年夏季大雨，造成北京等大城市交通大瘫痪。城市的交通疏散功能、物流集散功能，以及城市应急能力亟需提升。城市的社会功能也不健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诉求逐渐多元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难以应对和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同时，城市的经济功能有待优化，城市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城市间低水平同质竞争突出，城市创新能力缺乏。另一方面，以目前发展城市群为基础的城市组合功能缺失。目前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还处于逐渐成熟期，城市群的层级结构还不合理，缺乏以城市群内各层级城市职能区分以及以城市间产业集群、产业链连接的城市组合功能，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雷同，单体城市功能追求大而全，城市群功能结构缺乏区别性、层次性，难以发挥城市群组合功能的合力。

（五）未来城市群发展尚不成熟，还未形成网络化、共享化和错落有致的区域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

城市群是未来我国城镇化布局 and 区域发展的主体空间形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目前，我国城市群发展迅速，但仍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从城市群内部结构来看，我国城市群大都是单极结构，在经济规模、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中心城市“一城独大”的现象，缺乏与之比肩的中心城市或次一级中心城市。而且在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中心城市主导和带动作用较弱的问题，部分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滞后，经济实力不足，难以发挥对城市群以至整个区域的主导和带动作用。另外，多数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构不合理，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和较大乡镇之间未能形成网络型的分工与合作关系，部分城市之间仍停留在自然、地缘的连接层面，未形成互动均衡的城市群落化发展格局。从城市群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受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制约，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区域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出现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带，不同规模的城市群之间联系密切，正在形成我国沿海地区巨大的城市密集带。而中西部地区则仍处于城市群形成和逐

渐成熟期，城市群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大城市群之间缺乏连接和过渡，城市群中间空白地带的城市定位模糊、资源受限，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近年来，国家区域战略对均衡我国区域城市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城市群发展的东、西部区域整体差异将长期存在。

（六）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城市对农村反哺能力、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亟待提升

城乡之间的发展落差一直是我国城镇化的痼疾，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仍存在制度性障碍，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能力、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不足。从世界城市化的规律来看，城市化的最终形态不是百分之百的城市，而是城乡空间的合理布局、城乡形态的融合发展，更是城乡文明的共存共荣。目前，由于缺乏城乡一体化规划设计，我国城乡发展形态割裂，城是城、乡是乡。虽然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大大改观了农村的风貌和生产生活状况，但长期重城市规划、轻乡村规划，使城市和农村从空间布局和外观形态上基本割裂开来，城乡界限明显，城市中心区、近郊与乡村之间缺乏过渡和融合地带，城市文明和田园风光各处一隅。这种割裂状态更体现在城乡产业布局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城市和农村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难以实现一体化，导致了城乡产业发展的脱节，城市发展工业、农村发展农业的单向产业发展格局仍未打破。同时，基于城市扩张需要而对农村土地和自然资源进行单向入侵，使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加之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缺乏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供给，农村人口未能真正纳入到城市发展体系和共享体系中，农民面临失地又失业的风险，使得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发展矛盾愈加明显。

二、我国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方向

推进城市化持续发展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根本路径。新形势下必须以新的视角审视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转变粗放的城市发展方式，明确我国新型城市化发展方向，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科学、协调、可持续。

（一）城市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强调城市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

从城镇化的整体趋势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时代，城市发展也将进入到由量到质的转变阶段。在这个阶段，衡量城镇化进程的数量指标、速度指标和经济指标，应让位于突出城市发展质量的考核性指标和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从城市的发展质量来看，必须更加注重城市的建设质量（包括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城市建筑质量和风格）、管理质量（包括覆盖城乡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城市应急管理

理)、经济发展质量(包括产业结构的轻型化、集群化、高端化、生态化)等。从城市可持续发展来看,必须更加注重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提高,强调城市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深度融合。城市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人口、资源、技术、产业等文明要素的空间集聚,更体现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文明传承方式的整体性转换。

(二) 城市发展必须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 强调城市发展的集约和高效

外延式的城市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做大城市规模、拉大城市框架,以获得规模经济利益,强调的是城市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和空间的拓展。而内涵式的发展则意味着城市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升,强调城市发展的集约和高效,注重城市功能、城市承载力、城市创新能力、城市文化品质等城市内部价值的提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率先以集约高效的城市发展理念为指导,在城市建设中充分发挥城市土地的经济产出功能、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承载历史文化功能。同时,在全国开始了以“低碳城市”、“创新城市”、“田园城市”、“智慧城市”等以国内外先进理念指导的城市建设发展实践。

(三) 城市发展由功能型城市向特色型城市转变, 强调城市个性化和生命力

城市的特色是一座城市最具稀缺性和不可复制的财富,是一座城市永恒的生命力。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我国陷入到城市“特色危机”:空间形态“千城一面”,经济形态趋同,文化形态被割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曾几何时,一首诗、一句词、一湾水就能唤起对一座城的记忆,如今似乎已逐渐消失。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反思,城市的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个性发展、传承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题。除了传统的以城市历史文化为名、以自然资源条件和地理风貌为名的特色城市,更出现了以城市特色产业为名、以城市特殊功能为名的国际会展城市、国际贸易城市、国际旅游城市和国际港口城市等。部分城市的特色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如西安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大学城市;苏州极具江南古韵的古城风貌,与现代化的苏州工业园相得益彰。这些城市特点的多重性为其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城市整体竞争力增添了砝码。

(四) 城市发展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 强调城市功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世界经济竞争的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中心城市及其所在的城市群成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单位,更进一步催生了一批国际性城市 and 世界城市群。目前,我国有些城市由于所处的枢纽位置和新信息节点等因素,正在由内向型——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成外向型——国际性或世界性城市。这些城市将逐步构建起国际化的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城市资源供应、产业链延伸、产品

销售、人才流动和共享，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的战略节点，真正实现城市功能趋向由本土化向国际化转变。目前，北京、上海等具有发展基础和优势的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在完善国家中心城市体系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国际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全国180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虽然其中大部分城市离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城市功能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

（五）城市发展由单体向网络型发展转变，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内部组团发展和城市群协同发展

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主要的世界级都市圈、城市群，如伦敦、巴黎、东京都市圈等，都经历了由单中心扩张，向多中心、网络化发展的模式转变。构建网络化、群落化的城市发展模式，有利于解决我国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空间和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更有利于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城市内部组团发展，集约高效利用土地，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防止城市的无序、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形成以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和较大乡镇组成的城市群落发展模式，强调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合理的层级结构，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合作紧密的城市间网络关系，有利于推动城乡统筹、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我国城市群发展迅速，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也在形成和发展中。这些城市群从最初以自然、地缘、人文相接相似为前提的成片发展，到以有价值的生产要素共享和基于产业链分工的群体协作分工，更出现了以产业集群、市场集群和政策优势等资源共享带动区域发展的城市群。随着我国城镇化的继续推进，我国的城市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区域发展格局将日趋成熟。

三、把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作为国家重大战略

城市发展方式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因此，在坚定不移推动城市化的同时，应重新思考和总结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把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独特的城市发展道路。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创新我国城市发展方式。

（一）创新城市发展理念

城市发展理念是指导城市发展的共识。创新城市发展理念，应借鉴国际先进发展

理念，以面向未来的城市发展理念，向提升城市的质量、完善城市的功能、提高城市服务水平、增强城市的承载能力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转变；以城乡共赢的城市化理念，统筹城乡规划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以人文城市理念，突出历史文化遗产、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增加城市的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品质和品牌；以生态城市理念，探索城市的绿色发展方式，在城市建设、生产、生活中融入生态循环的先进理念，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资源节约和质量效率，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智慧城市理念，注重创新驱动和知识经济，建立以科教人才为支撑、智慧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以立体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城市形态集聚和功能密集区，以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实现对土地和能源的集约利用；以特色城市理念，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方式，以特色文化、特色经济、特色生态、特色建筑打造城市独特的空间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

（二）创新城市发展形态

城市形态是城市单体和城市群发展的“骨架”，是城市之间各要素高效合理布局的基础，更是城市自然特质和人文历史的有形载体。创新城市发展形态，应在保证城市空间结构紧凑、景观特色协调多样、就业与居住适度均衡的基础上，注重城市形态的差异性、传承性、艺术性和多重性。一方面，应注重城市外观形态和风格的创新，改变过去长期同心圆式的环线交通路网和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方式，以现代建筑群勾勒城市天际线，镶嵌于田园风光和自然山水之中，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新型城市形态，引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理念、方式和艺术，打造城市独具魅力的空间外观形态，为城市的特色发展百年大计积累宝贵财富。另一方面，加强城市组成结构的创新。在城市内部组团布局、大开大合，设计多中心的都市空间形态，构建“紧凑型城市”。在外部，构建以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和较大乡镇组成城市群落，基于城市间基础设施、市场要素、信息平台、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无形连接和有形连接，构成有机的城市关联体和共享体系，实现大中小城市与现代乡村之间的互动关联，形成城乡交错、大中小城市相间、疏密合理得当现代城市群发展布局。

（三）创新城市组合功能

以城市群落发展的空间形态为基础，强调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和较大乡镇的功能区分和合作，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乡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多层次、多方面、动态的需求出发，构建以生产性、生活性和创新性服务功能为核心的城市功能体系，再造城市群落的组合功能。重点是加强中心城市综合功能，强化中小城市的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以及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以现代化的标准全面提升

和完善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适宜现代人居、融合先进文化、集聚新型经济、包容开放合作的高端平台功能，全面提高城市的经济层次、产业能级、社会文明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增强和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能力、集聚辐射效应、综合服务功能。重点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保障城乡居民充分就业、便利就医、就近入学，实现城市有序、高效、低耗运转。

（四）创新城市产业形态

城市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更是城市之间要素集聚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创新城市产业形态，需要对产业布局、产业形态和产业驱动力进行全面创新。从产业布局来看，注重城市群内产业布局的层次性以及和城市功能相匹配，在整合各城市优质存量资源基础上，城市之间的产业布局应突出特点，错位发展，发挥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粘合作用，在城市群内形成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支撑，乡镇保障的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从产业形态来看，强调产业形态向高端攀升，着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在有条件的城市发展城市产业综合体，实现产业优势的最大化。采取集群式、耦合式跨产业循环经济链条的方法，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农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型、科技型、创造型、生态型的产业集群，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从产业驱动力来看，从依靠人口、土地、资源等的“要素驱动”，向依靠知识、信息等的“创新驱动”转变。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强调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创建高技术为先导的产业发展新机制、新方式，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化、集成式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创造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物流、金融产业成长壮大的新途径、新业态，加快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进程。

（五）创新城市要素集成方式

城市发展理念、功能、产业形态等方面的创新，对城市要素的集成方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人文城市、智慧城市等城市新的发展理念，更强调城市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等非传统要素对城市的内生驱动作用，要求创新城市要素组合和集成方式，形成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的内在合力。创新城市要素集成的有形平台，着力构建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等要素集聚有形载体，增强中心城市尤其是国际性城市对全球先进要素的集成、集聚功能。并以城市产业形态和城市组合功能创新为载体，发挥其对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等要素的综合性组合集聚功能，以多元要素聚集来丰富城市产业和城市功能的创新内涵。同时，创新城市要素集成的新机制，着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国际教育合作机制、城市文化保护机制等。

（六）创新城市管理模式

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城市管理的复杂性，针对新形势下我国快速城镇化引发的城市化症候，尤其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市管理难题，应强调以社会建设统领城市建设的理念，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从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创新入手，创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管理和服 务新模式，构建城乡居民公平、公正、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新机制，全面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城市管理格局。包括：创新基层组织治理模式，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构建保障农村人口稳定有序转移的制度基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制度，特别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推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强化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

（七）创新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方式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可以说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或多或少都保留着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有许多遗存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古城。这决定了我国城市发展必须处理好城市发展、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把历史文化保护放在优先地位，使历史文化遗迹财富实现保值增值，获得长久和永续利用。在历史文化保护中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创新的关系，使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相融合。以历史古城的保护为例，应尽量保留古城的整体格局和轮廓，尤其是重点保护能体现古城风貌的代表性建筑群、城市轴线、古树名木等。创新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方式，要在保护中开发、以开发促传承，探索城市历史文化和新兴文化产业融合发展道路，在开发中挖掘、整合城市历史文化潜在价值，梳理贯通城市文化脉络，形成历史与现代融合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新路。

我国继续推进城市化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将来的城市发展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城市不仅是现代化优质要素和资源集聚的载体，更应该是宜居城市和满足人们更多物质文化需求的空间，更多的城市群和城市群落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更是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集成体和综合体。

参考文献：

1. 牛凤瑞，2009，《中国城市发展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樊纲、武良成，2010，《城市化：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着眼于城市化的质量》，中国经济出版社。
3. 张鸿雁、李强，2010，《中国城市评论》，南京大学出版社。（下转第38页）

· 世界经济 ·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评析与启示*

何德旭 史晓琳

摘要：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对本国金融体系在危机后的恢复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在介绍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全面地总结了其经验，评价了其运行绩效，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时值我国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际，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相关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 综合存款保险体系 KDIC 金融安全网

作者简介：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史晓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经济学博士。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迅速蔓延及其对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巨大冲击，再一次证实金融安全网特别是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防范一个国家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还是防范国际金融危机传染、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作为新兴经济体，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中的应对策略及其较好的效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存款保险制度。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其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建立后不久即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制度在危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也增强了国际社会对韩国经济恢复的信心。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非常有必要深入研究并借鉴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做法和经验。

*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批准号：12AJY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韩国存款保险制度概况

1995年以前，韩国政府一直为存款人提供隐性担保。随后，与其他经济体一样，韩国政府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业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更加自主和自由，因而面临的风险也更大。1995年12月29日，韩国通过《存款人保护法》，并于1996年6月1日成立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正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1998年，韩国存款保险体系涵盖了所有的金融部门，建成了综合存款保险体系（Integrated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s）。如今，KDIC为银行、金融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寿险和非寿险）、商人银行^①、互助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安全保障。

（一）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基本情况

1. 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组织架构。韩国的金融安全网由战略财政部（MOSF）^②、金融监管委员会（FSC）、金融监管服务部（FSS）、韩国银行（BOK）构成。在此金融安全网体系下，KDIC结合存款保险业务的特征，按照现代公司组织模式建立其组织架构。KDIC接受MOSF的监管与指导。存款保险委员会是KDIC的最高决策机构，由KDIC主席、FSC副主席、MOSF副部长、BOK副总裁和其他三个成员（由知名的专家学者担任）组成，只考虑关键的、全局性的问题，并作出决策。审计官是KDIC的独立官员，下设审计办公室。董事会是KDIC的最高执行部门，由1个主席、1个执行副主席和4个高级董事总经理组成。董事会主席下设主席办公室、公共关系办公室和破产调查司。破产调查司由调查支持部和调查局组成。执行副主席直接管理高级董事经理。17个具体职能部门构成执行系统。

2. 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权力保障。韩国政府赋予KDIC广泛的权力，包括风险评估、高风险（陷入清偿危机）金融机构联合检查、现场检查、调查破产金融机构和破产处置等，以最小化其可能的损失（Walker，2008）。

为保障KDIC各项权力的顺利执行，韩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一是《存款人保护法》。目的在于通过有效运行存款保险体系，阻止破产金融机构无法偿还其存款人情况的发生，以此来保护存款人，并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该法使KDIC能够强制执行其决策。二是《存款人保护法执行令》。针对存款保险公司的组成、运行中所涉及各个细节问题进行详细规定，使KDIC的运作有章可循，极大地保证了其权力的实施。三是《公

① 与普通商业银行的金融交易业务（活期存款和短期商业贷款）不同，商人银行主要从事银行承兑汇票、股票或债券的发行承销等业务。

② 2008年，韩国财政经济部（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y，MOFE）和计划预算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Budget，MPB）合并为战略财政部。

共基金监督特别法》。旨在提高公共基金增值和管理中的客观、公正和透明。该法的实施保障了存款保险公司在社会上的公信力。四是《公共基金监督特别法执行令》。旨在保障《公共基金监督特别法》的有效执行。

（二）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模式

与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韩国存款保险制度遵循最小成本原则、损失分担原则、自助原则和透明度/客观性原则，并在这四大原则的指导下，完成其存款保险制度的各项程序。

1. 存款保险基金来源。韩国政府为存款保险制度提供100亿韩元的初始基金，并由此设立存款保险基金（DIF）。DIF由银行账户、金融投资公司账户、保险公司（寿险和非寿险）账户、商人银行账户、互助储蓄银行和韩国联邦储蓄银行账户等构成。根据2002年公布的《公共基金偿还办法》，这支基金经批准转化为存款保险基金债券偿付基金。

《公共基金偿还办法》同时还批准设立了（新）存款保险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是投保金融机构缴纳的保费^①。这两支基金共同构成KDIC公共基金。

2. 担保额度和范围。KDIC推行限额存款保险制度，为每位存款人5000万韩元以下的存款提供担保。当前，KDIC担保的机构类型和数量如表1所示，担保的产品有银行存款、客户证券交易保证金和个人保险单等，但不为信用违约互换、回购协议、商业票据和政府存款提供担保。

表1 KDIC担保的金融机构类型和数量

金融机构		机构数量（家）
银行	本国	17
	外国	39
金融投资公司		115
保险公司	寿险	24
	非寿险	22
商人银行		1
互助储蓄银行		102
总数		320

资料来源：KDIC，“2012/08 - Statistical Data”。

3. 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方式与步骤。当KDIC认为有必要判断一家破产或面临破产威胁的金融机构的状况时，可以要求在保金融机构及其上级金融控股公司递交经营情况

① 存款保险投保金融机构按统一费率缴纳保险费，但是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保费费率不同，如银行业为0.1%，互助储蓄业为0.3%（Walker，2008）。如今，韩国正在酝酿实施风险调整型保费费率。

和相关资产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后，如果KDIC发现一家在保金融机构濒临破产，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包括对其经营情况和资产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经过调查，如果KDIC发现存在可能导致风险事件的因素，可以要求FSC对相关机构采取措施。如果一家金融机构的财务结构不符合要求，KDIC或FSC可以宣布这家金融机构破产（破产程序如图1）。一家在保金融机构破产后，KDIC对那些合规的存款人进行优先偿付，并对这家破产机构进行处置。KDIC与破产金融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监视其履约情况，对那些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的人员进行全面调查，强化对公共基金的管理，以此帮助市场恢复健康运行。为了最小化其处置成本，KDIC支持其他机构对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并购，既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又使其成本达到最小。KDIC会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资质审查，然后选择那些运行良好的在保金融机构进行并购交易。KDIC可以安排第三方来并购破产或即将破产的机构，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并购其上级金融控股公司。参与并购的机构或其上级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其净资本的缺额向KDIC申请资金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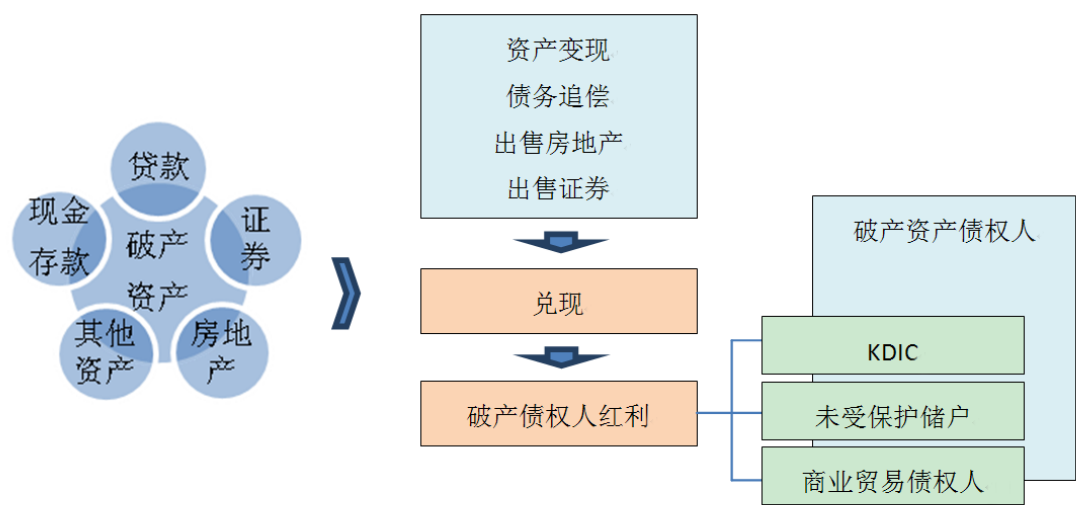


图1 韩国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资料来源：根据KDIC网站资料绘制。

4. 与国内外金融安全网的合作。韩国存款保险体系十分重视与国内外其他金融安全网要素的协作，并建立了常态协作机制。KDIC与金融监管部门（FSC和FSS）、韩国银行签署了联合检查和共享信息的谅解备忘录，这对于平稳的金融监管和信息交流是至关重要的；KDIC在必要时可以要求在保金融机构和FSS提供数据；KDIC也可以要求FSS检查特殊的金融机构，并告知KDIC检查结果，或者要求FSS进行联合检查；各个机构高级别官员相互参加高级别的决策会议。这些与国内金融安全网的有效协作增强了韩国金融体系自

我稳定的能力。

在与国外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方面，KDIC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KDIC是国际存款保险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 IADI）的创始成员，主办了2003年IADI的年会。KDIC还参与了国际存款保险规则的制定，作为国际工作组成员参与创建了《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2004年，韩国财政经济部（MOFE）发起知识共享计划（KSP），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提供韩国政策制定经验以及针对目标国家和地区的特定研究成果和建议。作为KSP计划的延续，KDIC在2010年发起了全球KDIC计划（Global KDIC Program）。KDIC对国际存款保险事务的积极参与，极大地提高了韩国在国际存款保险体系的影响力。

（三）韩国存款保险制度与其他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比较

截至2011年3月31日，国际社会共有11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①。其中有代表性国家^②的运行模式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与这些国家相比韩国存款保险制度所具备的一些主要特征。

表2 主要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特征之比较

特征	美国	德国	韩国
是否显性制度	是	是	是
担保银行范围	属地原则	属地兼属人原则	属地原则
担保限额	25万美元	破产银行资产的30%	5000万韩元
是否担保外国存款	是	是	是
是否担保政府存款	否	否	否
是否担保银行间存款	是	否	否
是否有基金	有	有，但额外基金可随时收回	有
基金来源	初始基金和保险费	银行	初始基金和保险费
管理方式	公共管理	私人管理	公共管理
会员资格	强制性	自愿	强制性
是否风险调整型保费	是	是	拟

注：属地原则指担保范围为本国境内的所有合规金融机构，属地兼属人原则指担保范围不仅包

① 资料来源：国际存款保险协会网站<http://www.iadi.org/di.aspx?id=67>。

② 美国和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比较有代表性，美国最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德国有着独特的运行机制。因此，本文选取这两个国家与韩国进行比较。

括本国境内合规金融机构，还包括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美国 and 韩国都对其初始担保限额进行了多次调整，表中数据为最新；美国存款保险基金的初始基金来自财政部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韩国存款保险基金的初始基金来自中央政府。

资料来源：根据Beck（2002）、FDIC网站和KDIC网站资料整理。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主要具备如下特征：（1）独特的创建时机。不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存款保险制度具有怎样的特点，除了加拿大外，均在银行业危机的背景下建立。韩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在改革过程中、在参与破产金融机构处置过程中建立的。相对于在危机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来说，此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成本要小得多（Choi，2000）。

（2）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相似度较高。除了具体的担保限额以及个别不受担保的金融产品不同以外，韩国存款保险制度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而两国与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则在许多方面不同。（3）综合性的存款保险体系。韩国存款保险涵盖了所有金融机构，而不仅仅为存款类金融机构提供担保。这使其存款保险制度具备了更为广泛的功能，从而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4）国际存款保险体系的积极践行者。虽然建立的时间不长，但是作为IADI的创建国之一，韩国不仅促成了IADI的建立，还积极参与IADI以及国际存款保险体系的各项活动。（5）组织结构调整幅度较大。KDIC的组织结构较2011年有了较大变化，执行部门从原来的13个部门调整发展为现在的17个部门。

二、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经验与评价

（一）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经验

自1996年成立以来，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了从起步、改进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总结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经验，有助于我国得到更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有益启示。

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日常运行的经验。（1）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存款保险制度模式，发挥后发优势。韩国存款保险制度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极大的相似性表明，韩国在建立和运行存款保险制度时，借鉴了美国的经验。而美国是最早建立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其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的锤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韩国经过借鉴与模仿，其存款保险制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运行效果。（2）实施完备的监督管理措施，保障存款保险制度顺利运行。KDIC的监管措施包括：参照科学的国际信贷分类标准和备抵标准来评估丧失清偿能力的资本；实行严格的资本充足要求；建立会计等相关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金融机构每年进行两次信息披露，同时加强对虚假披露行为的惩罚力度等。（3）赋予KDIC广泛的权力，保证处置成本的最小化。韩国存款保险

制度运行过程中，KDIC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这些权力能保证其收缴到足够的基金，保证其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判断一家金融机构经营健康状况的信息，保证其在处理问题金融机构时的权威，保证其公信力，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持韩国金融体系的市场约束力，降低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4）积极参与IADI的活动，保持本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性。KDIC不仅积极参与创建《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还在实践中积极践行这一原则，其设置及运行模式与这一原则基本保持一致。KDIC积极组织 and 参与存款保险方面的研究，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理论研究成果。（5）优化存款保险委员会人员构成，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韩国存款保险体系的最高决策机构——存款保险委员会中不仅包括各金融安全网机构的负责人，还包括知名的专家学者。这种人员构成使韩国金融安全网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增强了金融安全网的协作力，又使其保持先进的理论指导，从而增强了其决策的科学性。

2.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应对危机的经验。除了日常运作以外，解决危机产生的问题是存款保险体系的一项重要职能。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不久，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存款保险体系在危机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韩国经济迅速从危机中走了出来，并步入快速上升通道。（1）灵活调整担保政策。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实行限额担保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调整了这一政策，采用临时性全面担保策略，并且扩大了KDIC的保险范围，维护了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经济的信心，及时遏制了危机的蔓延，促进了经济的好转。2001年，当金融体系恢复稳定、广泛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实施时，韩国即恢复了限额担保，这有利于降低道德风险，增强韩国金融体系自我稳定机能。特别是，在危机期间，韩国存款保险还会调整存款支付时间，以应对出现的不利局面。2011年2月17日，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韩国金融委员会关闭了6家储蓄银行，由此引发“挤兑”风潮。为了应对这一局面，FSC提前一周部分偿还了资格达标的停业储蓄银行储户的存款，遏制了“挤兑”风潮的蔓延。（2）扩大公共基金使用的目标范围。在韩国，公共基金除了用来偿付合格存款外，还被用来向能够存活的金融机构注资，提高其流动性，处置其不良贷款，帮助其恢复正常运转，重振市场的信心。2003年1月1日，用于韩国金融部门重构的存款保险基金分为两支基金：存款保险基金赎回基金和新存款保险基金。赎回基金用于完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金融重构，也用于恢复第一轮和第二轮金融重构时注入的公共基金。截至2012年8月底，用于金融援助的公共基金共计227122亿韩元^①。公共基金不仅恢复了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还为金融重构提供了支持，同时进行了自我修复。（3）先救

^① 资料来源：KDIC，“2012/08 - Statistical Data”。

助再处置。对于陷于偿付危机的金融机构，KDIC会首先根据四大原则对其实施救助，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存款偿付和金融援助。其中金融援助包括贷款延期和公积金缴存（fund deposit），购买资产和管理负债，进行股权投资和捐款等方式。对于无法实施救助或者救助成本过高时，KDIC会以最小成本处置破产的金融机构，所采用的方法是偿付存款、购买资产、管理负债、建立桥银行（bridge bank）^①等，力图有序、及时地完成处置过程。（4）积极恢复公共基金。为了有效恢复注入陷于清偿危机的金融机构的公共基金，KDIC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将其职能扩展到管理破产资产领域，委派其员工作为破产机构的管理者或委托人，代表陷于清偿危机的金融机构实行责任诉讼、要求赔偿，将KDIC的调查范围从陷于清偿危机的金融机构扩大到相关的违约企业等。

（二）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简要评价

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绩效。Hosono、Iwaki和Tsuru（2005）研究发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的存款人对银行风险所做出的反应没有增加，存款人的风险敏感性降低了，存款保险体系的建立确保了其在稳定的政治条件下的可信度。Hosono（2005）检验了韩国市场约束的有效性，发现存款人在危机发生中和发生后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反应比危机发生前低，在其现有的存款保险制度下，市场约束是有效的。Angkinand和Wihlborg（2010）研究发现韩国提供了接近风险最小化的存款保险担保范围。在KDIC的一系列努力下，韩国金融机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发生严重的银行破产事件，存款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各类金融指标均出现好转，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复苏。KDIC的介入，及时遏制了2011年2月的“挤兑”潮，使韩国平稳渡过了由于房地产持续低迷造成的金融风险期。

2.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1）缺乏独创性和本地化特征。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在建立时，主要参考了美国存款保险模式，从而获得了创建制度的后发优势，缩短了建立和发展所需要的时间期限。但是，这样做的弊端是缺乏独创性，本地化特征不明显。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制度环境不一致，这种差异必然造成他们的有效存款保险制度的不一致。每一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存款保险体系的设计要适合本国和本地区的特殊情况。韩国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缺乏独创性和本地化特征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否是最优的、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如何等都还有待观察。（2）监管职能执行不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保证各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KDIC投入了大量的公共基金。为了减少公共基金损失，KDIC对各金融机构犯有过失的责任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以期收回部分或全部公共基金。但是，截至2006年6月，KDIC追回损失1268

① 一般指在存款保险体系下，当一家银行破产后，存款保险公司成立的负责管理破产银行存款和负债的临时性银行。

亿韩元，仅相当于全部损失金额（16.52万亿韩元）的0.8%^①。目前，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实际上，如前文所述，KDIC对于追偿公共基金有一套措施，之所以仍然出现无法追偿的情况，是其运行过程中监管职能执行不力、监管水平不足的结果。这与KDIC所推崇的综合存款保险体系不无关系。韩国存款保险体系将几乎所有金融机构覆盖在内，将存款保险概念泛化，试图建造一个广泛的金融安全保障体系。暂且不论这种保障体系与中央银行职能冲突产生的障碍，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管也考验着存款保险公司的能力，对其监管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三、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Walker（2008）认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存款保险体系在目标、设计特征等方面是相似的。韩国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与我国的情况相似，与我国同属于亚洲国家，并且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为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韩国政府所选择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是在其金融改革过程中。这一时机的选择使其存款保险制度在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第一道防火墙的作用，及时保护了存款人利益，维护了金融系统稳定。我国正处于金融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前几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各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暴露出来，因而成为推进金融改革的最佳时机。我国应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及时引入存款保险制度，为应对未来各种金融风险 and 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好制度准备。

2. 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模式。（1）构建完备的法律框架。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关法律不仅保证了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合法性，还保障了其权力的有效、顺利实施。建立一项新的制度，必须有相关法律的保障。我国正在进行相关法律的研究与论证，可以参考韩国的法律框架，设计我国的存款保险法律体系。（2）设计完善的存款保险机构组织架构。韩国存款保险机构组织架构较为完善，既有保证存款保险制度顺利运行的组织体系，也有保障存款保险制度合法、安全运行的监督组织体系，并且在这种组织体系下，韩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运行良好。在我国即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际，设计完善的存款保险机构组织架构将是保证其顺利运行的有力保障。我国可借鉴KDIC模式设计存款保

^① 资料来源：“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不良贷款损害赔偿诉讼成效不彰”，2006年10月25日，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sjjj/gat/200610/25/t20061025_9126216.shtml。

险机构的组织架构。（3）建立合理的破产金融机构损失分摊机制。KDIC要求银行股东和借款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共同分摊破产金融机构的损失，同时追究金融机构管理者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些举措提高了金融机构自我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促使其稳健经营，是维护存款人信心的重要保证。我国在进行存款保险制度设计时，应避免政府和存款保险机构兜底的情况，也有必要设置相应的损失分摊机制，从机制上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4）设置灵活的担保机制。韩国存款保险体系在危机期间采取灵活的担保政策，使其顺利化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时，也应该考虑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危机时灵活调整其担保政策的权力，设置灵活的担保机制，根据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适时改变可担保的额度和范围以及存款偿付的时间期限，在担保成本与收益之间寻找平衡点，获得成本约束下最大的社会效益。（5）实行差别化的保费费率。KDIC没有实行风险调整型保费费率，而是针对不同类别金融机构按不同费率收取，各个类别金融机构内部按统一费率收取。这种方式既考虑了不同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不同，又减少了保费征收成本，在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和为期不长的发展历史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期，暂不适合直接采用完全的风险调整型保费费率，可根据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别与规模设计不同档次保费费率。（6）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监管职能。2006年，韩国存款保险基金未能及时收回和恢复，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这实质上是KDIC日常运行过程中的监管职能执行不力的结果。鉴于此，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应注重设计好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职能，建立相关机制，确保其自身运行的有效性。特别要从法律角度保障其强制执行力。

3. 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的辅助机制。（1）开展广泛的协作。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后，必然与原有的最后贷款人和审慎监管制度产生某种程度的交替。各种金融安全网要素的平衡与协作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保证其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此外，我国也将面临金融市场的全面放开，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交流必不可少。我国在创建存款保险制度时，应该考虑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内国际协作机制，例如从存款保险机构决策层人员构成上加强与各金融安全网设施的协作，建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存款保险研讨合作平台以促进国际协作等。（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机制。KDIC高度重视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认为这种研究对于在高速变化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制度的平稳运行和存款保险公司运作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KDIC不仅对国外先进的存款保险制度进行研究，还对国内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定期发布研究报告。我国不仅应该高度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前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应重视制度建立之后的研究，以促进并保持存款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Angkinand Apanard, and Wihlborg, Clas, 2010, “Deposit Insurance Coverage, Ownership, and Bank’s Risk-taking in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9, pp.252-272.
2. Beck, Thorsten, 2002, “Deposit insurance as private club: is Germany a model?”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2, pp.701-719.
3. Walker, David K., 2008, “Deposit Insura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anada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Working Paper* (August 15, 2008).
4. Hosono, K, 2005, “Market discipline to banks in Indonesia, Korea, Malaysia and Thailand”, <http://www.adbi.org/files/2005.01.21.cpp.market.discipline.banks.pdf>.
5. Choi, Jang-Bong, 2000, “Structuring a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from the Asian Perspective”, *a study of financial markets*,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pp. 65-102.
6. Hosono, Kaoru, Iwaki, Hiroko, and Tsuru, Kotaro, 2005, “Banking Crises, Deposit Insur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 Lessons from the Asian Crise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5-E-029*.
7. KDIC, May 2011, “KDIC Statistics”, <http://www.kdic.or.kr/english/publication/conference.jsp>.
8. KDIC 网站: http://www.kdic.or.kr/english/fund/manage_overview.jsp。
9.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 2013, 《银行家》第1期。
10.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网站: <http://www.fsc.go.kr/eng/>。
11. 韩国金融监管服务部网站: <http://english.fss.or.kr/fss/en/eabu/int/est.jsp>。
12. 韩国战略财政部网站: <http://english.mosf.go.kr/>。
13. 史长文、张贵友, 2011, 《从韩国应对银行“挤兑潮”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金融理论与教学》第2期。

责任编辑: 晨乔

中国外贸发展的几个认识问题

沈丹阳

摘要：10多年来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总体上是持续健康的，为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外贸的高速发展更多的得益于体制改革动力的释放，是一种“机制性内生型增长”；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算高、在全球贸易的份额还有提升的空间；扩大内需不应以牺牲外需为代价；最后提出中国如何从贸易大国逐步成为贸易强国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外贸 稳定出口 贸易强国

作者简介：沈丹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今年春节期间，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其2012年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后，国外媒体迅速宣布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再次引发了全球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强烈关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仅增长6.2%，是近10年来除2009年外增速最低的一年；而2013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贸面临的成本上升、外需不足和贸易环境趋于恶化等问题似乎远未到尽头，因此国内研究学者普遍对2013年外贸发展信心不足，一些企业发出了“中国外贸的好日子到头了”的感叹。当前，一方面，国内外方方面面的人对中国外贸发展有一些疑问和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认识；另一方面，企业和研究学者对于中国外贸近期前景判断分歧较大。究竟对中国外贸发展现状应如何认识？中国外贸的好日子是不是真的到头了呢？笔者从学术探讨的角度，就其中一些问题做个粗浅的分析。

一、如何看待中国外贸发展的贡献与质量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以来，中国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年中国的大发展，主要原因或者动力是什么？全世界很多人在研究，争论个不休。笔者的看法，说到底还是四个字：改革、开放。而过去10年中国最大的开放是什么？我认

为就是对外贸易的大开放。国际上有许多人认为，10多年来中国是全球贸易最大赢家，因为中国在全球的贸易份额大幅度提升了，并且在带动本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等方面贡献巨大。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规模刚刚超过5000亿美元，2012年已达3.87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多，从占全球贸易份额的不到4%上升至11.1%，自2009年以来一直是全球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体。美国有学者研究认为，近年来全球新增加的出口额，1/3以上归中国；新增长的经济总量，1/4以上在中国；新增加的就业，1/2以上在中国。

更重要的是，对外贸易大开放带来的充分竞争，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使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大发展，也使中国国民福利总体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是就业机会增多。目前全国每年有超过1亿的人直接或间接从事着与对外贸易相关的工作。二是人均收入提高。10多年来，由于从事对外贸易相关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工资水平的持续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三是物质极大丰富。中国人民通过对外贸易和相关合作，在把自己辛勤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同时也可以买到来自全世界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老百姓拥有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尽管中国外贸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一直有观点认为中国外贸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协调、不健康、不可持续以及质量问题。应该承认，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体制性缺陷，中国外贸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我们通过以下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10多年来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总体上是持续健康的成长。

第一个事实：增长动力是健康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各类出口企业出口效益高、利润稳定是企业出口的直接动力。就生产企业而言，外销效益普遍好于内销效益；就外贸企业而言，出口利润总体高于进口利润。正是由于从出口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市场与利润），从而促使着中国企业不断地扩大出口规模。“十一五”期间，中国出口主体主要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仅占不到10%，外贸出口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企业既不是为了“任务”而出口，也不是为了出口而出口，而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口。应该说这种增长动力是健康的。

第二个事实：增长规模和结构是健康的。一是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持续增长，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也大幅增长，出口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2012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提高到95%以上，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由“十五”末的56%和28.6%提高到2012年的57.6%和近30%。汽车、船舶、飞机、铁路装备、通讯产品等大型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均有了新的突破。二是一般贸易出口增长快于加工贸易、内资企业出口增长快于外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增速持续超过加工贸易增速，一般贸易出口占比由“十五”末的41.4%上升到2012年的48.2%。民营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已连续10多年远远超过外资企

业，“十一五”期间的年平均增速高达40%以上。自2006年上半年起，民营企业出口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第二大出口主力，进出口占比由“十五”末期的15.7%提高到2012年的33.5%。三是市场多元化取得明显进展，出口市场布局渐趋合理。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程度明显下降，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对欧、美、日三大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0年前超过50%下降到2012年的35.1%。

第三个事实：宏观利益是持续增长的。尽管从宏观上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绝非简单，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近年来从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并且因此带动了中国经济全面增长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比如，中国主要出口商品的卖价总体呈增长趋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过去10多年平均每年增长至少超过2%。按照更加科学的“收入贸易条件”理论来分析中国出口增长，同样可以得出中国外贸出口所带来的宏观利益是不断扩大的结论。早在2005年，同济大学陈飞翔教授等学者对1995—2004年中国收入贸易条件加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近年来中国外贸出口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不仅使中国从国际分工与交换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也对国内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贡献，是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裴长洪所长等学者的研究，2005—2012年，这种贸易条件的改善趋势又进一步得到强化。

除了上述事实，我们还应看到中国外贸大发展对中国深化改革的有力推动作用，对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积极影响。比如，我们通过将全球贸易中“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等原则融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

二、中国外贸发展究竟依靠了什么

国内外不断有学者认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以高昂的“政策成本”为代价的。另有一种观点，则一再批评说中国出口都是低端低价，以资源能源损耗为代价，增长是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外贸发展或多或少得益于一系列政策支持，是一种“政策推动型”的增长；近10多年来的外贸发展则更多的得益于体制改革动力的释放，是一种“机制性内生型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外贸严格在世界组织规则框架下运行，优惠政策几乎全部取消，且政府对出口的具体支持——所谓的“政策成本”是不断缩小的。一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财政补贴取消了；二是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经过多次下调，目前低于12%的水平，实际上已处于“负补贴”状态；三是对“两资一高”和纺织品等敏感商品采取了征收出口关税或有偿配额等限制性措

施；四是人民币汇率持续朝着削弱出口竞争力的方向调整而非相反。

至于说中国出口的产品都是“地摊货”，以低端低价取胜，则是一种老眼光。实际上，从2000年以后，情况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出口的商品从低端产品到中端产品到高端产品，逐步升级。现在出口的商品远远不是低端和低价了。去年3月，商务部陈德铭部长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正式澄清：中国现在的出口主要是中端产品，不是低端产品。尽管现在仍有一部分出口到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商品仍以低端为主，但出口到欧美国家的商品大量属中高端，其中除了一部分是外国企业、外国品牌在中国开展加工贸易后出口的商品外，相当一部分是国内企业自主产品。何况同一产品在不同地区的档次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决不能一概而论地讲中国出口的商品都属于低端。应该说，中国现在出口的商品是多元的，从开始主要出口原辅材料，到现在出口大量工业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出口商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坚持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10多年，是中国出口商品质量不断提升，价格不断提高，自主品牌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出口生产相关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得到调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一方面产品档次、质量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竞争力逐步增强，使有一部分产品性价比大大提升了，具备了较强的价格竞争力。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通过改革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是推动中国外贸大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并且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三、中国还需要不需要继续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无论回顾历史还是考察现实，全世界几乎找不到有哪个国家不积极促进本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之所以在中国成为问题，大概主要是因为有三个认识上的误区：其一，认为中国外贸增长过快、外贸依存度过高，存在发展风险；其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要从以外需拉动为主转到内需拉动为主，要控制外需增长；其三，认为中国外贸占全球比重进一步提高将带来更多的贸易摩擦，不可持续。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当然首先认识到，中国外贸发展确实存在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如果以此否定积极发展外贸的必要性，则不免因噎废食，或落入圈套。

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吗？近两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大约是50%左右（出口依存度大约是26%左右），而前些年更高些，曾达到60%多，由此引发了一些担忧。2009年3月，《环球》杂志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专家，当时90%的专家认为外贸依存度过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风险，而且其中70%的人认为它是最大的影响因素。虽然此调查不一定具代表性，但足以说明国内部分学者对外贸发展问题存在认识误区。其实，在国

际贸易和经济学理论上，外贸依存度既不等于经济开放度，也不等于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更不等于经济风险度。就实证研究分析，从没有哪个国家因外贸依存度高了，就给这个国家经济带来高风险。相反，随机找一个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研究，都可以发现其外贸依存度都是高的，甚至越是小的国家外贸依存度越高，比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其外贸依存度高到100%甚至200%。

中国出口增长过快了吗？英国经济学家兼媒体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这么慢》的文章，称其研究发现中国无论GDP还是外贸的增速，比起上世纪60、70年代东亚经济起飞的一些国家，比起50、60年代的日本，增速是相对慢的。那段时间，那些国家也提出经济增长翻番，有些经济指标三五年就翻番（像外贸进出口规模，有些国家当年就翻番），都出现过对外贸易超高速发展阶段。认真比较分析这些国家的发展，确实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速不算太快。如果比较外贸依存度的高峰阶段，英国、法国、德国、丹麦和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曾经有很高的比重，一半都在40%以上，有一些小的国家和地区甚至超过100%。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进出口双超高增长和高外贸依存度成为常态已是客观事实。这是因为，全球化促使每个国家必须在全球充分配置资源，必须努力扩大进出口，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贸易依存度也是越来越高的。1820年，全世界贸易依存度大概只有2%，1950年提高到21%，2002年是47%，现在则超过了50%。之所以全球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主要原因有：（1）国际流通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命脉，全球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各国经济发展。（2）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每个国家都积极发展外贸，全球贸易总量不断增大。（3）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对全球贸易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近日在接受法国国民议会质询时就表示，当前世界贸易格局、内涵和阻碍贸易发展的因素均在发生深刻的演变。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带动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步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大部分产品由单一国家制造转为全球制造，中间产品贸易占世界贸易份额已达60%。一国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成分比例，目前在全球平均大约是40%，而且比重还在持续上升。

扩大内需要以牺牲外需为代价吗？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出现的“过度出口论”、“放弃外需论”、“出口负贡献论”、“出口补贴外国论”等观点，则是对中国内外需基本现状的误解和对扩大内需方针的误读。（1）多年来中国“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并非主要靠出口，而是靠投资和消费，外需从未“为主”或“过度依赖”过。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过大，而非出口过大。换言之，投资拉动过大，消费拉动偏小，才是问题所在。（2）扩大内需与发展对外贸易并不矛盾，两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积累和形成了较大的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能力，为解决城乡居民就业和增加收入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有力地提升了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技术水准，为扩大内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3）外需的拓展是内需结构不合理的“果”而非“因”。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合理投资率区间应在24.6%—35.8%之间，但中国投资率多年维持在45%左右，出现了巨大产能过剩。在国内消费不足以吸收这些产能情况下，过剩生产能力只能向外寻求出路。而要通过扩大国内消费来弥补高投资率带来的产能扩大，理论上看似可行，实践中面临一系列复杂棘手问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4）外需下降与消费增长并非“此消彼长”关系。一些人误以为外需过旺影响了内需，外需下降后消费就会增长。商务部研究院前几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外需下降不仅不能扩大消费，反而相反。这是因为中国出口产品20%—30%的成本是工资成本，每出口1个美元就意味着给参与到这个产品生产制作过程的从业人员带来1元多工资性的收入，这些工资性的收入的减少必然带来消费的减少。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也曾作过一个实证研究，测算出中国出口带动就业人数2009年是13360万人，2010年是14900万人，2011年是14955万人。出口每减增1亿美元，就意味着将减少1万多个就业机会；出口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直接减少境内消费100亿元人民币以上。

中国外贸占全球贸易份额过高了吗？尽管一些美国、欧盟等国家学者确实试图从相对客观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国出口份额“过高”如何不利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但不必讳言的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人士提出此类问题难免带有其国家利益心态或看问题角度偏颇的因素。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提振出口、拓展国际市场成为许多国家促增长、保就业的优先选择。实际上各国都在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美国大力推进“出口倍增计划”就是一例。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首次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国家出口倡议”的战略目标，力争到2014年货物和服务出口额比2009年翻一番，并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2010—2012年间，美国出口份额分别增长16.7%、14.2%和4.4%，接近实现其既定目标。因此，国外学者质疑中国外贸占全球份额高尚可理解，但国内学者跟着指责中国出口份额太高则很值得商榷。如果主要是基于外贸依存度的原因，则属认识误区；如因担心贸易摩擦增多，则不足为虑，因为在国际贸易博弈中“枪打出头鸟”总是免不了的。其实，和英、美、德、日等传统贸易大国以往情况相比，我们现在的出口份额仍然还有很大空间。英国出口1820年占全球27%，美国1947年占了32.5%，德国和日本都曾经占到10%以上，到今天德国在全世界贸易出口中的份额仍然将近10%。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口占全球超过1/5，而美国只占全球人口4.5%，德国占1.2%，日本占1.8%；目前中国GDP总量差不多占全球近10%，制造业产出占全球大概20%左右，而出口才占10%多一些，则中国目前占全球出口比重其实仍是偏低的。至于贸易摩擦，在全球贸易“僧多粥少”局面下，有一

些贸易摩擦是正常的，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又要头脑清醒，平常心看待。

四、“贸易强国”之路下一步该如何走

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应该是近年就可以实现，作为“贸易大国”已无可争议，关键是如何才能成为“贸易强国”。

要逐步发展成为“贸易强国”，当前重要的是要落实好党的十八大和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把稳定出口和扩大进口结合起来，推动对外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和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促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这一战略部署。按照这一部署，有几个认识问题必须很清晰：

首先，要继续坚持稳定出口。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就业压力大、科技相对落后，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振的形势下，更必须正确估价出口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把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结合起来，继续坚持促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方针不变。

其次，要继续保持进出口大体平衡增长。这种平衡增长不是以牺牲出口为代价，而是要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必须正确认识导致外贸顺差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顺差主要由于外贸出口规模过大造成的吗？不是。种种例证已经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长实际上是健康和有益的增长，抑制出口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因此，不得不要更多地从另一个方面——进口来寻求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答案。而要扩大进口，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办法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的，必须以“治本”的方法“下药”——也就是要更多地从综合运用与进口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着手研究解决的良策。由于中国现阶段的边际进口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只要宏观政策运用得当，在一定时期内既扩大进口、缩小顺差，又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积极影响，是可能的。

第三，要高度重视外贸的质量效益。外贸质量效益的好坏，从宏观上考察，主要是通过贸易结构的优化和贸易条件的改善来体现。因此，要进一步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进一步推进外贸结构的“五个优化”，即优化国际市场布局、优化国内区域布局、优化外贸经营主体、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贸易方式。在巩固欧美日港传统市场的同时，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外贸规模的同时，提高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在坚持外贸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同时，提高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在稳定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同时，

提高高新技术、出口品牌等产品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方式。

第四，要努力形成对外贸易综合竞争新优势。它的核心内容是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我们一方面要努力促进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在国家整体外贸竞争力上努力形成新优势。就“技术”而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在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基础上，扩大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机电产品、成套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促进知识和技能密集型产品和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就“品牌”而言，品牌是竞争的关键，要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提高出口产品的品牌竞争力。鼓励各种名牌和优质产品出口，扩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就“质量”而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要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就“服务”而言，要改进政府服务水平，增强企业服务意识，提高全方位外贸服务能力。企业一定要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才能真正培育出外贸竞争新优势。

回过头来看，究竟中国外贸的好日子到头了没有？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1）中国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离不开外贸。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共同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我们既不能过分依靠投资，也不能短期内就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我们必须三者都依靠。（2）“东方不亮西方亮”。现在我们出口总体上说不容乐观，但有一部分产品依然有很强竞争力，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很快，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发展势头很好。（3）更重要的是，外贸抗冲击能力提高了。外贸这几年起伏变化很多次了，很多企业以及政府的部门经历过这些风雨，见过这些世面，有了抗冲击的能力。（4）最根本的因素是我们的综合竞争力是提升而非下降的趋势。

总之，保持中国外贸稳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需要，结构调整的需要，社会稳定的需要，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需要。中国外贸既有比较好的基础，又有市场的需求，总体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正因为有这些需要和可能，我认为中国外贸的好日子不仅没有到头，而且说不定好日子还长着呢。

责任编辑：晨乔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创新 与体制机制改革

陈 昭 于立新

摘要：服务贸易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逐渐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就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来看，货物贸易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遇到发展瓶颈，增长乏力，这使外需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减弱。在这种形势下，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无疑成了稳定外需的新途径，与此同时，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应提上议程，以确保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 经验模式 发展瓶颈 改革

作者简介：陈 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服务贸易与WTO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于立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服务贸易与WTO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稳定经济增长速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已成为当下中国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首要实现的经济目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实现这一系列目标的关键环节。同样，在外贸领域也面临着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创新开放模式以及加快管理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传统货物贸易发展受阻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健康发展将引起国内外各界足够重视，以确保外需的稳定，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也正是开放型经济实现稳增长、转方式和调结构的应有之意。

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长期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始终保持着快速发展，总量规模稳步扩大。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在规模上的增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统计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17亿美元增长到3624亿美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7%以上。其中，

服务出口年均增速为16.8%，是同期世界服务出口平均增速的两倍。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更是突破了4000亿美元大关，达到4191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其中，出口规模位列世界第四位，进口规模居世界第三位。而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44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服务出口13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5%；进口20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2%。预计2012年全年服务进出口总规模将超过4700亿美元。^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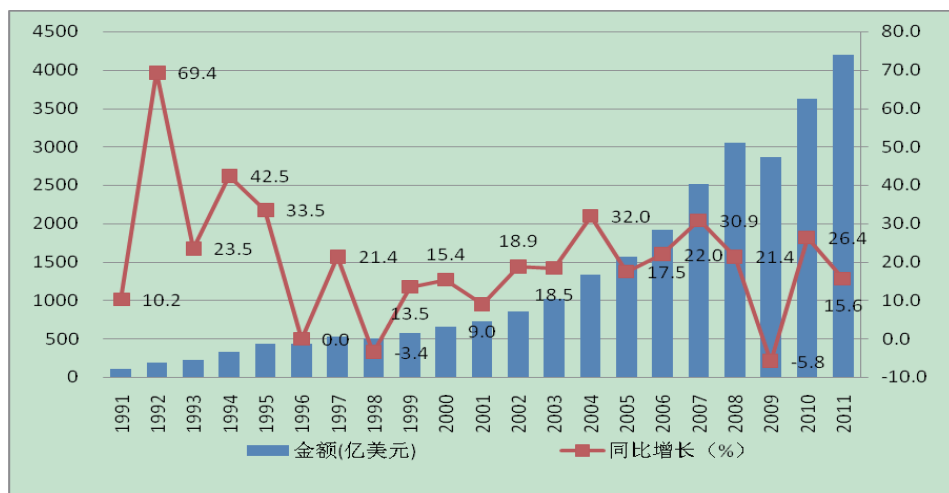


图1 1991-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2011》数据组制图。

（二）服务贸易结构趋于优化

从贸易结构来看，趋于优化。近年来，随着服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也在逐渐调整。特别是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咨询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进出口额的增长。如表1所示，“十一五”期间，尽管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仍以运输、旅游传统服务项目为主，但其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及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新兴项目占出口比重逐年上升，已经由2006年的12.8%增加到2010年的21.1%。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咨询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服务三个新兴项目的进出口额均比上年增长了20%多，且获得了较大的顺差额，而这一趋势仍在持续。^②同时，运输、旅游等传统项目占服务贸易总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逆差额也在增加。此外，国家将在技术创

① 有关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

② 倪月菊，2012，《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短期难破 调整结构迫在眉睫》，《国际商报》9月3日。

新与开发、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等方面加大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技术密集且附加值高的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不断促进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表1 “十一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目表

	服务贸易出口金额（亿美元）		占服务贸易出口比重（%）	
	2006年	2010年	2006年	2010年
总计	914.2	1702.5	100.0	100.0
运输	210.2	342.1	23.0	20.1
旅游	339.5	458.1	37.1	26.9
通讯服务	7.4	12.2	0.8	0.7
建筑服务	27.5	144.9	3.0	8.5
保险服务	5.5	17.3	0.6	1.0
金融服务	1.5	13.3	0.2	0.8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29.6	92.6	3.2	5.4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2.1	8.3	0.2	0.5
咨询	78.3	227.7	8.6	13.4
广告	14.5	28.9	1.6	1.7
电影、音像	1.4	1.2	0.1	0.1
其他商业服务	196.9	355.9	21.5	20.9

说明：①遵循WTO有关服务贸易的定义，中国服务进出口数据不含政府服务；②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三）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

虽然我国服务外包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自2009年国务院批复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后^①，中国服务外包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产业规模迅速扩张，服务外包企业数量、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及服务外包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形成了以ITO为主导，BPO和KPO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引领作用显现，有效带动并引导了全国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从数据上看，2012年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14万份，合同金额612.8亿美元，同比增长37%，执行金额465.7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其中，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438.5亿美元，同比增长34.4%，执行金额3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1.1%。业务结构上仍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2012年，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占比分别为56.1%、15.5%和28.4%。市场结构方面，美国、欧盟和日本仍是中国主要的业务发包方，2012年中国承接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外包执行额占总执行额的比重分别是26.6%、16.2%和14.4%。同时，服务外包吸纳高学历人才就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2012年，具有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

① 注：厦门在2010年获得国务院批复，增列成为中国第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291万人，占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总数的67.8%。总体上，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形式，有利于促进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增加及结构升级，尤其是在扩大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及培养方面将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区域服务贸易发展各具特色

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服务贸易较为发达的三大区域，其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各具特色。如环渤海地区，北京依托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推动服务贸易的高端化品牌化发展；天津则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港口优势，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再如长三角地区，上海市围绕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等四个中心的建设，实现服务贸易在区域内的联动发展；浙江省作为民营资本和市场经济较为活跃的省份，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传统服务贸易与新兴服务贸易得到协调发展。又如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其利用港澳优势发展服务贸易，并通过大胆探索和落实先行先试政策，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增强了服务贸易发展活力。通过对东部较为发达省市服务贸易发展特点的总结，不难发现各地服务贸易发展思路和模式各具特色，但都充分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而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的新形式，也颇受各地政府的重视，成为各区域发展服务贸易的共同突破口。

尽管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显著，如长期处于逆差，贸易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不强等。究其原因，固然是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但产业本身的发展问题及相关体制机制制约亦要引起高度重视，不容懈怠。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也只有理顺服务贸易与服务业、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创新开放模式等方面若干关系，并积极破解服务贸易发展制度瓶颈，才能够确保服务贸易在新一轮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层面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产业基础即服务业供给不足，服务贸易结构欠合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带动作用不明显。

1. 服务产业发展滞后。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其产业基础，服务业决定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尽管目前中国服务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并未彻底改变服务业占GDP比重偏低，传统服务业占服务业总量比重偏高的局面。较之发达国家，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服务业并不能较好的支撑服务贸易的发展，

影响了贸易结构的调整，薄弱的产业基础，必然会导致相关服务贸易部门国际竞争力不强。也就是说，服务业开放和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短板”。鉴于此，发展服务贸易要与发展服务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脱离服务业基础的贸易是不可持续的。

2. 服务贸易结构欠合理。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升，但是从服务贸易产品结构现状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仍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部门，而在计算机、信息、金融、版权服务等新型的服务贸易中，中国出口规模较小，缺乏国际竞争力。如2011年中国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出口仍然占到服务贸易总出口的额45%左右，而在全世界服务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通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利服务、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尽管其出口增速高于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速，但目前这些行业规模偏小，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服务产业基础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竞争力低，而中国服务贸易仍然对商品贸易存在高度依赖，其出口的很大部分服务基本集中于经济附加值低的运输服务和通信服务上，而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发展最快的金融、保险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却出口乏力，增长量微乎其微，而进口则恰恰相反。此外，中国服务贸易的区域结构也不平衡，进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欧盟、美国和日本，合计约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60%以上。

3.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促进作用不显著。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贸易方式，但二者之间关系却十分密切，一方面，运输、保险、咨询等服务行业是伴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支撑着货物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货物贸易的发展会增加对服务贸易的需求等，对服务贸易的发展有较强的带动作用。李静萍运用对影响服务贸易的宏观因素（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服务业增加值及年增长率、商品出口量、商品进口量等）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①从理论分析看，由于运输、保险等行业是服务于货物贸易的，货物贸易的发展一定会带动相应服务贸易的需求，进而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但事实上，中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相互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发展，特别是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货物贸易进一步拓展所需的高端优质服务基本上通过从外国进口实现，而低端的服务贸易领域竞争相对激烈，附加值较低，形不成对服务贸易出口的有力促进。

① 李静萍，2002，《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因素》，《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二）制度层面

1. 传统对外贸易观念有待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出口导向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货物贸易有效的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及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货物贸易一直以来都被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点。与此相比较，服务贸易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并没有与货物贸易放在等同的位置来看待。同时，在观念层面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基本还停留在口头上，并未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发展服务贸易的坚决性也大打折扣。此外，某些职能部门的主管对服务贸易的概念和界定还较为模糊，往往将服务贸易与服务业混为一谈，更难理清12大类165个分项，不知发展服务贸易应从何处着手，这些都对服务贸易的发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渐改善。

2. 服务贸易统计体系有待完善。长期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就落后于发达国家，存在不少需要重新构建和改进的地方。尽管，2007年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遵循国际标准，且结合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和特点，联合发布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并于2010年、2012年对其进行两次修订，但由于在数据的全面性、时效性和准确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至今难以满足社会各界对服务贸易信息的需求。同时，我们还缺乏服务贸易统计归口管理部门，虽然中国服务贸易统计由商务部与国家统计局联合负责，也建立了国际服务贸易直报系统，但由于服务贸易企业数量繁多且覆盖面广，加上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及各企业的自主申报意识不强，造成了直接申报表回收率不高，数据可用性差等问题。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落后，使得我们很难对中国服务贸易真实发展情况有清晰且正确的认识，进而也会影响到相应政策的制定与出台。

3. 服务贸易相关政策安排有待调整。尽管中国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政策扶植力度在逐渐加大，但由于长期以来优惠政策都是倾向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故这些针对服务贸易的政策在设计上也基本参照甚至照搬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套路，并不能真正满足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需要。如从税制方面来讲，中国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不匹配，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事权责任，致使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税收较多的制造业，而忽视服务贸易产业基础服务业的发展。再如服务外包补贴方面，主要针对新进服务外包人员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服务外包企业人员的流动性，有利于呼叫中心等低端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而对于技术含量高的外包企业因其人员流动性弱，再加上申报手续繁琐，并不能真正享受到该项优惠政策。此外，有关对外贸易综合报关和结汇等政策也存在一定制度缺失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

4. 服务贸易多头管理的局面有待改观。长期以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管理体制上就存在很大统筹问题，时常会出现多头管理的局面，并且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较

差，故出现不利情况后，各职能部门时常会互相推诿，多头管理最终变成了无人管理。以地方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为例，相关主管部门就包括宣传办、商务局、文化局、广播电视局等，协调难度较大，管理上也会出现较多漏洞与不足。诚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因部门种类繁多，也确实遇到分散和多头管理的局面，但关键是要完善协调机制，不能仅局限于各自的部门利益，最终不利于服务贸易的良性发展。

5. 中国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不健全，对GATS的运用程度不高。总体来看，受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制约，中国服务贸易的立法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的领域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一些重要服务部门尚无立法或配套法律欠缺，而已颁布的有些服务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较为空泛，缺乏实际操作意义，这使得服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可依，严重阻碍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除此以外，有些法律法规与国际贸易的规则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电信业、旅游业相应法规缺乏；而现有的与之相关的其他法律，如《知识产权保护法》、《税法》、《公司法》等综合法律中缺乏配套条款。另外，由于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加大，外国服务贸易经营者的不断进入，但国内市场还缺乏《竞争法》、《移民法》等配套法律。尽管近年来，中国加快了服务贸易立法步伐，颁布了一批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但零碎立法尚未形成体系，严重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健康发展。此外，中国服务贸易对GATS的应用也主要体现在相关立法上，不少针对外国服务贸易提供者权利义务的立法与GATS规定的原则存在出入，导致了国际服务分歧发生；某项服务行业的配套法规与中国入世承诺表协议中的服务贸易规定不符；而在GATS中定义的四种服务贸易类型，除商业存在这一项外，其他三种服务提供方式很少有相应法律法规涉及。可见，中国服务贸易在GATS的运用水平尚待提高。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政策建议

（一）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将成为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强劲动力

目前，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需求与有效供给严重不足^①，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难以满足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上文对服务贸易制度瓶颈的阐述，体制机制弊端成为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服务贸易管理模式，在机构设置上寻求突破。我们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服务贸易发展促进办公室，组织协调全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事宜，统筹服务贸易政策、相关法律法规、战略规划的制定，以及部门协调等一系列工作。同时，要找准和紧抓服务贸易发展的“牛鼻子”，积极推动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特征的服

^① 于立新等，2011，《WTO与中国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财贸经济》第11期。

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具体来看，首先，应该在未来3年内，积极推动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筹建服务贸易发展促进机构，统筹服务贸易发展改革事宜；5年内，筹建类似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政府管理外围机构，由政府、学界和行业中介组织代表企业，来共同参与到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政策规划制定过程中来；8到10年内，从中央到地方创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其次，要转变传统外贸发展理念，统一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思想认识，争取在新阶段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中有所拓展。当然，强调服务贸易也并非是否定货物贸易，二者的协调发展才是未来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方向与思路。再次，要加强对服务贸易干部队伍的培养，定期组织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服务贸易相关培训，及赴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考察，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等，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素养和能力。同时，要完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设计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在财税、海关报关、结汇等若干方面，要根据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特点进行调整，对于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要根据行业和区域特点进行制定，切忌“一刀切”，而对政策的实施也要做到定期评估，适时调整。要实施有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分离的有效措施，打破服务行业 and 市场的行政化垄断，推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专业化发展。并且，还要充分发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辅助主管部门有效开展统计和相关管理工作等。此外，还要强化部门间协调能力，实现资源共享，通过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以期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沟通，有效解决。

（二）服务贸易的发展要处理好与服务业及货物贸易的关系

服务贸易的发展必然与服务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将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和货物贸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实现相互间的协调发展。因此，要继续推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运输、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展会等生产性服务业，为服务贸易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而服务贸易也要通过进口，引进国外先进优质服务，并在溢出效应下，提升服务业结构升级，不断强化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最终转化为服务出口。当然，服务贸易也要紧密结合货物贸易，要以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外包、文化创意产业国际贸易为主要突破口，建立适合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协调发展的机制。

同时，要充分肯定服务外包发展的真实红利。客观上看，各地政府都将服务外包作为当地发展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谈及服务贸易时，服务外包的发展必不可少。而服务外包作为服务业领域的加工贸易，其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最大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当期的规模和增速上，而是表现在对未来高端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上。服务外

包可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但其更为深远的影响还是对人才的培育。通过承接服务外包，随着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溢出，从事外包业务的劳动力会将先进的技术、工艺流程和管理经验等充分消化吸收，成为潜在的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高端人才。此外，服务外包可作为服务贸易政策制定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区，通过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先行先试，将好的政策及改革经验向服务贸易多个领域推广。

除此之外，服务贸易还要不断拓展新的供给，开发新颖的服务项目，如教育旅游、医疗旅游等，并不遗余力的发展与民生相关的生活性服务贸易，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三）加强服务贸易区域合作

随着中国与周边经济体区域合作程度的不断加深，服务贸易日益成为中国区域合作的战略重点领域。通过区域合作、优势互补，中国服务贸易及国内的服务业将迅速增长，并且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贸易结构优化。而产业、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动力机制的转换又是中国内外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要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自贸区的建设不仅是经贸的合作，还承载着社会、政治、文化、外交等多元目标，对此必须有新的认识和定位。目前已经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而以实际贸易额来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目前已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经济体仅有新西兰。近期中国应该以服务贸易区域合作为重要抓手及突破口，加快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重要贸易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

（四）健全与WTO规则接轨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完善既符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特点，又与WTO贸易规则特别是GATS接轨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使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服务市场准入原则、服务贸易的税收、投资、优惠条件等要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增加中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使服务贸易真正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正确利用有关例外条款，制定适度的保护政策，以保护中国服务贸易的正常发展。对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服务部门应以法律的形式对保障的范围和程度予以规定，防止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五）加强培养和引进精通国际服务贸易业务的复合型人才

首先要提高国际服务贸易从业人员素质。可在现有各高校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专业中加开国际服务贸易课程，有条件的院校还可筹建服务贸易专业，培养熟悉国际服务贸易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加强对现有人员的短期培训，使其尽快了解和熟悉GATS的有关条款及中国服务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提高国际服务贸易的市场竞争力。其次是制定（下转第92页）

· 产业发展 ·

鼓励流通创新 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产业政策*

盛朝迅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呈现较为明显的“重生产、轻流通”、“重制造、轻服务”倾向。随着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阶段变化和流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流通创新在我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技术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攀升也越来越显著。为此，需要调整我国产业政策思路，实施鼓励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从单纯重视生产制造环节转向“生产与流通并重”，并切实采取措施促进流通创新，发挥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功能。

关键词：流通创新 制造业升级 产业政策

作者简介：盛朝迅，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一、流通创新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创新活动具有丰富的内涵，自熊彼特明确提出创新的概念之后，许多学者围绕这一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就流通创新的内容而言，主要包括流通创新本质论（宋则、荆林波，2004）、流通创新市场导向论（郑光财，2007）、流通创新手段论（张弘，2005）和流通创新理论与实践二分法（张得银，2008）等。本文从较为宏观和流通创新价值实现的视角分析流通创新，认为流通创新是流通领域基于顾客价值的价值创造过程，它既包括为消费者提供的批发零售、休闲购物、售后服务等消费性服务，又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型零售商主导产业链的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12CJY068）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盛朝迅；指导老师：王岳平。

包括为生生产者提供的市场调查、信息反馈、产品定制、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作业控制、分包、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等生产性服务。在表现形式上表现为流通价值创新、流通组织创新、流通技术创新和流通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是四者的有机统一。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采购者驱动和服务主导经济发展趋势的逐渐显现，流通创新在我国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1. 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升级动力逐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大型流通企业主导的价值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已不是决定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技术创新和价值创新相互交织产生的竞争新优势成为主导未来经济升级的决定因素，其中，价值创新是关键。大型流通企业通过各种营销方法组合、信息的综合运用，不断满足并创造顾客需求，从而形成对顾客忠诚强大的品牌和渠道优势，成为顾客价值创造的重要主体和价值创新的主要形式。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我国以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等为主要内容的流通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化，很多以往被忽视的流通企业正逐步取得对制造商、供应商的主导权，在引领生产、调整结构、配置资源、促进消费、抵御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现代产业链的发展动力已逐渐由生产者驱动向采购者驱动转变，发展方向逐渐由商品主导向服务主导转变。随着现代产业发展的演进，产业发展规律发生相应变化，现代产业链的发展动力已逐渐由生产者驱动转向采购者驱动。大型零售商作为终端销售平台，利用其消费者顾客信息优势和市场势力，在产业链整合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刘志彪（2009）比较了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与采购者驱动的价值链，认为全球产业链整合的动力正不断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厂商的核心能力由研发（R&D）、生产转向设计、市场营销；进入门槛由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主要产业联系由投资转向贸易等。郎咸平（2010）也认为，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我国制造业要想在经济危机下突围，不能靠政策、靠环境，更不能继续靠纯制造，必须从企业自身找问题，企业要做好产业链“6+1”的升级整合。“除了单纯制造外，一定要整合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因为只有这六大环节才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环节。”与此同时，现代产业链的发展方向逐渐由商品主导转向服务主导。工业经济时代产业链的主导是商品逻辑，比如斯密就认为，国家财富的关键推动者是那些可以出口交换的、剩余有形产出的“生产性”（Productive）的活动，而服务等“非生产性”（No-productive）活动不创造价值。现代产业链的主导从商品主导逐渐转变为服务主导，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比如著名服务品牌耐克和阿迪达斯就几乎没有工厂，有的只是设计、营销和配送

等“服务活动”，其价值创造的方式也发生根本变化，顾客需求、服务和生产一道成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在服务主导的逻辑下，产业链销售和服务环节有可能成为资源整合者，推动整个产业链发展。

3. 制造业发展对现代流通业的依赖逐渐加深。伴随着产业结构变革和消费升级的步伐，发达国家在迈入重化工业时代以后，生产消费价值链逐渐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制造业服务化、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这些变化凸显出制造业发展对现代流通业发展的依赖加深，流通创新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比如在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中，一系列与生产相关的流通过程，如物流、仓储、营销等服务从制造业环节分离出来，逐渐被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或第三方专业流通服务企业所承担，传统的制造部分在价值链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制造业发展越来越依赖流通创新为其提供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

基于此，流通创新通过为消费者和厂商提供消费者服务和生产者服务等双重服务，不断整合提升整个服务价值链的绩效和水平，在整个产业链和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逐渐成为符合市场需求变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

二、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与影响

流通创新不仅以其灵活的市场适应性和强大的绩效表现成为流通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和必然路径，也由于其与制造业升级的紧密相关和生产者服务功能提升，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的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技术升级和产业链升级，在我国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 促进制造业产品升级。制造业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主要是指通过产品开发与质量提升以增加新产品、新品牌的市场份额。流通创新通过一系列组织销售、信息反馈、产品开发设计、产品策略、品牌经营、广告宣传、分销渠道等产品服务组合为制造商提供生产者服务，可以促进销售，并增强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促进制造业产品升级。一是通过卖场环境、货架空间的布置与多种促销方式的综合运用，促进消费者更好地商品，刺激消费者购物欲望，从而提高供应商产品销售额与销售速度。例如笔者调研的江苏苏果超市，“天环”、“苏食”、南京宁果等生产企业在进入苏果超市后市场份额得到迅速扩大。二是在促进制造商产品销售的同时，利用贴近消费者需求的信息优势，为制造商提供动态的消费者需求变化信息，实现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互反馈，有利于制造商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促进制造商根据顾客需求进行产品升级。南京新百商厦会根据供应商销售情况每个季度动态淘汰一批供应商，以此促进供应商根据消

费者需求生产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三是产品定制和自有品牌。一些大型零售商还通过实施自有品牌促进制造业产品升级。比如中央商场通过自有品牌战略，注册“极”、“百思特”两个服装品牌和“紫晶包”、“祖母绿”系列首饰商标，与制造商共同制定款式、成本等方面策略，委托制造商严格定牌监制。因其售价比市场同类产品价低30%左右，年销售额近千万元，制造商、零售商生产和销售定制品牌的资金利润率均高于非定制品牌(徐从才、丁宁，2008)。

2. 促进制造业功能升级。制造业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主要是指改变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专注于价值量更高的环节，并外包或外购低价值环节，比如台湾电子企业由“贴牌生产”(OEM)到“自主设计制造”(ODM)再到“自有品牌制造”(OBM)的功能升级过程。通过系统的流通组织创新、流通技术创新和流通制度创新，能促进产业链的深度整合，进一步提升质量、品牌、速度、服务等综合竞争优势，提高产业链的快速协同能力和满足客户需求能力，协调和组织产销之间的分工制度安排，使制造业更专注于高端制造环节，提升自身附加值和竞争优势，促进制造业功能升级。其主要路径如下：一是促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深化。流通创新为制造商提供日益丰富的生产者服务，促进制造商专业化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不断释放出来，并源源不断地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从而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并增加了其产出价值(高传胜、刘志彪，2005)。二是深化和泛化专业化分工。流通创新通过从制造业中分离出专业化的研发、设计、产品定制和销售服务，促进制造商服务质量、效率、成本和产品更加适应多层次市场需求，促进制造业发展迂回化程度的增强、分工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以此支撑制造业的效率提高与竞争力提升。三是降低交易成本。制造业成本一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流通创新通过信息技术应用、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供应链管理等多种途径和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也给制造业总成本带来节约，促进制造业功能升级。

3. 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一是流通创新所需的各种条码技术、射频技术、仓储计算机管理、电子数据交换、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POS-MIS系统、系统集成软件、电子订货系统(EOS)、商业ERP、商业智能(BI)、供应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也是相关电子信息产品等制造业的核心关键技术。流通创新强大的技术需求对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和技术升级，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比如沃尔玛、苏宁电器等大型零售集团在销售、物流等服务环节引入的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对于相关产业的技术发展和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试验平台和发展机遇。二是流通创新过程中为适应顾客需求的产品创新，也会促使制造业技术升级。顾客需求的变化要求制造业的产品生产从大规模、批量化生产，转向小规模、定制化生产，对制造业生产工

艺、技术流程等提出更高要求，会促进制造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

4. 促进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长期以来，通过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中国制造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但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和自主分销渠道，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甚少，产品价值链和利润分配格局基本被跨国公司掌控。流通创新在提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主要路径有：一是通过增强我国制造业的研发、设计与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大型零售商通过各种产品信息搜集、顾客需求反馈等为制造商提供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产品开发与设计以及信息服务等，以此促进我国制造业研发设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提高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二是促进我国流通业主动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增强对全球市场渠道的控制能力。流通业具有主导商品交易和利润分配的天然优势，因此当我国流通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经营时，可以培养自主销售渠道和品牌、价格主导权，提升制造业的分销能力，获得更多国际分工利益，并通过国际市场增强化解国内经济存量矛盾的能力。三是通过增强对整个产业链的整合能力，提高我国制造业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位次。我国长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之间的产业关联，导致制造业的发展与生产者服务绩效并不太理想，甚至代工式的生产与生产者服务业形成要素竞争（江静、刘志彪，2010）。大型零售商利用自身的信息集成优势和服务优势，帮助企业识别在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寻找产业链中的潜在机会，有利于成员企业突破自身瓶颈，获取沿价值链攀升的动力，从而实现对整个产业链资源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大型零售商拥有的终端控制能力越强，其生产和服务过程越迂回化，产业链和服务链就越长，附加价值就越大，服务中间需求增长和价值创造的机会就越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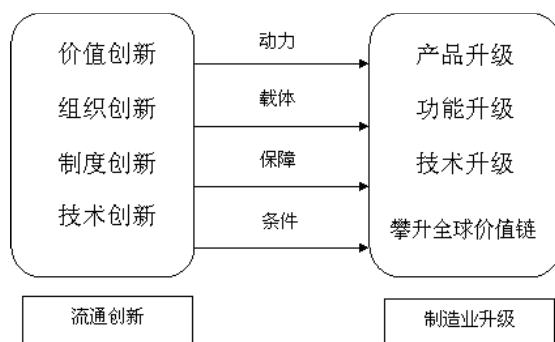


图1 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影响

三、当前制约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主要问题

受流通创新不足和制造业等方面因素影响，当前我国仍存在一些制约流通创新促进

制造业升级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忽视流通创新的作用、流通创新不足加大制造业升级难度、流通成本居高不下、国内市场分割以及部分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可能对制造业产生负面影响等，通过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1. 流通创新在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被忽视。长期以来，由于流通创新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没有被正确认识，导致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忽视流通创新作用的现象。这种忽视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巨大效率损失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滞缓。第一，由于忽视流通创新所具有的天然职能，在时间上导致了国民经济运行中不断累积出巨额库存，造成了“最大的耽搁和停顿、最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比如，由于忽视、轻视对经济节奏和企业流通效能的统计、监测，对商品流通、资本周转速度放慢和库存增长缺少警觉，致使在“八五”至“九五”期间，国民经济至少累计蒙受了本可避免的上万亿元的隐性损失（宋则，2003）。第二，由于忽视流通在结构调整中不可替代的天然功能，片面依赖财政政策、行政手段和供给控制，导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效果不佳，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严重。如果从流通的角度，以需求为导向制定产业政策，做到以需定产，则能有效防范这些风险。

2. 流通创新不足加大制造业升级难度。大型流通企业通过巨额订单和大规模商品采购能力，不断增强对整个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和竞争优势，并以此向制造业，乃至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向控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和国外零售巨头相比，我国零售企业在全渠道采购渠道和销售网络上的控制力还比较弱，流通创新不足，缺乏话语权，导致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难以获得高额收益，产业发展切入全球产业发展体系的控制能力不强，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与此同时，部分制造业领域流通改革不到位，导致产业链各环节回报率严重失衡，流通环节投入低、风险小、回报却高，生产创新环节投入高、风险大、回报却低，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产业升级困难。比如，医药行业由于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医药产品市场价与出厂价价差过高，流通环节利润占全行业利润比重超过70%，降低了企业加强新药研发的创新动力。

3. 市场分割影响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效果。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效果体现有赖于国内市场容量与层级式的需求结构，市场容量越大、层级越丰富，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效果越明显。而在我国，受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放权让利”、行政性分权等政策和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产业发展影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造成市场分割，商品和要素正常流动的渠道扭曲，制约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和流通创新的演化，并进一步增加了制造业升级的难度。

4. 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可能对制造业产生负面影响。大型零售商利用自身贴近消费

者的优势和供应链集成优势，为制造商提供顾客信息、研发改进和售后服务等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绩效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现实中，也有部分大型零售商利用自身纵向约束所形成的市场势力，对制造业进行逆向控制，并收取超额的通道费或进场费，挤压了制造业的盈利空间，造成零供关系的紧张。近年来，我国零供冲突也时有发生。比如，2004年上海炒货风波、2008年国美和格力的分道扬镳等。这也折射出大型零售商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部分制造业受需求萎缩和价格下降影响，陷入微利化境地，对零售商收取通道费的埋怨更加突出，而且自身转型升级也困难，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四、鼓励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流通创新对制造业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和困难。为此，需要强化鼓励流通创新的产业政策，实现由从单纯重视生产制造环节转向“生产与流通并重”的思路转变，提升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绩效。具体政策建议有：

1. 高度重视流通创新在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引导，深刻认识流通创新在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特别是流通价值创新、流通组织创新、流通技术创新和流通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的流通创新在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绩效提高和价值实现等方面的作用。

2. 进一步加强流通创新。一是坚持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流通价值创新。通过大型零售商系统集成的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技术升级和服务升级，促进顾客价值和生产者价值的双重实现。二是加快制造零售商、零售制造商、品牌规则控制、新型商人雇主制和双边市场平台等流通组织创新。通过产品服务、要素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多种渠道促进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分工融合，提升制造商和零售商各自的专业化效率，产生积极的产业链绩效提升效应。三是加强流通技术创新。促进信息化条件下POS-MIS 系统、条形码技术、电子数据交换、电子商务技术、流通办公自动化、电子订货系统（EOS）、商业ERP、商业智能BI、供应链管理、公共信息平台、产品溯源等新型流通技术在采购、物流和销售过程中的应用，改善流通产业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条件，大力发展电子商务，通过构造统一的流通信息平台和网络，增强供应链集成优势。四是加强流通制度创新。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道德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实现流通各参与主体利益的协调和优化，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流通环境的培育和优化。加强流通制度、市场环境等流通发展外部环境的培育，发挥集成优势，推动零售商纵向约束、盈利模式的优化和产业绩效的提升。

3. 着力构建国内统一市场。加强国内经济一体化方面的顶层设计，积极推动财税、流通等体制改革，打破地方保护，使企业能够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自主发展成为综合型大型企业，构造国家产业价值链，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构建国内统一市场，依托国内市场容量与层级式的需求结构，培育具有自主品牌的大型零售企业，发挥流通强大的市场调节效应，积极提升流通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为打造由本土企业控制高端环节和流通渠道的国家产业价值链准备基础条件。

4. 加强对大型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行为的规制。在合理引导促进流通创新良性效应发挥的同时，要对大型零售商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过度组织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就目前现实而言，规制的主要思路可以按照下面的路径逐步展开。一是加强对大型零售商过度组织行为的甄别与调查，对大型零售商与供应商关系、大型零售商组织行为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等展开多维度的评估评判，并对其实际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估，以此作为制定相应规制的依据。二是完善对大型零售商过度组织行为的立法。加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增强《反垄断法》的可操作性，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统一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法》，对大型零售商过度组织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限制其通道费的收取、市场势力的滥用和对社会福利的损害。三是健全相应的组织机制。针对当前大型零售商过度组织行为管理过程中多头管理、交叉、无序和低效的状态，建议加强相应组织机制建设，完善顶层设计，统筹对大型零售商过度组织行为的管理。

参考文献：

1. 李海舰，2003，《中国流通产业创新的内容及其对策建议》，《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2. 林周二，2000，《流通革命》，华夏出版社。
3. 刘林青、雷昊、谭力文，2010，《从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以苹果公司为例》，《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4. 刘志彪、江静等，2009，《长三角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路径与机制》，经济科学出版社。
5. 盛朝迅，2011，《大型零售商主导产业链的经济绩效》，《商业经济与管理》第12期。
6. 盛朝迅、徐从才，2012，《大型零售商主导产业链：动因、机制与路径》，《广东商学院学报》第1期。
7. 盛朝迅，2012，《制造业升级亟待流通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第12期。
8. 宋则、荆林波，2004，《加快流通创新促进流通现代化》，《财贸经济》第4期。
9. 宋则、常东亮等，2010，《流通业影响力与制造业结构调整》，《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10. 王微，2012，《着力促进流通产业转型创新发展》，《经济日报》7月27日版。
11. 徐从才、丁宁，2008，《服务制造业互动发展的价值链创新与绩效——基于大型零售商

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的分析》，《管理世界》第8期。

12.徐从才、盛朝迅，2012，《大型零售商主导产业链：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新方向》，《财贸经济》第1期。

13.徐从才，2009，《流通革命与流通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岳中刚、刘志彪，2011，《基于渠道控制的国内价值链构建模式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第6期。

15.张弘，2003，《信息化与中国流通创新》，《财贸经济》第10期。

16.周长富、张二震，2011，《基于流通创新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内在机制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第3期。

17.Armstrong 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2006,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668-691.

18.Dobson Paul, 1996, Vertical Restraints And Competition Policy, Office of Fair Trading Working Paper, No.12.

19.Ferris J. Stephen, 2001,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Vertical Restraint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Current Practices, Submitted to the Competition Bureau, pp.15.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83页）服务业人才引进和利用计划，大力引进高层次、高技能、通晓国际通行规则和熟悉现代管理的高级服务业人才，通过有力措施吸引、留住、用好人才，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特别要加快培养社会急需的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各类中介服务、服务业政策与管理以及熟悉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等方面的人才。

参考文献：

1.于立新等，2011，《中国服务贸易研究报告No.1》，经济管理出版社。

2.于立新等，2011，《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目标、思路和政策建议》，《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9》，社科文献出版社。

3.于立新、陈昭，2011，《中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对策》，《中国经贸导刊》第18期。

4.刘绍坚，2005，《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动因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责任编辑：李文政

金融集团监管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

杨 琳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金融深化程度持续加深，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集团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深刻揭示出金融集团监管不严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力，对金融集团监管提出了前所未有挑战。为此，本文选取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台湾等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集团监管国际比较研究，遴选出一定前提条件下的最优模式和次优模式，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中国金融集团监管模式选择路线图。

关键词：金融集团 监管 国际比较 中国选择

作者简介：杨 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金融深化程度持续加深，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集团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截至2010年末以德国和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集团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比重普遍超过60%，个别国家甚至超过80%，金融集团及其监管对金融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深刻揭示出金融集团监管不严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力，对金融集团监管提出了前所未有挑战。为此，本文选取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台湾等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集团监管国际比较研究，以期为推进中国金融集团监管提供借鉴。

一、金融集团经营模式比较^①

（一）全能银行与金融控股公司比较

^① 本文中金融机构业务主要包括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如不特别说明，银行业务是指银行及其相关业务，证券业务是指证券期货及其相关业务，保险业务是指保险及其相关业务。

当前各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模式主要分为两类，即全能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这两类金融机构统称为金融集团。全能银行主营业务为银行业务，其业务范围不仅涵盖金融业，还允许投资非金融企业股权；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同一控制权下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中至少两个金融子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①。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中全能银行的典型代表是德国^②；其他6个国家和地区金融集团均是金融控股公司。

按照母公司是否直接开展金融业务，金融集团可以划分为经营性、非经营性和混合性三类。本文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中，德国是经营性金融集团，英国和加拿大是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台湾为非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如表2所示）。

按照主营业务^③类型，金融集团还可以划分为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以及保险控股公司（也称保险集团^④），且各类控股公司按照母公司是否直接开展金融业务，同样可以划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

（二）一元金融集团与多元金融集团比较

样本国家和地区中，台湾和日本金融集团是一元金融集团，其他5个国家是多元金融集团，即金融控股公司或银行控股公司与保险集团并存的结构。

按照金融集团多元化程度还可将多元金融集团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金融集团，包括金融控股公司、银行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和证券控股公司等多种组织类型。另一类是以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的二元金融集团；其中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金融控股公司可以从事跨金融子行业金融业务，保险集团只能从事保险及其相关业务，而加拿大将金融控股公司划分为银行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且二者均可以从事跨金融子行业的金融业务（如表1所示）。

① 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发起成立的金融联合论坛的规定。

② 全能银行的典型代表是德国，按照德国《银行法》有关规定，全能银行经营范围包括：存款、贷款、贴现、汇兑、信托、证券、投资、保险、财务代理、金融租赁等全部金融业务，其中投资包括非金融企业股权投资，即不仅可以与自身股东之间交叉持股，还可以直接或间接投资公司客户的非金融企业股权，并作为股东代表，参加相关被投资企业的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德国全能银行正是由于具有可以投资公司客户非金融企业股权的特点而区别于金融控股公司。

③ 主营业务是指合并会计报表后业务规模占集团资产比重最高的业务。

④ 下文中均称作保险集团。

表1 金融集团组织形式与金融业务类型比较

金融集团组织形式	代表国家和地区	组织形式具体表现	金融业务类型	
一元金融集团	台湾、日本	金融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多元金融集团	多元金融集团	美国	金融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银行控股公司	银行及其相关业务
			证券控股公司	证券及其相关业务
			保险集团	保险及其相关业务，不允许涉足非保险业务
	二元金融集团	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	金融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保险集团	保险及其相关业务，不允许涉足非保险业务
		加拿大	银行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保险集团	各类金融子行业，允许涉足非保险业务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相关法律法规整理得出。

二、金融集团监管模式比较

（一）金融监管模式比较

根据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经营模式和金融监管模式的基本类型，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即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混业经营部分混业监管、混业经营混分监管，五种模式各具特点、各有优劣。其中，分业监管是指针对不同金融子行业设立不同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按业务类别由各专业监管机构监管；混业监管是指只设立唯一一家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包括金融业务审慎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内的全部金融监管；部分混业监管一般是指银行和保险业务实行混业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证券业务单独设立机构进行监管，但也有特例；混分结合是混业监管与分业监管的结合体，即对于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监管，由联邦银行或特定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对于各金融子行业监管及其消费者权益保护，由相关专业金融监管机构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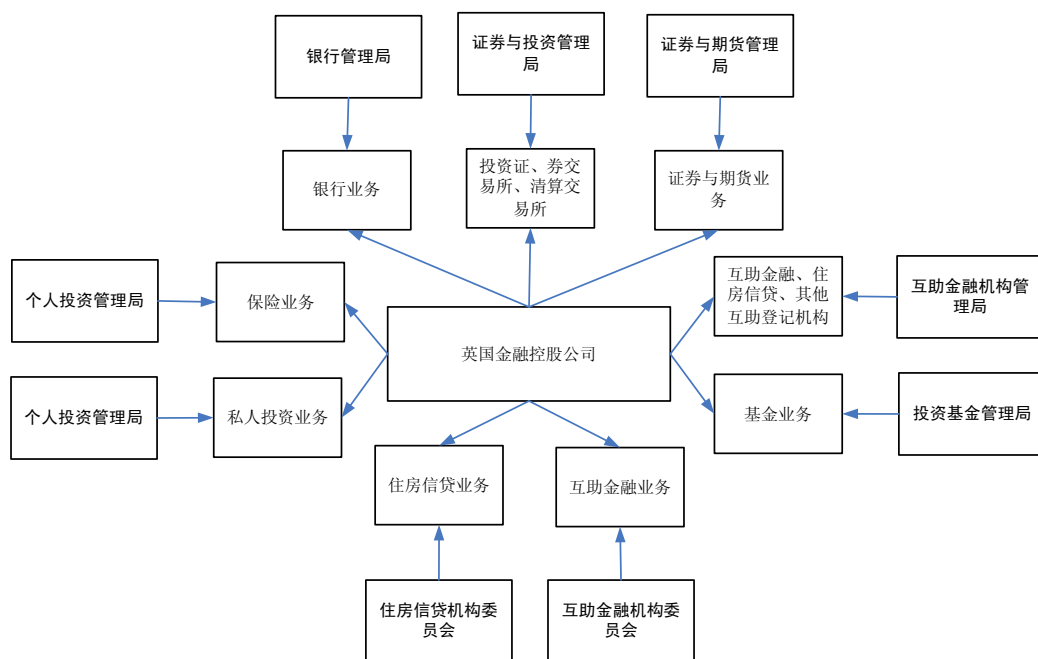


图1 1986—1997年间英国金融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示意图

1. 混业经营、分业监管

2002年金融改革前的德国、1986年英国允许混业经营后到1997年设立FSA实施混业监管前的特定时期，以及1984—2009年间的法国均实行金融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具体如图1—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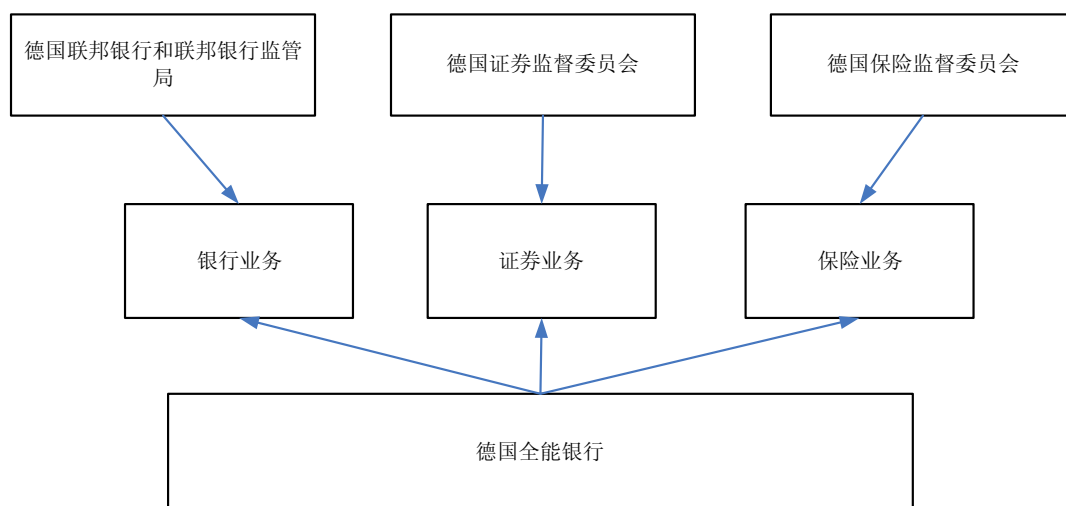


图2 2002年前的德国金融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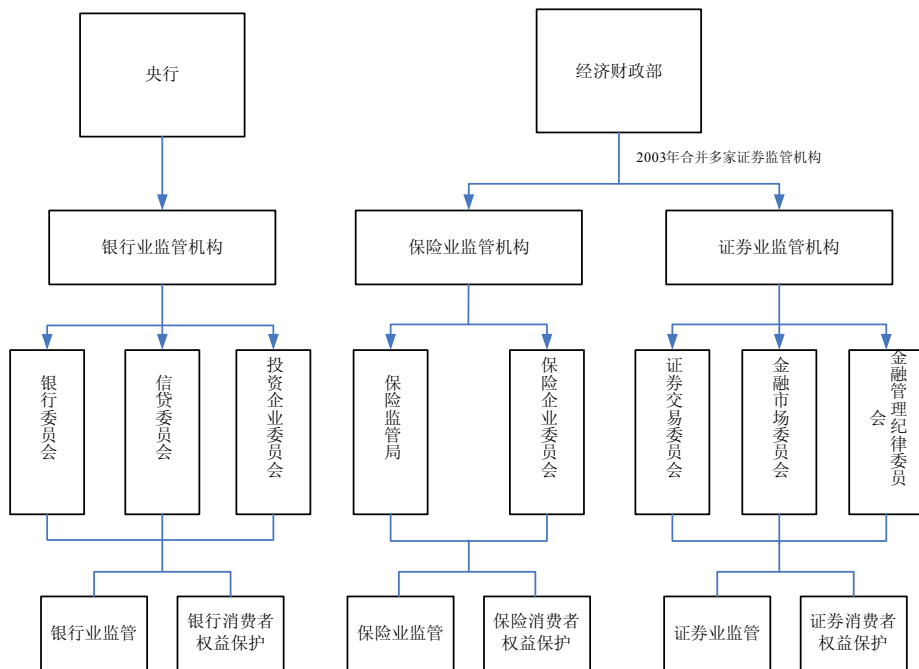


图3 1984—2009年间金融监管改革前法国金融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示意图

2. 混业经营、混业监管

当前，德国、英国、日本和台湾均实行金融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模式，其金融监管机构既负责以金融机构稳健运行为核心的“审慎”监管，又负责以金融产品营销和金融服务提供等“业务行为”为核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具体如图4---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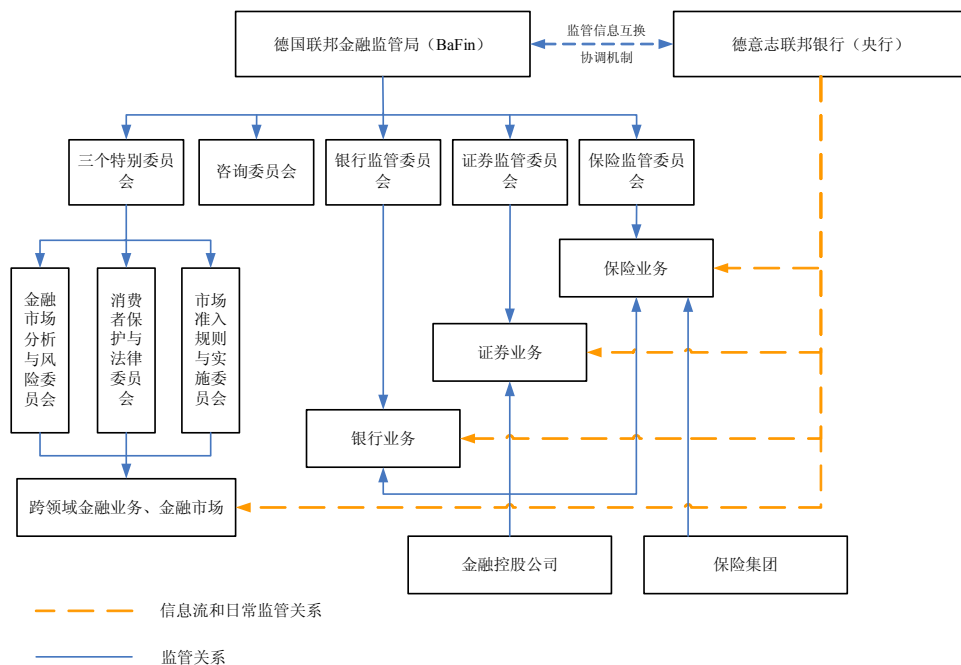


图4 2002年后德国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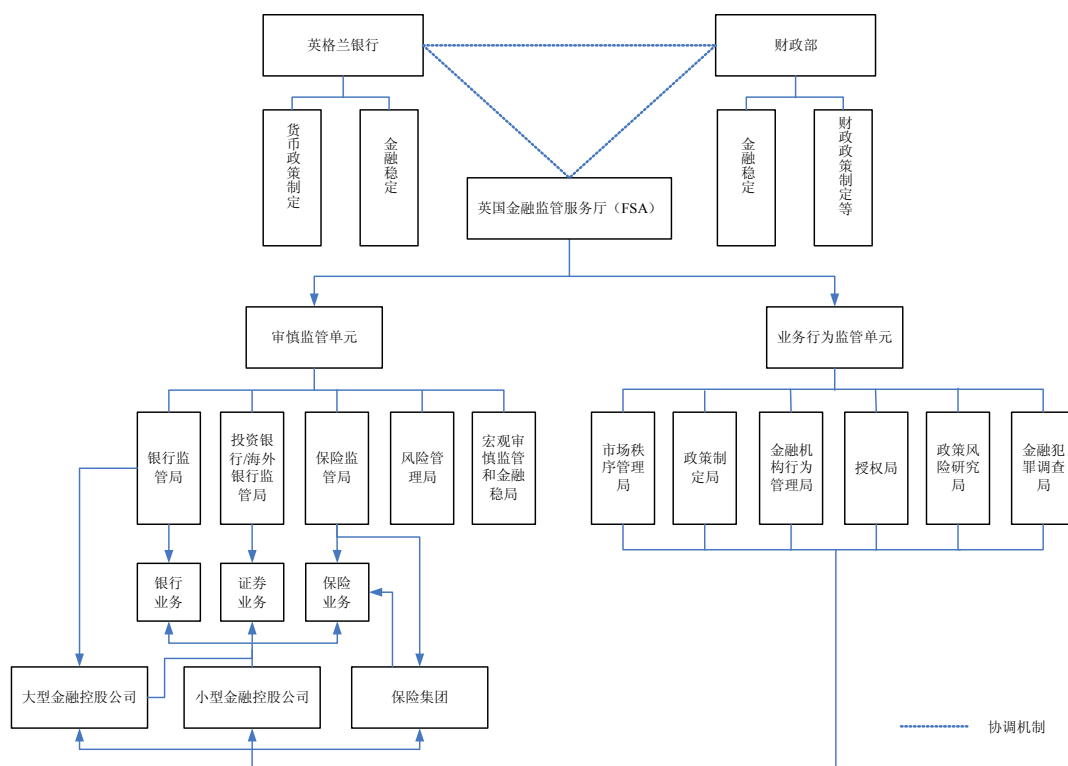


图5 1997年英国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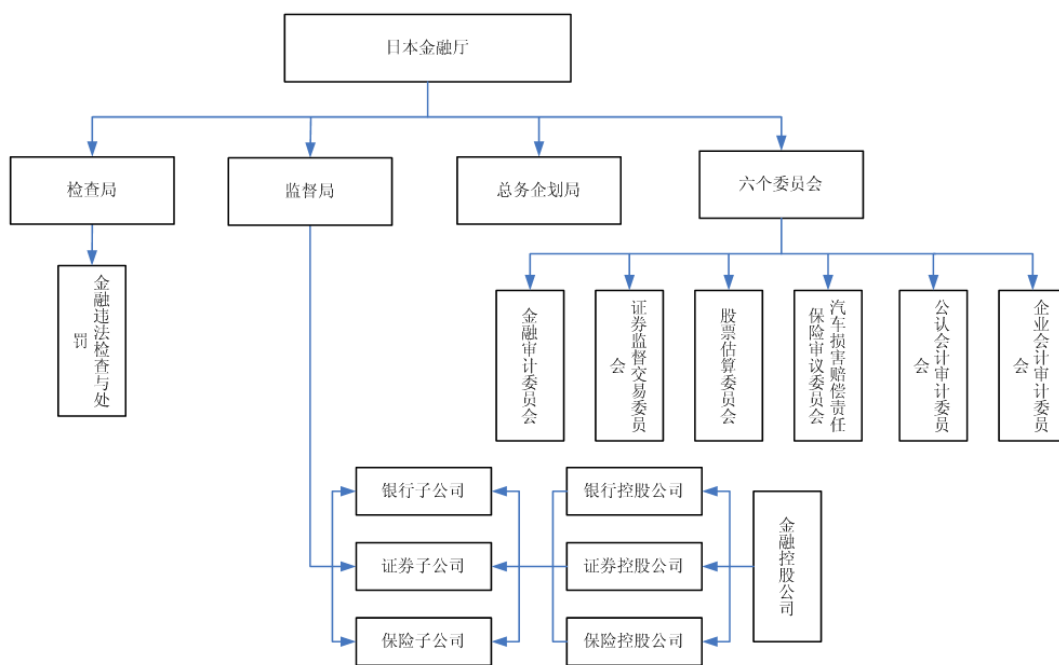


图6 1998年日本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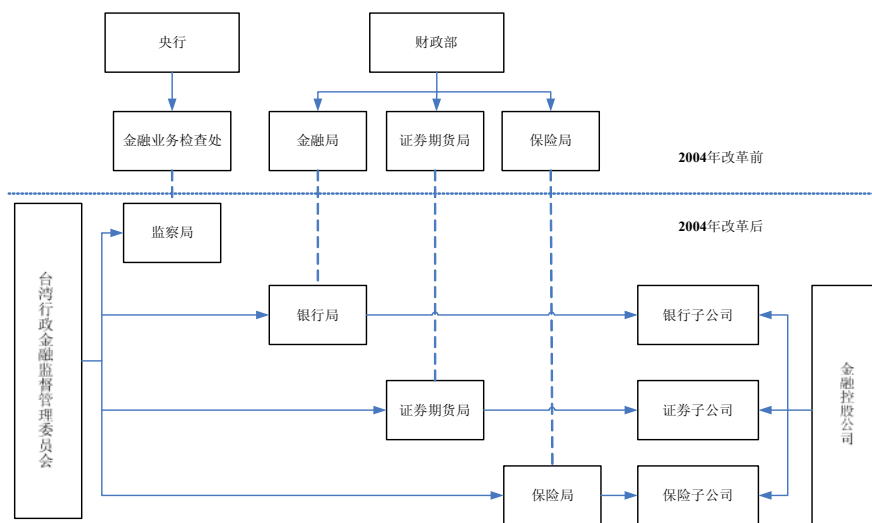


图7 2004年台湾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示意图

4. 混业经营、部分混业监管

当前，澳大利亚、加拿大国均实行金融混业经营、部分混业监管模式。澳大利亚1998年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形成了“双峰”式部分混业监管模式，即设立两家金融监管机构，一家是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另一家是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负责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如图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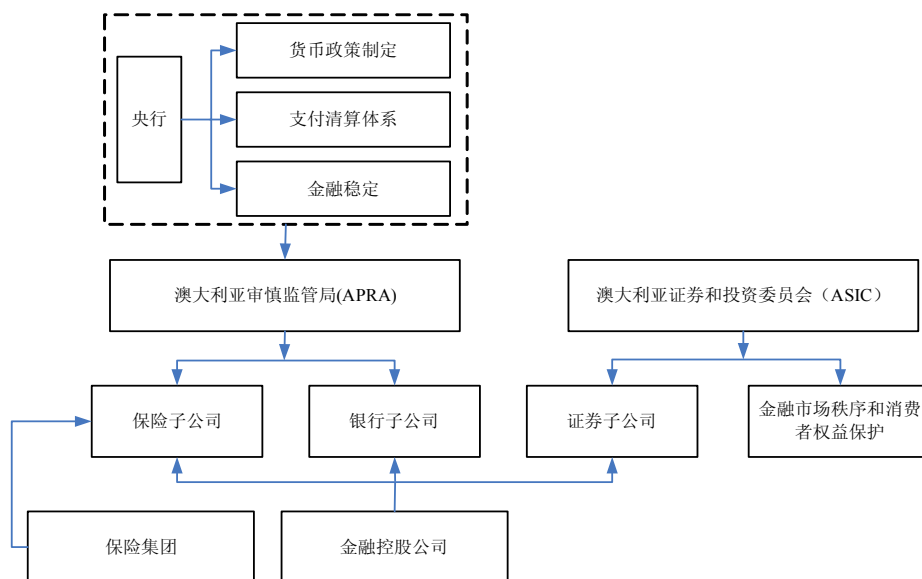


图8 1998年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混业经营、部分混业监管示意图

加拿大1987年开始允许混业经营，同年在联邦层面创立隶属于财政部的金融监管局（OSFI），负责对联邦注册非证券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继续沿袭原有联邦层面与省级层面“分权而治、相互制衡”的“两级多头、相互平行”金融监管体制，在省级地方

政府设立金融服务委员会（FSC），负责省级注册的非证券金融法人机构监管；对于证券业务监管，在各省设立独立的证券委员会，按照各省《证券法》^①监管证券业务；2001年加拿大还专门设立了金融消费者管理局（FCAC^②）（如图9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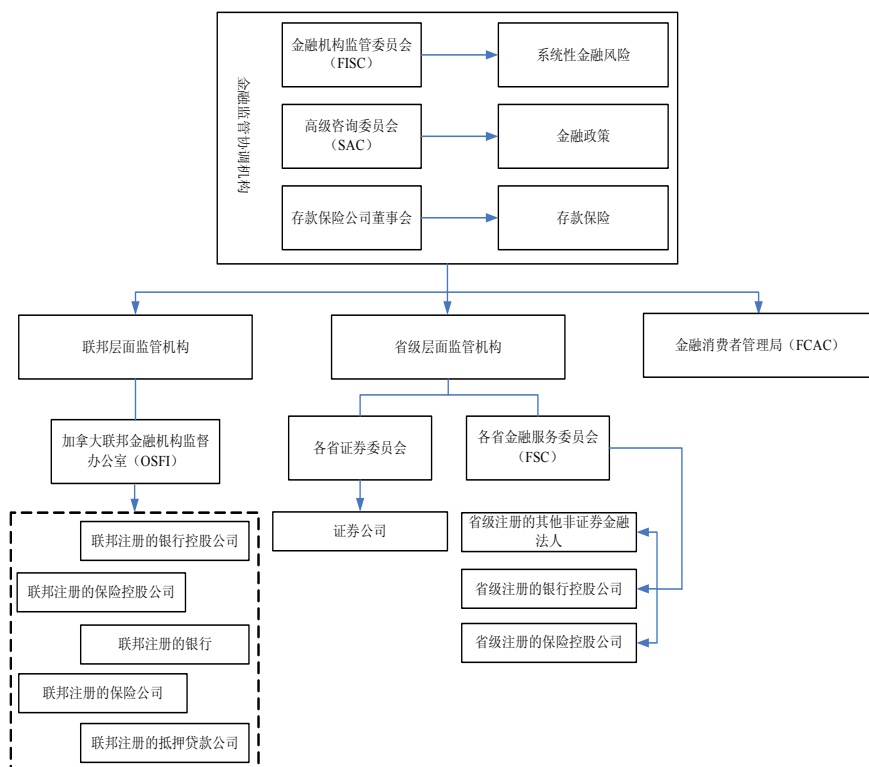


图9 1987年后加拿大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混业经营、部分混业监管示意图

5. 混业经营、混分监管

（1）美国金融危机前推行混业经营、混分监管模式。1999年美国《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实施后，美国一直实行较具特色的混业经营、混分监管的模式，美联储只对包含银行子公司或是银行大股东的金融控股公司和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证券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分别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SEC）和各州保险监管机构监管。与此同时，美国实行联邦层面与州层面共同监管的模式，对于在联邦层面注册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控股公司，由美联储进行母公司层面的整体监管，各专业监管机构对各自在联邦层面注册的子公司实施功能监管，对于其在州层面注册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由州专业监管机构监管；对于在联邦层面注册的证券控股公司和及其下属子公司，由SEC负责监管，对

① 加拿大各省会制定一套完整的《证券法》，管理上市公司及其与加拿大证券市场相关的活动。这一独特体制与加拿大早期的证券绝大多数是在本省区内发行和销售有关，这一体制较大程度制约了其资本市场的发展。

② Financial Consumer Agency of Canada.

```

graph TD
    FR[美联储] --> FHC[金融控股公司]
    FR --> BHC[银行控股公司]
    FR --> FRMB[联储会员银行]
    
    FHC --> FS[期货子公司]
    FHC --> SS[证券子公司]
    FHC --> IS[保险子公司]
    FHC --> BS[银行子公司]
    
    BHC --> FS
    BHC --> SS
    BHC --> IS
    BHC --> BS
    
    FRMB --> BS
    
    CFT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州期货监管机构] --> FS
    SEC[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州证券监管机构] --> SS
    SIRA[各州保险监管机构] --> IS
    OCC[货币监管署 (OCC)] --> BS
    
    FS --> SECOS[证券控股公司]
    IS --> IG[保险集团]
    
    DOT[财政部] --> OTS[联储监管办公室  
OTS]
    DOT --> TB[储贷业务]
    
    OTS --> TB
    
    TB --> THIC[储贷机构控股公司]
    TB --> TI[储贷机构]
    
    THIC --> TI
    OCC --> TI
  
```

(2) 美国金融危机后将逐步转向混业经营、部分混业与分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对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漏洞与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2010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多得—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将经历重大变革。除加强对银行类机构、金融衍生品交易、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证券化市场和场外交易等监管^①并扩大国际金融监管合作^②外，将逐步转变为混业经营、部分混业与分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一是增设“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由财政部部长担任主席，多名金融行业监管机构主席组成，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 and “一类金融机构”^③监管；二是增设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④，集中上收目前分散于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中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权，原有的混业监管模式转向部分混业监管模式；三是强化银行监管，提高银行控股公司及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要求（如图11所示）。

（二）金融集团监管模式比较

-
- ① 强化对银行类机构监管，将属于存款类机构、但不受《银行控股公司法案》限制的储蓄贷款控股公司、工业贷款公司、信用卡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畴；强化对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监管，通过修订《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案》和证券交易法规等，将其纳入监管范畴；强化对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基金公司的监管，再次将其纳入监管范畴；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通过建立证券发行方与购买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降低证券化市场风险；强化对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监管，降低这类基金的流动性风险和脆弱性风险。
- ② 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即通过国际对话与协调，加强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国际监管和监管标准的一致化；通过巴塞尔协议的完善和推广，加强国际银行业的资本监管和监管标准一致化；通过监管信息和手段共享，加强跨国金融机构监管，提升金融危机应对能力；通过完善国际会计准则，减少因会计准则等带来的技术性风险与冲击。
- ③ 一类金融机构是指：规模较大、系统关联性较强、其倒闭可能直接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机构。一类金融机构的划分标准将由美联储提出，是由一系列量化和非量化指标组成，以最终国会立法通过的标准为准。一类金融机构监管包括对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子公司、以及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在美国子公司的监管。
- ④ 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的职责主要包括：改进各类金融产品信息披露监管要求，金融机构要与消费者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与沟通，要以适当的方式让消费者深入了解其消费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提高金融产品条款设计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向消费者提供透明、公平、合理、不带有金融欺诈、没有误导性的金融产品；要求各类金融产品经纪商和投资顾问严格履行受托人职责，避免误导销售和欺诈销售，向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最符合其风险收益需求的金融投资决策建议；协调各州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提高监管标准，促使类似金融产品监管标准一致化。

表2 样本国家和地区金融集团组织形式与监管模式对比表

金融集团组织形式		国别代表	组织形式具体表现	业务类型	代表企业	金融监管模式	金融集团监管模式
一元金融集团		台湾、日本	非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台湾国泰人寿, 日本三菱金融集团	混业	直接监管
多元金融集团	多元金融集团	美国	非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直接监管+间接监管	混分结合	直接监管+间接监管
			非经营性银行控股公司	银行及其相关业务			
			非经营性证券控股公司	证券及其相关业务	直接监管		直接监管
			非经营性保险集团	保险及其相关业务			
	二元金融集团	德国	经营性全能银行	各类金融子行业	间接监管	混业	直接监管
			经营性保险集团	保险及其相关业务	德国安固保险集团		
		英国	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英国汇丰银行		直接监管+间接监管
			经营性保险集团	保险及其相关业务	英国保诚		
		澳大利亚	非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Macquarie Group Ltd	部分混业	直接监管
			非经营性保险集团	保险及其相关业务	AMP Limited		
		加拿大	经营性银行控股公司	各类金融子行业	Home Capital Group Inc	部分混业	间接监管
			经营性保险集团	各类金融子行业*	加拿大宏利		

注：*表示该类保险集团可以从事非保险业务，表中没有此标识的保险集团不能从事非保险业务。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金融监管法规和BvD数据库整理得出。

国际金融监管实践表明，按照监管机构是否对金融集团母公司及其下属机构实行直接管控，可以将金融集团监管模式划分为三类，即直接监管、间接监管以及直接监管与间接监管相结合。其中，直接监管是指金融集团监管机构有足够权利管理母公司及其下

属机构（包括集团下属的不受监管的实体单位），能够对其实施直接监管措施；间接监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权力集中于对金融集团下属法人实体的监管，通过对其下属法人实体监管间接管控集团风险。目前的台湾和日本一元金融集团、德国和澳大利亚二元金融集团为直接监管；加拿大二元金融集团为间接监管；美国和英国多元金融集团为直接监管与间接监管相结合（如表2所示）。

表3 金融监管模式与金融集团监管模式国别比较表

国别	台湾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排 序 原 则 (1-7)
金融监管模式	混业	混业	混业	部分混业	混业	部分混业	混分结合	
金融集团监管模式	直接监管	直接监管	直接监管	直接监管	直接监管+间接监管	直接监管	直接监管+间接监管	
监管复杂性	1	1.2	2	2.5	3.5	3	4	低——高
监管成本	1	1.1	1.2	1.7	1.3	2.3	2.7	低——高
监管效能	1	1.1	1.2	1.7	1.3	2.3	2.7	高——低
监管专业化程度	3.7	3.33	2.96	3	3.4	2.4	2	高——低
监管空白和监管漏洞	1	1.1	1.2	1.7	1.3	2.3	2.7	少——多
重复监管和过度监管	1	1.1	1.2	1.7	1.3	2.3	3.4	低——高
监管权限集中程度	3.7	3.33	2.96	3	3.4	2.4	2	低——高
监管理念统一度	3.7	3.33	2.96	2.3	3.4	1.7	2.7	高——低
对金融集团监管有效性	1	1.1	1.2	1.7	1.3	2.3	2.7	高——低
消费者权益保护	2.4	2.64	2.88	1	2.7	1.6	2	高——低
宏观金融监管目标达成	1	1.1	1.2	1.7	1.3	2.3	2.7	高——低
总体评价	1.86	1.86	1.91	2.00	2.20	2.26	2.69	好——坏

（三）金融集团监管模式优劣比较

为了较好进行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集团监管模式比较分析，选取监管组织结构复杂程度、监管成本、监管效能、监管专业化程度、监管空白和监管漏洞、重复监管和过度监管、监管权限集中度、监管理念统一度、金融集团监管有效性、消费者权益保护、宏观金融监管目标达成等11项指标对监管模式进行评估。按照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集团监

管模式分类对各项指标由好到坏进行排序，排序值由低到高；同时，根据二者不同影响力，分别赋权70%和30%，并将二者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类金融监管指标的序值。总体评价排序值为所有评估指标排序值的平均值。若两个或两个以上样本国家和地区某类金融监管指标排序值相同，则根据其具体情况再次排序，排序差在10%—20%之间。

总体看样本国家和地区中最好的模式选择是金融监管采用混业监管模式、金融集团监管采用直接监管模式的台湾、日本和德国，接下来依次为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如表3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本评估结果只是在一定指标选取下、一定权重设定下、一定排序值赋值下计算得出。一个国家和地区选择何种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集团监管模式，不仅要考虑本文设定的11个评估指标，还应综合考虑金融市场规模、金融机构经营特点、金融消费文化、金融监管历史与习惯等多重因素。

三、中国金融集团及其监管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金融混业经营深入实施，在加快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进一步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金融集团定位不清晰、监管模式不明确、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监管要求不全面四个方面，亟需借鉴国际经验，推进中国金融集团及其监管的科学化发展进程。

（一）充分认识混业经营优劣势，确立“适度混业经营”发展方向

国际金融实践表明，混业经营是一把“双刃剑”，总体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较早实施混业经营国家实际情况看，跨国金融集团逐步出现控制混业经营范围、聚焦核心业务的趋势。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和泰国金融集团全面调整业务结构，逐步回归分业经营和专业化经营；美国“9·11”后德意志银行加快业务转型，退出了融资租赁、托管、部分零售银行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业务，进一步突出竞争优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欧美银行开始收缩经营范围，2009年1月花旗集团^①继2005年将旅行者集团和年金管理公司出售给美国大都会后，分拆为花旗公司和花旗控股两家公司，且剥离非核心业务，将业务范围收缩至大型公司客户批发银行及全球选定市场客户零售银行业务；2008年8月瑞银集团进行业务分拆，收窄业务范围；纽约银行向摩根大通出售其338家分行，重点转向证券服务和资产管理等核心业务。从金融集团经营效率比较看，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后的效率并无明显变化。2003年美国排名前50的银行控股公司中，混业经营类与未混业经营类相比，前者资产收益率为1.99%，较后者的2.12%低0.13个百分

① 根据彭博统计数据，截至2008年10月30日，花旗集团减记和损失已高达551亿美元，成为受美国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金融机构。

点。从金融并购主流看，主要表现为同业并购而非跨业并购。1983—2008年的26年间，美国银行业113次并购中，同业并购数量为91次，跨业并购数量为22次，各自占比分别为80.53%和19.47%。因此，中国需深刻汲取国际经验教训，按照混业经营以金融监管严格到位为先决条件，以满足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需要为根本出发点，以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着力点的总体要求，及早确立“适度综合经营”的发展基调，本着“风险可控、业务互补、规模适度、管理有效、利润提升”的原则，科学推进，稳步实施，促进中国金融业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金融混业经营主体市场定位和法律地位，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发展至今，中国混业经营的金融保险集团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以银行业务为主的银行控股公司，除银行业务外，还会涉足基金、证券、保险等领域，但不涉足非金融业，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①；第二种是以保险业务为主的保险控股公司，除保险业务外还会通过投资或并购的方式涉足银行、基金、证券和信托等领域，大部分不涉足非金融业，如中国人寿集团、中国人保集团、平安集团；第三种是以证券业务为主的证券控股公司，除证券业务外还会涉足保险、银行等业务，如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第四种是以非金融业务为主、涉足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业务的企业集团，如华润集团、海尔集团等。

与国际主要国家相比，中国金融集团占金融资产比重高达70%以上，形式多样，结构复杂，基本兼具了多数国家金融集团组织形态和特点。既有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也有德国全能银行形式，还有英国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以及加拿大银行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形式；既有德国和英国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形态、加拿大经营性银行控股公司形态，也有美国和澳大利亚非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形态。与这些金融市场发达、法律体系健全、金融从业人员经验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风险管控能力不强，金融从业人员素质仍有待提升，却允许如此多元复杂的金融集团形态存在，无疑成为重要的风险隐患，因此亟需在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一是明确中国金融集团市场定位，参照国际主流做法，将金融集团经营范围限定在金融领域，并按照主营业务将金融集团划分为银行、证券和保险控股公司三种类型；二是规范金融集团经营模式，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只选择一种模式，要么是经营性，要么是非经营性，后者能够构建较好的“防火墙”机制，因此中国应积极推行以“集团混业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为特征的非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三是尽快修订现有金融法律法规，明确金融集团组织形态和业务边界及监管机构，并在时机

^① 虽然名称仍然为银行，但实质已成为银行控股公司。

成熟时制定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法规，切实降低因金融集团定位不清、法律地位不明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推动中国金融监管和金融集团监管持续向“部分混业监管、直接监管”模式转变

不同发展阶段应实行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这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因此，中国金融监管模式不应一成不变，而应随着经济金融发展逐步变革。根据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特点，建议本着“尊重历史、注重现实、兼顾未来”的原则选择金融监管模式，采取循序渐进、分段实施的方式逐步逼近次优或最优模式。短期内，金融监管和金融集团监管继续推行现有“分业监管、间接监管”模式，通过丰富“三会”已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内容，进一步明确主牵头人集团整体的监管职责及监管要求，消除“监管真空”，确保间接监管到位；同时，考虑到银行控股公司在金融保险集团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应加强银行控股公司系统性风险管控，进一步明确央行对金融保险集团特别是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职责。中期内，金融监管和金融集团监管可向“特色分业监管、直接监管+间接监管”模式过渡，即顺应国外金融监管发展趋势，成立专门的与“三会”平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形成由“三会”组成的“审慎监管机构”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共同监管的类“双峰”或“特色分业监管”模式；同时，对金融保险集团监管可逐步出台银行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和证券控股公司专属监管法规或补充完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专业监管法规，明确金融保险集团主牵头人的法律地位、功能定位，确立集团层面的全面系统监管标准和要求，并明确分业监管模式下金融保险集团下属子公司功能监管模式与要求，逐步实现较间接监管更具针对性、更加高效的“直接监管+间接监管”模式。长期内，金融监管和金融集团监管逐步转向“部分混业监管、直接监管”模式，未来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金融结构的持续优化，“大银行、小证券、小保险”的格局必将发生变化，间接融资占比将逐步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会持续提升，将为建立统一的金融审慎监管机构创造必要条件，届时可设立国务院直属、略高于“三会”级别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三会”合并划入该委员会设立相应的专业职能部门，同时在该委员会下设专门的金融集团监管部门或金融交叉协调部门；与原“三会”职能部门共同实施金融集团管控，金融集团消费者权益保护仍由专设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负责。

（四）完善金融保险集团监管法律体系和监管标准要求，提高金融保险集团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无论采取何种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集团监管模式，均应借鉴国际经验，持续完善金融保险集团监管法律体系，条件成熟时，可以出台统一的集团监管法规或专属的银行控

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监管法规，重点完善以下十个方面的监管要求：一是设立金融集团认定标准。应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要求金融集团至少包含2个金融子行业，采取非经营性金融集团模式，除经监管机构许可，原则上不得设立非金融子公司。二是明确金融集团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包括准入和取消资格两个方面。三是建立金融集团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四是建立金融集团防火墙机制。不仅要通过金融集团采取非经营性模式从组织机制上建立必要防火墙，还要通过必要内部交易限制，如对金融集团下设的银行子公司与集团下属其他非银行子公司之间交易金额做出必要限制；对金融集团及其子公司与金融集团负责人及其大股东、金融集团下属公司负责人及其大股东之间的交易做出必要限制；对金融集团高管层在下属子公司兼职做出必要限制；达到防控风险、保障公平竞争的目的。五是明确金融集团合并会计报表要求和方法。鉴于中国会计准则基本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因此应要求将母公司以及50%以上具有投票权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在合并报表方法方面，应按照国际主流做法采用购买法。六是明确金融集团资本计算方法和资本要求。中国金融集团资本计算方法同样可以采用金融联合论坛发布的金融集团资本评估方法，即允许采用基础审慎法、风险加总法、风险扣减法、总体扣减法等4种方法中的一种或结合使用。七是建立金融集团风险控制标准。八是建立金融集团退出机制。九是设立金融集团投资特别规定。为了防范金融集团经营风险，可参照多数样本国家和地区做法，对金融集团投资集中度、银行客户投资、非金融业投资、非子公司投资等进行必要限制。十是明确跨国金融集团监管方式。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实行“属地原则”；同时，母国和东道国监管机构之间应建立必要的监管信息和监管行动沟通协调机制，有效防范跨国金融集团经营风险及跨国金融监管风险。

责任编辑：晨乔

（上接第114页）量管理以及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只有具备时代性和国际性的模式才是普适性的模式。所谓时代性，就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需要。所谓的国际性，就是对所有的企业都有用，都认可这个模式，而且可以学，就像国际上都曾经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以及后来美国的六西格玛一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给整个世界范围的企业管理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海尔并购了日本三洋的白色家电，并购前三洋白电是亏损的，海尔整合过来不到一年就停止了亏损，并开始盈利，这其中的关键是海尔推行了人单合一双赢模式。这说明海尔这一模式具有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特点。海尔的目标是在全球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做网络化企业，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创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品牌。

责任编辑：晨乔

坚持文化融合 创海尔全球化品牌

王安喜

摘要： 海尔于1984年从一家濒临倒闭只有800多人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全球拥有8万多名员工，连续4年被评为全球第一白电品牌。海尔在过去28年一直致力于用创新、创业的精神，历经“名牌战略、多元化发展战略、国际化战略、全球化品牌战略四个发展阶段，并在2012年12月迈入第五个战略阶段，即网络化战略。坚持包容、开放的文化融合，为全球用户提供全流程端到端的服务解决方案体验，让海尔扎根本土，不仅受到全球消费者的青睐也成为当地政府的好帮手。

关键词： 文化融合 海尔品牌 全球化

作者简介： 王安喜，海尔集团公司党委原副书记。

海尔创业于1984年，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28年来，始终坚持创业、创新精神，历经名牌战略、多元化发展战略、国际化战略、全球化品牌战略四个发展阶段，并从2012年12月迈入第五个战略阶段，即网络化战略阶段。海尔从一个当年员工不到800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到2012年发展成为全球拥有8万名员工、营收预计达到1631亿元的全球化集团公司，其品牌价值达962 亿元，连续11年位居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第一名。在全球市场，据欧睿国际（Euromonitor）统计，海尔已连续四年被评为全球白色家电第一品牌。

海尔的发展，从内部因素来讲，得益于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企业在走出去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行为表现，从而增加了跨国经营和管理的复杂性，带来种种风险，有时甚至产生文化摩擦。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海尔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树立起海尔品牌的良好形象，扩大了中华民族的影响力。

一、坚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实现管理本土化

海尔在海外经营中因地制宜，在管理中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让当地海尔员工接受、认同海尔文化，使企业在当地扎根。

（一）美国海尔员工喜欢“玩具熊”

海尔在美国南卡州建厂已有13年多了，刚到美国的时候，海尔把“表扬/批评栏”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但美国人说这根本不行，因为他们不可能接受公开批评。在美国文化里，小熊是可爱的符号，而小猪是懒惰的象征，所以到后来就改成了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谁干得好就在谁的工位上放一个玩具熊，干得不好就放一个玩具猪，也达到了好的效果。

在美国海尔宽敞明亮的车间，处处是浓浓的海尔文化氛围。生动的海尔文化“EXCELLENT PEOPLE PRODUCE EXCELLENT PRODUCTS”（优秀的产品是优秀的人干出来的）、“CUSTOMER IS ALWAYS RIGHT”（用户永远是对的）等既醒目又激人奋进，而这些译文恰恰是美国海尔员工对海尔文化理解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正在中国海尔风行的员工自己动手以漫画的形式诠释海尔理念的“风”也刮到了南卡，美国海尔员工也通过绘画、写诗等各种不同形式表达自己成为海尔大家庭成员的感受。员工凯尔文·布莱得利画的中途抛锚的汽车表达了对海尔质量理念的理解：1%的质量缺陷对用户来说是100%的灾难。理念的认同也统一了美国海尔员工对海尔管理要求的认识。还有班前会制度和6S优秀典型讲评等等，让美国海尔员工感到既新奇又有活力。美国海尔员工柯基尔女士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驻联合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不但接受了海尔文化，而且为能成为海尔大家庭的一员感到自豪。”

2001年4月5号南卡州坎姆顿市把海尔工业园旁边一条道路无偿命名为“海尔路”，这是在美国惟一个以中国企业品牌命名的道路。后来海尔又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买了一个格林尼治银行拥有70多年历史的办公楼，作为海尔在北美的办公总部，命名为“海尔大厦”。2002年3月4日，在美国海尔大厦开业时张瑞敏首席执行官说：“美国海尔大厦开业，是海尔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是海尔在美国扎根的标志。

2012年底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姆茨在一次论坛上发言称：海尔在美国开设了第一个厂址，之后海尔在美国吸引了广大的消费群体，并取得成功。

（二）巴基斯坦海尔工业园里的“祈祷室”

在巴基斯坦海尔工业园，有一个房间很受员工欢迎，那就是巴基斯坦工业园管理人员专门为当地员工设立的“祈祷室”。巴基斯坦海尔工业园有当地员工1000多名，他们

信奉伊斯兰教，每天都要祈祷。尤其每个周五，员工都要身着传统服饰，集中进行一次半小时的祈祷。没有“祈祷室”之前，员工只能在厂房周边的草坪上铺块地毯祈祷。如果遇到天气变化，就很不方便了。为了满足员工宗教信仰的需求，管理人员特意在厂房边上的空地上建起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祈祷室”。每周一至四，员工们在祈祷室进行日常祈祷；周五下午2点，他们则穿着传统服装，双膝跪地，面朝西南方向默念《古兰经》（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地麦加，坐落在沙特阿拉伯西部，是巴基斯坦的西南方向）。

因为有了彼此的理解和尊重，巴基斯坦海尔人也融入和接受了海尔的文化和管理，专心地投入工作。

二、坚持真诚到永远的理念，为全球用户提供端到端全流程的服务体验

海尔驻海外人员承接集团由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型的战略，在产品的设计、制造、服务等环节与用户零距离，为用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一）海尔的贴心服务感动了沙特用户

熟悉沙特文化的人都知道，当地人是很少与外人在自己家里合影的。但2012年4月22日，萨拉先生却主动与上门为其服务的海尔服务工程师合影留念。

萨拉先生住在利雅得，家里有1套别墅，4个孩子，10台海尔空调。今年4月22日，海尔服务工程师聂国平准时来到萨拉先生家中，为萨拉先生清洗空调的过滤网，讲解保养知识。当聂国平把满是尘污的过滤网拿给萨拉先生看时，他非常惊讶。在利雅得，沙尘很多，但当地人却极少对空调过滤网进行清洗，也很少有空调品牌为他们提供这类的售后保养服务，海尔是仅有的两家之一。聂国平一边清洗过滤网，一边告诉萨拉先生，过滤网不干净，会影响空气质量；聂国平还建议萨拉先生把空调的温度再调高六七度，对孩子的身体有好处。

萨拉先生觉得海尔的服务真的很不一样，“你们不只提供服务，更关心我家人的健康，非常好！”在沙特，人们对服务的要求还仅限于能够上门维修就可以了。海尔推出的差异化空调保养服务让沙特用户很满意，也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成为海尔用户。

（二）整合内外资源，为尼日利亚2011年大选提供选民登记等一条龙服务

以前尼日利亚进行总统选举是通过人工统计手写的选票，工作量大还容易出现人为误差。2011年，海尔海外团队通过外部整合英特尔、微软等国际资源，内部整合集团研发、技术、物流等各方面资源，针对客户的需求，提出了一整套包括笔记本计算机在内的选民信息采集、录入、供电解决方案，一举中标尼日利亚大选信息采集设备采购项

目，还提供了从设计到开发生产运输以及当地配送和技术指导售后服务等一条龙服务。

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参加海外国家总统选举项目招标，并中标。

（三）为拉美国家政府提供差异化解决方案，成为当地政府好帮手

海尔的服务理念是真诚到永远，这种理念伴随着海尔走向全球。在拉美，海尔关注的不仅仅是提供单一的产品，而是更注重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提供成套产品服务、数字电视标准服务等差异化的解决方案。

在产品设计上，海尔邀请外方技术专家到中国，与海尔联合设计开发适合当地的产品，兼顾节能高效，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地用户的真实需求。2005年，海尔和古巴工程师联合设计的节能冰箱，目前正为古巴230万户家庭服务；还有330万台的节能家电也正在走进委内瑞拉的平常百姓家。

在产品制造上，海尔不仅针对拉美当地市场设计高效节能产品，而且将高效节能技术带到当地，支持当地化生产。2005年起，在古巴当地生产的106万台ATEC-Haier牌电视走入了古巴的百姓家庭。在委内瑞拉，海尔正在建设包括冰箱等产品的家电工业园，将会为委内瑞拉创造约1147个就业岗位。2012年9月20日，年设计产能30万多台的冰箱工厂率先投产。海尔冰箱工厂于2011年11月开始动工建造，用了仅仅10个月时间完成建造并投产，被查韦斯总统称之为奇迹。

在标准制订上，海尔帮助古巴制订了国家家电的能耗检测标准；正在委内瑞拉筹备建设的家电产品研发中心，将孕育出委内瑞拉自主的国家家电标准。

2008年中委高委会第七次会议期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亲切会见了海尔代表团，查韦斯说：是古巴革命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向他推介了海尔。这是真诚到永远的服务理念和老百姓的口碑让海尔赢得了拉美国家领导人的认可。

三、人单合一双赢文化可以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壁垒

中华文化里“内圣外王”的思想，是海尔员工耳熟能详的传统思想。在海外经营中，海尔也贯彻了这一思想，有的时候我们是倒过来用，即“外王内圣”：外王是指创世界名牌和第一竞争力的市场目标；内圣，就是要提升企业和员工的内在素质。

（一）让泰国海尔员工体现自身价值

2009年8月6日，泰国海尔经营体负责人吴勇刚上任，眼前的一切出乎他的意料：整个泰国公司业绩萧条，员工士气低落，原来100多名员工只剩下不到一半。要让公司走出困境，首先要让员工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树立对企业的信心。吴勇坚持与普通员工苦口婆心地沟通，他带领经营体有关人员把泰国海尔的200多人分成组，每次差不多有20到30

个员工，每月轮流沟通一次。沟通到了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班组。与普通员工的持续沟通，让员工认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他们对企业的作用有多么重要。

员工的观念变了，吴勇又引入人单酬机制，让员工们的回报和他们的付出自动地挂起钩来。收益的提高，让员工认识到，企业的业绩好了，大家的收益就会好。员工对企业有了信心，很快给工作的推进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冰箱产品经理卡西姆以往接到分给他的目标后总会说：“这个不行，那个做不了”。但是2011年底在确定2012年目标时，卡西姆却主动将目标提升了3倍，因为按照第一竞争力的目标，他马上就倒推出来他2012年必须要实现的份额。2012年前半年，卡西姆都超预算完成了目标。

中国海尔开展的活力秀活动走进了泰国海尔，吴勇在泰国海尔工厂组织了建厂以来的第一次焊接比赛。比赛的结果出乎意料，不但所有焊接人员参加了比赛，还与专家一起互动交流。加入工厂18年，摘取了焊接比赛冠军的扎荣激动地说：“是海尔让我成长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这么优秀，我也可以自主发挥能力，这种不被束缚的感觉太棒了，海尔真的是给员工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公平的平台，只要有能力的人就一定会有发展！”现在，扎荣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他把不良品从一天十几台降低到了一个月一台甚至是零台。目前，焊接比赛已经成为泰国海尔工厂的一个例行项目，吴勇下一步的计划是把焊接比赛逐步推广到吸附、发泡等重点工序，让更多的员工来展示自己的风采。

一晃三年过去了，三年前那个经营不善的小厂，三年间，每年的增幅都在30%-50%左右，产品的平均售价翻了一番，企业规模也翻了四翻。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也把泰国海尔经营体的发展纳入MBA 教学案例。

（二）海尔文化启动了日本的“休克鱼”

海尔与三洋电机于2011年10月签订并购协议，从2012年初开始，海尔开始在日本市场以海尔、亚科雅的双品牌运作。亚科雅即海尔从三洋并购过来的高端白电品牌。这个并购项目在海尔内部被称为“海洋项目”（海尔、三洋的缩写）。通过此项目，海尔收购了三洋电机在日本和东南亚的白色家电业务，包括1个研发中心，4个生产工厂，5个国家销售管道，转让的专利超过1200项，商标超过50个，涉及员工超过3000人，交易在6个国家分别进行。“海洋项目”涉及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程序之复杂，在亚洲近年的并购交易中也比较少见。

海尔此次并购是对三洋白电业务全系统的并购，从企划、开发到制造、销售、售后服务等整个事业体系。全系统并购但又非全盘照搬，海尔对并购涉及的6个国家的8家公司业务进行梳理后，内部重新排列组合，最终形成京都、东京两大研发中心以及湖南电机（日本）、海尔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4个制造基地和6个区域的本土化市场营销架

构。海尔收购的是一个体系，有技术，有工厂，有团队，还有市场。而海尔始终保持全球白电第一的领先者地位，取得规模效益，从量变发生质变。

签订并购协议后，怎么改革日本传统企业文化，实现文化融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日本企业非常注重团队精神，其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根深蒂固。“一所悬命”，全身心为公司效力是通常日本企业和员工共同遵从的核心价值观。而在海尔，等级制度被颠覆，年功序列被打破，低头安于本分也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市场，经营自己的市场，做到人单合一。海尔把人单合双赢模式逐渐转移过去，在不违反日本法律的前提下改革企业机制：改革原工资体系以及职能式的评价标准，建立了以市场目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改革日本公司里能升不能降的人事升迁制度，建立以目标和绩效为导向的机制。

对于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文化的认同，保障了最复杂并购交易的成功，并在最短时间内产生 $1+1>2$ 的效应。

中川勉是海尔日本销售公司的销售主管。按照日本公司传统的薪酬绩效机制，其市场业绩与薪酬并无紧密关系，但薪酬机制改革后，他不能再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目标，而是直面自己的市场，以创造用户价值为己任。中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选择挑战自己，承诺了翻番的目标。

企划部的科长阿布巧由于成功策划了市场竞争力方案，为企业实现超额利润，被公司提拔为企划部部长时只有35岁。在员工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一种更强大的活力正在团队中蓄势待发。

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卡洛斯在海尔总部和海尔亚洲日本进行调研，特别是与海尔日本员工面对面交流后认为：“任何人都会惊讶于海尔的日本员工能量为什么会如此之大。为什么他们会彻夜工作，不眠不休，而且总是面带微笑，举重若轻，因为员工知道，他们达成第一竞争力目标就会实现行业两倍以上收入，与公司分享利润。海尔亚洲国际的成功是一个现象，从中我感受到了海尔企业文化的力量与成熟”。“以价值观为基础来制定战略与执行战略，并真正重视员工的利益以及员工对组织的贡献，海尔在日本实现了价值观、战略、公司员工三者之间的协调一致，使日本员工真正意识到了人单合一的受益者不仅是企业组织，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并增添新的价值与意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海尔对三洋白电的并购是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型案例之一。这一并购本身反映出了一个方向，即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进程中，正逐步向高端领域迈进。通过并购，中国企业可以迅速扩大在高端产业的影响力，直接把高端领域的地位抢占到手。这其中，海尔的企业文化、质（下转第108页）

世界经济已经发生结构性转移

——专访摩根大通国际主席弗兰克尔

本刊记者 牛铁航

2013年3月11日，地处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海滨城市赫斯丽雅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赫斯丽雅国际年会。为期5天的会议，云集了数百位欧洲、美国和亚洲各国的政界、经济、金融、战略和智库的头面人物。他们采用“Chatham House Rule”，即老牌智库英国皇家国际商务研究所1927年发明的对发言者信息来源保密的会议形式，对当前世界各地和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畅所欲言，进行推演。会上，一位曾经担任过多间世界上重要金融机构的“老总”级人物，现任摩根大通国际主席雅各布·弗兰克尔先生引起人们的广泛瞩目。他的发言从人口结构到经济发展阶段，详尽分析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过往的二十年里已不可逆转地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并进一步推演今后30—50年内，亚洲将要发生的若干重大变化。会后，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在大会上的精彩发言，总结了过去20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转换，请您介绍您的观察是从以色列，或者中东地区的角度，还是从全球化的角度得出的？

弗兰克尔：当然是从全球的视角得到的。这与我的国际化经历相关。上世纪60年代我从希伯来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就去了美国，先在芝加哥大学读硕士、博士（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蒙代尔先生）并做了14年教授，此后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主任。直到1991年我出任以色列央行行长才回来。在任期间我卓有成效地降低了以色列的通胀，稳定了物价，放开了金融市场与外汇管制，从而使以色列的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走上全球化之路。我个人也全球化了，2000年起，我先后担任G30的总裁、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AIG）的副主席和美林国际的主席（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现在我是摩根大通国际主席。我所接受的教育是国际化的，我的经历使我考虑问题必须是全球化的。

当前的经济危机也是全球化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危机，还是全球经济失衡的

危机，是欧元的危机，是劳动力的就业危机，美国的失业问题最大，在欧洲这个问题更大。我们还面临经济政策的危机和更加长远的人口结构的危机。表面上看，这些危机发生在一国一地，但它们都是全局的局部反应。

记者：中国古语说的好“谋一域者不可谋全局”，请您一一道来。

弗兰克尔：好。首先是经济增长的危机。为什么称为危机？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地图上看，虽然2009年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总的增长还在，不过就是速度放慢了些，危机似乎已与我们擦肩而过。但是当你从全球各个地区的增长角度看，就发现问题了。欧洲，一个世界上重要的地区，它的经济增长总体为零，许多国家还是负增长，更可怕的是，这种现象去年如此，今年如此，明年还会如此。如此下去，经济危机将演化为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将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是最为危险的危机。世界是个整体，此地区与彼地区都是全球的一个部分而已，问题是当欧洲出现每况愈下的危机时，同在这个星球的亚洲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印度等国不仅是复苏而且是高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全面赶超老的工业发达国家。世界的中心从欧洲完全彻底的向亚洲转移。这个转换20年前就发生了，那时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在三个地区，美国、欧洲和日本，一共产生了全球2/3的GDP，而今天只有不到45%；中国和印度20年前开始崛起，时至今日，已生产了全球20%的总产值！美欧日所失去的，恰巧都被中印补进了。

记者：这就是您所称之为“结构性的转换”吗？

弗兰克尔：正是，这就是我所说的全球结构性转换。所谓结构性，还要看深一步，问一问为什么。进一步的观察使我们发现，世界的贸易格局也发生了重大转移。20年前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在欧美之间产生，而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位的进出口大国，中美之间的贸易就超过5000亿美元，太平洋贸易大大超过大西洋。如果再看中国、亚洲和太平洋的经济，人们很容易发现类似的“结构性转移”。我们现在要问，这种转移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它能否在今后几十年继续下去？

首先，让我们看欧洲的劳动力成本，过去20年间，意大利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145%，欧洲经济中最好的德国同期也上升了110%，这与劳动力充沛、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广大亚洲诸国是无法竞争的。可以说欧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使欧洲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反过来，正是因为中国和印度数以十亿计的劳动力大军引领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转换。其次，从人口结构上，我们看到欧洲、日本均已产生严重的人口老化，美国的人口结构好的多，中国开始出现一些人口老化的情况，印度的人口还非常年轻。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我认为，今后30—50年，世界经济从欧洲向亚洲的结构性转移将会持续，并且经济中心在太平洋地区内也将会发生转移。由于这个结构性的转移是全球性的，它将深深地影响到每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记者：（在北京钓鱼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记者再次采访了弗兰克尔，他在“影子银行的功与过”分会场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回答了斯蒂芬·罗奇等对中国经济比较了解的国际人物的问题，以下是部分发言实录和采访。）

弗兰克尔：非常感谢，我很高兴参加这次论坛，特别是在刚才非常有影响力的同事做完演讲之后，我觉得压力很大。首先我讲一下定义，我同意劳伦斯·芬克先生的说法，叫它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听上去本身就有贬义，因为“shadow”的联想就是藏在暗处的，可能是比较黑暗、邪恶的概念。我们应该把它换一个翻译的翻法，特别是中国人这么有智慧，应该能找到更贴切的对应词，比如叫“非传统银行”。

我同意中国很多金融活动都是非银行机构做的，但是也有很多商业银行通过表外的业务来做。刚才有人讲到限期改革、重组。我看有些银行的业务有监管，有些是没有监管的，这中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压力。我认为影子银行并不是坏东西。它的功能是在银行体系之外通过资本市场提供资金融资渠道。在正常时期影子银行作用不那么明显，但是在不正常的时期，或者说非常时期，就会有问题。影子银行大多是顺周期的，对经济有放大作用。比如说有乐观情绪的话，它会放大这样的一种乐观情绪，从而增加了杠杆率，使得信贷量变得更加不可控制；如果是人们失去了信心，它也会加重这种失望，于是大家加紧把钱撤出来，造成挤兑，使系统崩溃变得更加可能。因此我想它的这个特点是顺周期的。基金通常有这样的期限配合的功能，用短期的基金来融长期的项目。我们需要用类似的方法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来证明影子银行的功过，而不要因为它会有不好的后果，导致我们直接否定它。

我们在最近的危机里看到了影子银行怎么对系统造成放大的损害，其实这并不是新出现的情况，刚才氏家纯一先生讲到日本上世纪70年代就有这样的问题，瑞典90年代也有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影子银行已导致系统受到冲击，因此我们要考虑怎么来应对它，怎么解决顺周期的特点和类似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找到一种方式从影子银行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在正常时期利用它的一些优势，非常时期避免它的一些缺陷。

举一个例子，一开车就很可能会有车祸，车祸没办法根除。如果不让大家开车，最好把路封了，就不会有车祸出现，但是也抑制了驾车的行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手段解决事故发生率，而不需要封路。同理，一方面要认识到影子银行一些活动不像银行的业务，它们的优点是不一样的，银行的资本是非常充裕的，如果出现流动性的问题，可以直接找央行借钱，用央行作为最后借款人的作用为它们的活动做保障。对投资银行产品的这些人来说，他们觉得比较安全，因为他们最后流动性是有保障，有兜底的。

影子银行对于经济发展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它对经济是有补充常规金融体系之外的特殊作用。如果我们能够预防刚才讲到的影子银行的缺陷，譬如让它们也找央行获得窗

口指导或者是获得融资。按照这样的态势去思考，最后监管可能是在影子银行或者正规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所以归根结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影子银行和商业银行做具体的成本效益分析。

当然这个说起来比做起来要容易，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考虑是否可以给影子银行同样到央行获得窗口融资的渠道？一旦开放，我们又将面临新的问题，非常麻烦，非常棘手，非常难处理，需要风险管理。必须要有管理工具来实现风控目标，其中一项工具就是公共政策。

斯蒂芬-罗奇：我想问雅各布·弗兰克尔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对于货币政策，尤其是零利率下的货币政策，非传统的量化宽松如何评判？另一个，影子银行应该不是央行管理的，但是它们确实大量存在，是在非常的情况下存在的，会影响并扩张货币政策，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弗兰克尔：我想您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尽管货币政策和影子银行的关系不一定是必然相关的。您的问题是它对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特别是零利率的货币政策。这个我稍后再说。我先讲广义的风险管理，资本市场的一切都是和风险管理相关，影子银行和非影子银行分离出来，是因为它们偶尔带有更多风险。但最好的解决风险方式，最重要的方式，首先就是要有信息，在英语当中我们说“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但是你看不到的可能就会让你翻船”，所以披露信息是关键。受到监管的机构，像银行这样，一般来说是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给投资者，这是法律规定，但是不受监管的机构也是由于市场条件的要求来提供信息，因为这样它们才能有竞争力，所以信息披露是第一位的。

我们讨论影子银行的时候，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谈的并不是监管一个公司或者金融公司，我们谈到的是监管一种行为。所以一个公司可能是一个金融中介机构，不是一个银行，但是人们并没有说要监管它的一切行为，我们谈的是监管像银行一样的行为，这就和您刚才说的信息披露有关系。

当然我回避不了您提的问题。我只能说从历史的观点来讲，尽管今天的低利率，包括零利率，可能是应对现在处境的一个正确方式，但是毫无疑问，我觉得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全球的利率实际上可能都是负利率，这太离谱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希望会有顺利的方式退出现行的做法。

记者：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中的作用如何？

弗兰克尔：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全球经济结构性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我相信，随着进一步发展，中国和中国的智慧将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国际金融舞台上创造新发展，展现出更大的风采。

责任编辑：李文政

抓住新一轮经济改革机遇

美国前财政部长 亨利·保尔森*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而言，改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目前的有利条件是，有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丰富经验可供参考，特别是在银行业领域。部分改革措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台的。当时的中国尚无法将自身与境外市场的波动隔绝开来，今天要屏蔽外部的影响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逾8万亿美元，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合计规模则为35万亿美元。中国无法对困扰后三者的财政和经济增长问题保持免疫。

目前，中国公众对政府的期盼高涨——部分原因在于，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在现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收益却不断下降。当前的形势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推进改革，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期盼——中国公众期盼政府采取新的、更强调公平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与我打了数十年交道的高级官员都明白，在将一个储蓄大国变为一个投资大国的过程中，金融改

革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对于中国普通公民来说，缺乏可选投资渠道、通货膨胀（目前处于10个月高点）以及储蓄账户低利息等因素，意味着储蓄的实际收益为负。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却能够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融得资金。

这种廉价资本的过度供给导致中国缺乏培养企业长期竞争力所需的市场纪律。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也因此受损，因为资本未能流向民营企业并用于生产效率更高的投资，而民营企业是推动创新的主体并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当前全球经济领域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欧洲的财政紧缩以及美国的财政赤字，凸显出中国推进更大胆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例如放松对外资流动的管制以及提高汇率的灵活性。

中国政府在金融改革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对银行实施的结构重组、发展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监管体系。中国对汇率改革也表现出了很大决心，因为它意识到若不实施汇率改革，国内资本市场将无法有效运转。

但在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应该是加大而非减小了。2009年，中国政府在推出金额高达5860亿美元的银行信贷刺激之后，产生了棘手的副作用。两个原因导致这些副作用难以消除。首先，由于官方干预导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央行失去了一个对付通胀的有力工具。其次，在对非银行或“影子”信贷缺乏充分监管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想要有效收紧流动性变得难上加难。影子信贷问题棘手的原因，还在于其不透明性以及其造成的信用风险和潜在

* 本文作者是保尔森研究所主席，2006-2009年间任美国财政部长，还曾担任高盛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的泡沫。

中国新一届经济领导团队很快将迎来考验，其中有三项改革极为关键。

一是利率自由化。这是促进资本有效分配的必要条件，此外，它对于确保贷款被导向充满活力但缺少资本的民营部门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中国必须改革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因为不断膨胀的地方债将阻碍中国将城镇化作为增长主要引擎，进而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计划。合法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预算权力的下放以及更加公平的税收收入分配都是中国亟需的。

三是开放市场。在金融服务业以及资本市场领域的多年从业经验使我相信，改革最为关键的要素在于开放市场，引入外部竞争。我从未听说有哪个国家拥有富于竞争力的资本市场，同时却不允许全球最优秀的金融机构与本土机构公平竞争。

组建合资金融企业不能产生最优结果，因此，取消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必须以合资形式参与中国市场的规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还应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领域的剩余限制，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国内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它们在其他主要金融中心一样的模式运营。

改革可能带来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但我相信，中国要破解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就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重构和深化。改革行动过于迟缓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超出很多中国人的预期。新一届经济领导团队必须吸取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教训，抓住当前的机会果断采取行动。

摘编自《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3月18日
责任编辑 刘英奎

全球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既是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再难以不受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中国能够把城市体制改革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当领会到城市体制改革的意义，也可以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城市体制改革的动力。

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战略

首先，在国家层面，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拥有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国际竞争战略。其次，在城市层面，城市当局也有巨大的动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现在的城市居民对城市具有高度的认同，对外在的发展极为敏感，对城市的发展具有超前的视角。这些都必然转化成为他们对城市当局的压力。第三，较之主权国家，城市具有很大的优势来进行自我改革。

一般而言，城市都具有一定的自治程度。民主国家不用说，但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很多城市，例如地区级以上的政府就拥有了立法权。此外，城市体制的改革还有其文化优势，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认同。较之整体主权国家，城市更有条件来创造一种结合地方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城市文化，从而成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软力量。城市化成功不成功，主要看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对这一城市的认同。再者，在今天的

全球化时代，城市认同又有了新的维度，那就是外来人口或者移民尤其是国际移民的城市认同度。与农业社会不同，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知识经济最为重要。知识经济需要大量的人才，是人才经济。经济的竞争在很多方面表现为知识的竞争。知识的载体是人才，而人才的主要载体是城市。再者，城市本身的管理也需要人才。一个城市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主要是把国际化的发展和管理经验统合起来，形成自己系统的城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一个城市的人才素质决定了这个城市其他所有方面。

强化城市认同对吸引国际人才极为重要

在吸引人才方面，城市的认同非常重要。人们一直在讲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问题，也就是国家认同问题。国际人才也有国家认同问题。全球化不仅没有减低国家认同，反而在增加和强化国家认同。那么国际化人才如何处理国家认同问题呢？国家认同越强，民族主义情绪就越高，就越具有排外性，就越对国际化人才不利。

城市也一样。一个城市如果民族主义过于强烈，那么其排他性就越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就越低。尽管在主权国家时代，政治人物避免不了强调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但对城市当局来说，更应当强调的是城市认同而非民族主义。

因为城市认同往往强调的是城市文化、生活宜居等方面，城市认同的强化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并且这种认同往往比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认同更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从而也更具有生命力。

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城市认同就变得非常重要。对国际人才来说，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城市认同比国家认同来得容易，因为国家认同强调的往往是政治性和意识

形态性，而城市认同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和现代性。城市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但城市较少政治性，更能适合人的需要。城市是国际人才的主要聚居地。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几个非常包容开放的城市，就会吸引不了国际人才。

正因为城市的重点在城市文化和生活宜居等方面，城市也一直是和文明相关联的。文明可以说是城市的文明，因为城市是经济交易活动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中心。文明就是从各种不同交易和互动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可以用城市发展程度来衡量。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完全通过政治方法而生存和发展。高品质的城市永远是商业、文化、思想的集聚地。

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说，城市在一个国家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国家间的经济、金融、知识、社会等关系都是通过城市来维系着的，例如脱离了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理解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城市间的这种关系正在大力促进着城市文化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是城市认同的发展趋势。

国际人才的流动是这种一体化进程的动力，同时一体化也在推动着国际人才的流动。从这方面说，如果一个城市不能造就具有全球化性质的认同，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应当强调的是，城市的全球化性质并不是说城市文化的全球同质性。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市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3月19日

责任编辑 刘英奎

· 新书推介 ·

如何保持和用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简介

张永军

本着“同享人类智慧，共谋人类发展”的宗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自2009年成立伊始就开始谋划出版研究报告，跟踪国内形势变化，对当年的国内经济形势进行评估，并展望未来一年的发展前景，为政府、企业等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服务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建议。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2012年《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简称《国情报告》。

本年度《国情报告》的主线是保持和用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框架设计上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一、中国经济在长期内是否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

本书对新阶段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所出现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强调当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期，并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关于中国经济在长期内是否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本书在介绍国内外学者各种观点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判断。一是从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特别是通胀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来看，目前中国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速仍然在8%以上。二是从国际经

验来看，中国经济在2020年之前潜在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8%左右，在2020年之后潜在经济增速将开始逐步下降。三是从劳动、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测算。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我国在2020年之前能够保持8%左右较快增长，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20年之后尽管会出现下降，仍然具备实现较快增长的潜力。

二、如何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本书认为，未来时期中国劳动力数量将出现下降，但劳动投入仍然有一定的潜力可挖掘，主要是通过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并且可通过提高劳动投入的质量来进行弥补；资本投入还具备较快增长的条件；关键是如何保持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此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既要做强制造业，又要发展和壮大服务业；既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又要通过信息化等途径改革传统产业。而需求结构的调整，则是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稳定外贸出口的同时，重点是扩大国内需求；在保持投资较快增长的同时，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通过扩大内需来释放中国巨大的产业生产能力。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内容。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关键是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促进中

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方面，本书提出，要加快引入社会资金投向农业，要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步伐。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相对而言，现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重点是转型升级，中西部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区域优势产业来加快发展。本书对如何促进中部崛起和促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出了建议。

三、中国经济2013年运行态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作为一本年度报告，本书对2013年的经济运行进行了分析预测，在此基础上，对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操作提出了建议，为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参考。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一部具有国际新视野的 力作：《全球要事报告》

张焕波

2013年3月，全国博士后学界的一本独立学术报告——《全球要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和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下，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报告》由

《共同论》作者王宪磊研究员担任主编，分为序、总论、战略变化篇、经济热点篇、金融焦点篇、贸易投资篇、科技政策篇、政府采购篇、安全军事篇、人才政策篇、能源形势篇等若干专题。

《报告》研究、跟踪、预测了当今世界大事、要事，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全球多极化凸显。当今全球多极体系正在形成，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已成为人类关注的生存问题，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发展最小代价”已是各经济体发展的新理念。新的认识方式、发展方式、创新方式、改革方式、调整方式和平衡方式，已成为全球各经济体的共识。2013年，美、欧、日经济复苏约束增加，失业很难根本好转；全球金融危机、网络信息安全、恐怖主义和局部冲突仍将受到重点关注；金融危机不但不可能消失，在无限量的定量宽松政策推动下可能进一步恶化；不排除在2013年第二、第三季度再次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二是论述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战略选择：新的发展方式、促进增长、改善财政状况、重视技术创新和发展清洁能源。美国经济欲实现成功转型，需要充分利用中国对美投资和中国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机遇。各国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利率、汇率改革以及金融业改革是2012-2013年全球金融领域的焦点。2013年全球经济虽然面临下行风险，但是各国会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促进贸易、吸引国际投资。中国急需

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三是剖析了美国“挟北约以令欧洲、控欧洲而制世界”的战略。该战略大大限制了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发展，以重建强盛欧洲为政治目标的欧洲军事复兴之路初露端倪。人才资源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美国页岩气革命撼动全球

能源市场，日本福岛核事故重创全球核电发展，地缘政治对能源格局影响加深。

该书为年度报告，旨在为决策者、管理者以及国际战略、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举办新进站博士后座谈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3年3月29日召开“新进站博士后座谈会”，研究交流新进站博士后的培养目标、研究任务和具体工作。国经中心新进9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分别由曾培炎、蒋正华、王春正、魏礼群、郑新立、张少春、魏建国和张志刚等担任博士后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各自研究“中国金融‘走出去’问题”、“城镇化与公共政策探索”等9个博士后课题。国经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魏礼群作重要讲话，国家发改委人事司司长胡继申出席会议。(李蕊)

ABSTRACTS

(1) Innovating both the Connotations and the Model, Deep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moting a New Phas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for Cross Strait Relations

Zeng Peiyan·004·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progress. The basic trend of this relationship consists of “Three Non-Changes” : First, the main trend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has remained non-changed; Second,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win-win cooperation has remained non-changed; Third, the institutionalized consultation has remained non-changed. Three proposal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 the future are put forward: First, to bolster coordination of policies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updating commercial activities; Second, to innovate both the connotations and the model of practical cooperation; Third, to improve entrepreneur’s role in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dividend.

(2) Strategic Research on Avoiding “Middle-Income Trap” for China

Research Group·007·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concepts,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income trap” and concludes that the root cause of languishing into “middle-income trap” is the result of lacking in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multiple-imbalance in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tudy holds that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weakened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uncoordinated economic stimuli but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drive for urbanization and improving innovation strength on levels of both the nation and th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study deems that China can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around 2020 with continuous efforts in reform and open-up, maintaining stable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narrowing dow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hina needs to adjust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ocus on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speed up its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and take “a new model urbanization” strategy. At current stage,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s favorable to China as long as it’s stable. China doesn’t have the capacity to propose a totally new system and should recently

(3)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Opening-up: a Perspective on RMB Cross-border Settlement

Zhou Xianping and Deng Wei·021·

RMB settlement in cross-border business is a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With the reform of exchange rate formation, fluctuations of exchange rates have increased. Capital market and money market opening-up are not enough for RQFII and overseas RMB settlement institutions to hedge exchange rate risks.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ope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for overseas RMB position hold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actual needs, allowing them to operate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nd hedge exchange rate risks, thus boosting RMB settlement in cross-border business.

(4) Building Zhoushan into Our Bridge-Head of the Pacific Economic Rim

Zheng Xinli·030·

The article has highlighted and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New Area of the Zhoushan Islands. It has commented on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troduced its strategy, goal,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 lay out of the new area, analyzed in an in-depth way the highlights of the plan and a series of pioneering policies.

(5) Opening-up Bolsters Construction of Blue Economic Zone

Liu Dejun·039·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pen environment and coop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must combine development and openness via the mode and measures of constructing parks jointl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platform, construc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experimental zone, absorbing foreign capital and talent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6) Creating a New Mode of Urbanization and Pushing Ahead a Continuous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Since the opening-up and reform,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urbanization , but in general,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a crude way, a spreading out of existing cities, and there are multiple elements which have dragged down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mode of urbanization has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ities, so it is an all around and strategic problem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creating a new mode of urbaniz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us remolding the thinking of urbanization, searching in great earnest for a mod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 Korea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Comments and Revelation

He Dexu and Shi Xiaolin·056·

Korea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plays a key role in securing a recover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system gets a lot of publicit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sic status of Korea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draws lessons from it, evaluates its performance, analyzes the problem, and provides the revelation from it.

(8)Chinese Foreign Trade “Hot spots” and Reflections

Shen Danyang·067·

At present, China’s reliance on foreign trade is not too high, there is still space of quotas to improve in the global trade. There is no need to sacrifice external demand to pursue internal demand. China should upgrade itself from a big to a strong foreign trade nation.

(9) Innovation of Services Trade and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China

Chen Zhao and Yu lixin·075·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been in a low growth due to global downturn and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effect of using external demand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is weakening. Under this situation, the trade in services is a new way to stabilize external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form of the relevant economic system should also be on the agenda, in order to ensur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

(10) Industrial Policy to Encourage Circulation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Sheng Chaoxun·084·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circulation i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circulation innovation's function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upgrading, functional upgrading,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chain upgrading is also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For this reason, we need to adjust our industrial policy to develop ideas and implemented new industrial policy to encourage circulation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ideas should be simple to "value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

(1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Financial Monitoring and Proposals for China

Yang Lin·093·

American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shows that supervision relaxation on financial groups can lead to great financial calamiti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kind of problems, this paper has chosen 7 samples including US, UK, Germany, Canada, Australia, Japan and Taiwan to conduct a comparable study on the financial group monitoring, to determine which model is the best, and thus proposes the best choice for China.

(12) Adhering to Cultural Harmony, Creating a Global Haier Brand

Wang Anxi·109·

Ever since it was founded in 1984, Haier Group has dedicated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us creating a world famous brand. Originally a small collective plant on the verge of bankruptcy, it has now grown into an international group which has more than 80,000 employees around the globe Haier has risen to be the world No.1 brand of white goods. Adhering to tolerance and ope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providing end to end service solutions to global consumers, Haier now has taken roots in many countries and won the favor of local consumers as well as local governments.

Editor:Li Wenzheng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咨询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本刊设有：高层论坛、理论前沿、宏观经济、世界经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区域经济、调研报告、案例研究、全球化人物、投资地理、智库动态等栏目。论文要求创新性强、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文字精炼、数据可靠，篇幅一般不超过1万字，切勿一稿多投。请作者按照论文的写作规范投稿，并同时提供中英标题、内容摘要、关键词。请注明作者工作单位、职称职务，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详细联系方式。本刊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录用稿件，稿件寄出三个月，如未见录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1号1号楼506室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66169330

联系人：李蕊

欢迎订阅2013年《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联系人：李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1号1号楼506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34；电话（传真）：010-66169330。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每月20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3年《全球化》杂志（月刊） 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电话		
详细地址（邮编）				
征订份数		420元/年（12期）	总计金额	

注：为便于我们尽快给您邮寄，请务必将征订单回执与汇款底单一并传真至我部。